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聆听毛主席在延安的五次讲话

为「两弹一星」殉职的郭永怀

胡耀邦改发一哲学文章内幕

「四人帮」组阁与毛周长沙决策

曾彦修：漫谈陈独秀

2001/

3

总第108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新春联谊 *同贺共勉*

1月13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文津俱乐部举行新春联谊会,在京顾问、理事、会员和各界朋友近三百人欢聚一堂,共贺新春之禧。会长费孝通出席,研究会领导向与会者拜年,新老朋友相互致贺。



研究会领导向与会者拜年



新春联谊会会场



会场镜头一组



炎黄春秋

春秋笔

- 2 “四人帮”组阁与毛周长沙决策…………王永钦
8 胡耀邦与《“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
的发表…………韩树英 孟 凡

英杰谱

- 12 为“两弹一星”殉职的郭永怀…………金志涛等六人
17 尚钺与少年金日成…………陈 模

颂星篇

- 22 追忆胡绳同志…………马仲扬

群言堂

- 26 漫谈陈独秀…………曾彦修

亲历记

- 33 聆听毛主席在延安的五次讲话…………曹慕尧
38 反“五风”亲历记…………张广友
43 哭笑不得的故事…………刘 衡
47 “运动”中的人世情…………刘镰力

人海浪

- 52 追寻父亲的清白…………何 奇
60 漫画之星屠益范…………汪 澄
62 农村合作医疗的创始人覃祥官…………胡振栋

遗闻录

- 65 我父亲苏静参加“军管”二三事…………苏晓林
77 陈嘉庚先生两祭黄帝陵…………苏 明

文荟苑

- 68 卜少夫和他的《新闻天地》…………李 伟
72 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安绩常
25 一幅令人难忘的血缘亲情图…………何 标

编读窗

- 74 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郝俊卿
76 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的是刘淑清…………郭 华

古镜台

- 78 霍光现象的警示…………沈 潜

顾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钺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杨继绳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四人帮”组阁 与毛周长沙决策

● 王永钦

1973年，中共十大之后，面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这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在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的周恩来，心中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快使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据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负责军队高级将领审查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回忆：

按照规定，每个“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

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175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通过的。

叶剑英参加了当年的政治局会议，他作了一首小诗，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暗喻“牵骡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解放”干部的艰难。这时的周恩来，已确诊为膀胱癌。

10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向这位贵宾特地介绍复出的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积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任职程序，并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

这时的江青集团见老骥“一匹复一匹”的出山，他们驱动在京沪等地控制的写作班子，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

作组,康生指挥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写作班子,纷纷登台亮相,他们借“评法批儒”,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许多正在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和全力推进这项工作的“牵骡人”周恩来。在江青一伙授意下,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以更加露骨的语言大批“宰相”和“折衷主义”。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材料。以此为标志,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1月24日,江青给军委领导人写信,批评军队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要派迟群、谢静宜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通知。24日下午,江青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北京召开解放军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煽动军队参与这个运动。1月25日下午,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是在上午11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按照江青的旨意,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反复辟”的主题,说“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会上,江青、姚文元也不断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

辣的”。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一·二五”大会后,江青一伙马不停蹄,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向周恩来发难。

1月29日,根据江青的布置,《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经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这部片子,曾被迟群诬蔑为歪曲了中国的形象,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

2月,江青制造“蜗牛事件”。四机部某设计院一青年干部写信给江青,反映该部1973年底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送礼品玻璃蜗牛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国的污蔑。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认为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接着,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展出了200多幅美术作品,名曰“黑画”展览。在展览的“前言”中特意提示观众: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这些作品,都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用于装饰宾馆和外贸出口的。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体现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图为大会主席台

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根据这一精神,有关部门当时集中了一批国画画家,突击创作了2000余幅宾馆布置画。“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便指示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党羽,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宾馆布置画收集起来当作“黑画”展览。

3月,周恩来每天便血达一百多毫升,他的癌症病情更加严重了。

3月中旬,江青一伙极力反对邓小平作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这一届联大特别会议,参加的大多是各国首脑。在周恩来病势加重、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无论国内、国际,都是人们倍加关注的。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请示报告后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他并且表示,这件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由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报请政治局批准。

同一天,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3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时,江青仍声称她对这件事“保留意见”。毛泽东十分生气,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4月6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送行。

4月1日,《红旗》第4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出的《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根据江青出的题目,3月份即已写出,文章刻画一个“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注:鲁国当时没有“宰相”这个职务)孔丘的形象,影射周恩来。3月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审阅送

审稿时,写了一些称赞的批语,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准备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借批孔之名,对周恩来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20日,《学习与批判》第5期发表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要把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974年6月1日,根据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医疗组意见,周恩来告别他工作、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离开西花厅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当天下午,76岁高龄的周恩来驶离中南海,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住进医院的当天就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6月15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江青“启发”在座者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迟群等人也声称他们所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

6月18日,《人民日报》按照江青的旨意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称:“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一时间,在京、津、沪等地的街头,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打倒当代孔老二”等大标语。

6月下旬,江青到天津的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6月23日,江青到了她批林批孔的试点单位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当得知接待她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时,她便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周克周吧”,用咱们的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是不满意的。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周恩来也从医院赶去参加。会上,毛泽东指出,“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等:“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30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这里正在准备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许多人焦急地盼望周恩来总理的到来。晚上7时许,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周总理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边鼓掌,一边步入大厅。顷刻间,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连有的外国朋友也顾不得礼仪,站到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恩来。

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安排好新的国家领导机构,宣布“文革”胜利结束,从此国家步入正轨。但是,随着开会日期的临近,江青一伙加紧了“倒周”、“组阁”的活动,为自己上台作积极的准备。

在“组阁”的问题上,毛泽东已另有想法。周恩来重病在身,四届人大之后由谁来接替他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由谁作他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权衡再三,遂于10月4日在武汉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无疑,这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0月6日晚上,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〇五医院,当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重病之下的周恩来,同江青谈了整整两个钟头。六年后,王洪文在法庭上讲到这件事:“(1974年10月6日)政治局开会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

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事情很清楚:因为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不便直接反对,便把眼睛盯在“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上,但是他们没有得逞。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制造了“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发动了新的进攻。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13500吨,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在远洋航行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但还是于9月30日回到了上海。“四人帮”便借此大做文章。10月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声称:“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

“四人帮”为什么多次攻击“造船不如买船”呢?周恩来的工业秘书顾明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运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这便是江青一伙批判所谓“崇洋媚外”的真实用意。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直接向邓小平发难。江青就风庆轮一事阴阳怪气地质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呢?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承认这件事是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邓小平严正地回答:“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于是,江青、张春桥、



1974年4月6日,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图为周恩来等去首都机场送行

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当夜,“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商定要王洪文去长沙,向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后,他按照事先同江青等商量好的意见,硬说邓小平仍在继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并且说,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找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二人借陪外宾去见毛主席的机会,告邓小平的状。当天晚上,王洪文返京后,“四人帮”又聚在一起介绍情况。会上,张春桥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是又一次的“二月逆流”。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有

关情况。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要她们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王洪文来的

时候没有这么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

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以满意和赞赏的口气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同时批评江青: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肯定和支持了邓小平的做法。

同一天,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她的一份“组阁”名单。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示,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针对江青提名由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江青在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后并不死心,她继续写信给毛泽东,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伸手要官,企图攫取更高更有实权的职位。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

可读李国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

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特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进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的这封信颇为欣赏。他借用这个典故婉转地批评江青，同时拒绝了江青的不合理要求。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周恩来的精心主持下得以全部落实。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感到大势已去，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

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当天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〇五医院，下午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

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四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五个方面的意见：

1、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写出书面检查。

2、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3、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4、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并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5、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表示，当前仍要继续强调备战。并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果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学习理论问题。他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 仲文）

胡耀邦与《“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的发表

● 韩树英 孟凡

1978年7月15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73期发表了韩树英撰写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的署名文章,从提出写作任务到成文发表,都是在胡耀邦同志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意图,是胡耀邦在党校的秘书转达给韩树英的。文章初稿有这样一段论述:

竟然有这样的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只是因为说了“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便被打成了“反革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拨乱反正,要落实政策,这个单位还硬要把这顶“反革命”帽子继续给那位同志戴下去。类似的事不止这一起。这是涉及怎样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怎样才能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重大问题,是涉及怎样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里已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要为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提供理论根据,所以文章初稿的题目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吗?》

作者当时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任主任,讲课中也经常接触到类似的问题,也认为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很必要,接受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后,考虑再三。当时《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刚两个月,虽然很多省报表态赞成文章的观点,认为此文非常重要,但不少人还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该文发表之初被一些有影响的人斥为“砍旗”、“非毛化”、“分裂党”的影响还未消除,于今,又要著文公然论证“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在理论上说不清它的科学性,就很可能被某些人掷进“砍旗”的黑漩涡里去。

作者着重考虑的是两个问题。首先就是要把“一分为二”观点和方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说清楚。“两类论”、“两重性”、“两分法”(一分为二)等,都是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普遍规律的科学的、简明的、生动的表述。至于“一分为二”的提法,在曹葆华最早翻译的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就使用过。后来把“一分为二”改译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1963年底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中,重新对“一分为二”分析方法加以强调,批语中说我们的同志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指出,“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从此,“一分为二”、“两分法”的词句更为同志们所熟悉了。但由于人们对这一辩证分析方法本质的理解有高低深浅的不同,对于

它的普遍适用性认识很不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大混乱,有的认为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区分为“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甚至作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处理。

作者抓住了两个基本点做文章,来反对形而上学。

第一,对“一分为二”的运用。因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的,在本质上是要坚持一分为二的普遍适应性;又因为具体事物的矛盾是特殊的,在表现上要把握一分为二在运用上的特殊性。具体事物具体对待,对事物的不同层次、角度、侧面的分析,也都要把握其特殊性。成绩和缺点、真理和错误,这是对我们的同志,对共产党人的工作和认识的两分法,而例如真老虎和纸老虎的说法,则是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特性的两分法,这是运用上的特殊性,和对我们同志的两分法的分析不能混同,要具体对待。至于毛泽东思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把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总结起来而得出来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本身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对真理的一分为二又有其特殊性,真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两重性,就是对真理的一分为二。每一时代,每个人认识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而相对真理又都包含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因此相对真理都具有条件性,都有着向绝对真理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否认相对真理的条件性、相对性而当作无条件的、绝对的,在运用中就要犯错误。

第二,必须配合正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两者从理论上联结起来。因为事物、认识都是一分为二的,所以对它们的真假对错必须加以区别和检验,这是人的认识是否需要检验问题的前提,是辩证法;至于用什么来检验认识,区分出真理和错误,只有靠实践,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一分为二,实践检



1978年1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验,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才能推动毛泽东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文章分为三节,即《具体地对待一分为二》,《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总标题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吗?》

稿子交给《理论动态》编辑组,经《动态》组同志推敲,特别是经胡耀邦同志的亲自修改才定稿的。

首先是题目,胡耀邦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吗?》,直接目的为主张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提供理论根据,视野不够开阔,为使文章的意境更高些,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胡耀邦同志1978年7月12日在文章清样上又写了这样的批语:“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不错,标题改为《谈谈“一分为二”的思想》,这么改一下,是否好一点?”他让《理论动态》组再斟酌并和作者商量,最后把定稿的标题改为《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他还在清样上做了些修改,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观点和学

说的体系,不仅包括基本原理,而且还包括把基本原理运用到一定条件下的革命实践而得到某种理论”,他把“某种理论”四个字改为“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等。他在改动的地方还加了如下的批注:“我在第9页上,改了一点点,请再斟酌。此外,某些地方还可以再斟酌一下。”可见他对文章的关注是从原则到具体的。

文章于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发表,经杨西光同志和我们联系,7月23日在他主编的《光明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转载。因为文章触及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社会反响的强烈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普遍认为这是“拨乱反正中对这一思想禁区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对“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次有力的冲击,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化和延续”,认为这篇文章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态度上的拨乱反正,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确实,此文发表以后,各地有关部门不仅据此平反了一些错案,在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同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曾多次嘱咐:要针对尚未完全澄清的问题,从哲学和认识论高度,组织一系列文章给予理论的回答。早在1977年9月10日他和《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就强调:“没有哲学就没有共同语言,不懂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理论动态》每篇文章,都要讲哲理,要养成习惯,社会现象很复杂,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事实上的证明。”可以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就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胡耀邦亲自组织、设计的重要系列文章之一。

我们可以把胡耀邦同志对“一分为二”一文的写作、发表当作一个例子,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他所关注的国家大事以及这种关注在实践上产生的结果。

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把人们从“左”的长期影响和禁锢中解放出来,推动理论研究和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1978年7月22日(《“一分为二”是普遍

现象》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的第七天),胡耀邦同志应约同邓小平同志有一次重要谈话。小平同志明确地直接地表示支持耀邦同志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支持《理论动态》。这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遇到强大阻力和压力时的十分强有力的支持,给了耀邦同志在这方面的活动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第二天,即23日,耀邦同志就给《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作了传达。就在这次会议上,耀邦同志就初步地讲了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想法。他说,“一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再吃一惊,对这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9页和孟凡的记录)这集中地表现了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邓小平发动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中,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作用的相互关系。

二、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在当时用实际行动体现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特别是它的三大作风的批评自我批评作风。

“一分为二”一文,前面说过,初始的写作动因是直接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案的平反提供理论根据的。这虽是耀邦同志倾注极大精力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例子,它却是和理论问题相联系的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例子。

耀邦同志高瞻远瞩,从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全局的高度来看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意义。从他直接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到接任中组部部长以后,我们在党校直接听他讲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已经难以说清有多少次了。他不止一次地扳着指头算:5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左”的批判运动有多少多少次,像反右派、反右倾、庐山会议直到“文革”这样的大范围的运动,错误地批判、打击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而其间还有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左”的批判运动,累积起来也错误地打击了许多人。受批判、打击的每个对象都要牵连到家属、亲朋故旧,这样,多年累积起来,直接间接受到伤害的干部、知识

分子、群众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目,成为我国社会不安定的重大隐患。此外,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大量不白之冤、“左”的伤害,只要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矛盾总会历史地存在着。

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长时即表现出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异常的坚定性,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大无畏精神,坚强的党性。这里只举出他在中央党校的几个例子:

率先揭发炮制全国全党大量冤假错案的首要之一的康生,打掉他头上的“光荣的反修战士”的桂冠,为党历史上许多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扫清了道路。正如冯文彬同志后来所说: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和揭出康生,是这一时期中央党校立下的两大功。

针对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明知有错也不予以平反,胡耀邦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他说:凡查实为冤假错案,不论是什么人定的,也不论是何时定的,都必须一律平反,不能有任何例外,这就为打破任何借口,勇敢地坚持“有错必纠”原则,率先在中央党校做出了榜样。

有些人在过去的运动中整错了人,现在不得不为被错整的人平反时,总想给人家留下一些“尾巴”,保住自己一点面子。对此,耀邦同志的态度也是坚定而明确的,他说:凡是完全整错了的,平反时不得找借口“留尾巴”。他风趣地说:大量的中国人,走起路来都拖着一根尾巴,那不满街都成了猴子吗?胡的讲话,推动了平反工作的彻底进行。

胡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上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是他在当时党中央许多老同志支持下,忠实地创造性地执行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的路线和方针的结果。平反冤假错案所以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不仅仅是因为它使一个个的错案得以纠正,重要的是它向世人展示: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的,是自身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批评自我批评的结果,证明她是对人民真正负责的党。

中国共产党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值得我

们放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去估量。

早在1978年11月3日,胡耀邦就向《理论动态》组提出写一篇《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的文章,着重从苏联30年代开展肃反斗争的得失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经验谈起,指出平反冤假错案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所向,不仅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问题,也可防止一二十年后某些人利用这个来反对我们。

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国家有如多米诺骨牌一个连着一个倒塌下去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对此这里不可能全面探讨,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因,值得我们作对照的思考。这些国家在一连串运动中,在执行“左”的方针路线中,整错了很多,一直到苏东剧变,他们没有主动采取过大规模的、认真彻底的平反的举措。这是苏东国家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十多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本来被西方敌对势力看作是仅次于苏联的最大的眼中钉,他们巴不得中国也接着倒下去。但是苏联解体快十年了,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发生苏东那样的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也不可能作全面的探讨,而联系到本文的题目,至少应该这样说,引起苏东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导致剧变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中国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也就是在他们发生剧变的十三四年前,有的已经得到了解决,如平反问题,有的则是使人们看到早已进入解决的过程,而且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大有希望,如新时期党的总路线问题已经明确地得到解决,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在形成中正在逐步完善,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本身总结以往国内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反映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取得的,且可以设想,它将对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洛松)

为“两弹一星”殉职的郭永怀

● 金志涛 王士波 许运江
孙宗勇 田宏耀 卢杰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那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殉职于“两弹一星”已逾30年了,当年共和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又在秘密中运作,连郭永怀家乡的许多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故里探踪 乡人盛颂“聪明娃”

汽车从山东荣成市区一直向西南驶去,半个钟头的工夫就来到了郭永怀的故乡——滕家镇西滩郭家村。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户,这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读过私塾略通文墨的郭文吉知道读书的重要,在郭永怀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

郭永怀聪颖异常。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那年,郭永怀又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

郭永怀来到天津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与胡世华、陈振汉等发起组织了“微社”读书会。郭永怀活跃的思想表现和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被申又辰教授看中,于是便经常给他以重点指导。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

科班学习,这时他对光学又产生了兴趣,凭着数学上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他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得到了顾静薇教授的垂爱。顾静薇为他单独开“小灶”,郭永怀视野大开。两年后,顾静薇推荐他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郭永怀参加了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大物理系。

饶毓泰对他的才华和成就极为赞赏,1935年7月,将已完成学业的郭永怀留在了身边,做助教和研究生。郭永怀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积极参与各项实验工作。这期间,郭永怀参与了吴大猷等知名教授正在从事的“喇曼效应”的研究工作……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名额只有20人,郭永怀没有错过这次机会。

按原定计划,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留学名额因此增加到22人。

1940年8月,他们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郭永怀与他的同学们成了该校第一批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从此,郭永怀开始了他的长达16年的海外求学生涯。

纵横求索 异域他国扬功名

在多伦多大学,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等一起选择了应用数学系。除了学习本专业,有心的郭永怀还挤时间旁听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

和英联邦应用数学知名学者辛格教授的授课。

郭永怀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硕士学位。

1941年5月,郭永怀又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继续深造,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郭永怀提出要进行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大课题,冯·卡门教授非常钦佩他的胆略和气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年艰苦探索,郭永怀在跨声速流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因而获得了博士学位。

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突破声障是当时航空工程界的攻关目标。胸怀大志的郭永怀和钱学森共同合作,不久就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同盟。1946年秋,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康乃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共同主持学院的工作,久怀报国梦想的郭永怀欣然赴任。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后来被命名为著名的

PLK方法。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心系故土 报国之心关不住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乃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时机终于来了!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久,美国政府就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

在此之前,周培源、钱伟长等人已在1947年绕道欧洲回国。钱学森也在1955年回到祖国。

郭永怀的妻子李佩教授说:“禁令一旦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位置很不错的,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动倒罢,劝的



创建美国康乃尔大学航空系的五员大将。左一为郭永怀

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在力学研究所,我们阅读了郭永怀教授回国后于1957年6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给郭永怀的信中,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就在郭永怀回国前的9月份,钱学森又给郭永怀写了一封信:

永怀兄:

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了!

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像郭永怀这样一位已被美国多方关注的大科学家,一位美国数学学会会员,一位在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想走就走谈何容易!

就在回国前夕,郭永怀在他的房后园中烧掉了十多年来积累的一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李佩教授回忆说:“老郭的所有文稿,都十

分规范,这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啊!当我发现他在含泪焚稿时,急了,大声制止他,没想到他竟平静地说,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烧了,省得麻烦。其实也都早就在我脑子里了!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院长为我们饯行,是一个大型野餐会,老郭又当众烧毁了他的一部即将完成的书稿……”

郭永怀的一家和同他们一起归国的几位科学家终于踏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一惯守时的这条客轮却突然被通知延时启航。

李佩说:“船上有几个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专门检查中国人的行囊,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我这才知道老郭为什么要全部烧毁他的文稿了……”

历经波折,郭永怀回国了!他的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

郭永怀一回到祖国,就如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57年底,郭永怀参加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力学科技规划专业组副组长。

他和力学界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实际制定学科及其发展规划,使我国的力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到了现代化阶段。他和钱学森致力于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东方”1号宇宙飞船首次进入太空……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

他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仍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郭永怀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缅怀郭永怀的功绩,气动中心专门在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张爱萍将军书写了“永怀亭”三个大字……



60年代的郭永怀

临危受命 倾心尽瘁为“两弹”

1958年9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随后,美国多次进行了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一时间,核讹诈、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新中国的上空。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在京成立。后来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

核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核封锁难不住中国人民,毛泽东主席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央决定我们自己搞原子弹。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我们的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

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的实验和武器化。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

高原作业,加上要抢时间争速度,由于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再加上营养跟

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加重了他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常在试验现场风餐露宿。他们在这个不为人知的险恶环境中奋战着，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天一天地把研究试验推向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在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不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蒙受空难 常念英雄泪沾襟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一刻也不等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他匆匆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

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突然，飞机失去了平衡，偏离降落跑道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窜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异中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还特地叮嘱不让乘飞机。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强行登机，这次由于时间紧迫，他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时，大家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郭永怀却平静地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1988年12月5日，当郭永怀牺牲20周年的时候，他生前的老师、同窗好友、同事以及学生聚集力学研究所举行报告会，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张爱萍、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到会并撰写纪念文章。聂荣臻元帅、宋任穷、张劲夫等题词纪念。

从1991年开始，力学所设立了以郭永怀名字冠名的奖学金，作为对力学所品学兼优的研究生的最高奖励，如今已有30多位研究生获得了这项奖励。郭永怀当年培养的研究生中已有两名成为中科院院士。（责任编辑 吴思）

作者更正

我的文章《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载《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文中“李雪山政委”应是“李雪三政委”，谨此更正。

刘德荣

尚钺与少年金日成

● 陈 模

抗日战争初期 1939 年间，由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的孩子剧团，根据周恩来副部长和郭厅长的指示，分成两个队共 70 多人，到川东、川南各县巡回演出，我留在重庆的团部任秘书兼做重庆市的儿童工作。这一年的秋天，由于敌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我随第三厅搬到市郊区金刚坡下的张家湾村。

在张家湾住的除我们团部三个人，还有三厅的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尚钺先生一家。尚先生年近 40 岁，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他送大儿子尚琪、女儿丁莉莉加入孩子剧团，他的爱人丁月秋女士也担任孩剧一队的助理员，所以我们非常熟悉，晚上常在一起聊天。

建国以后，尚钺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我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辑，同住在北京，来往就多了。我逐渐地知道，尚先生是个老革命家，不仅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左联时期的老作家。他在 1928 年出版的两个短篇小说集《病》、《斧背》，均由鲁迅先生编入狂飚丛书，列入第一、第二册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他还创作了《案》、《缺陷的生命》（均长篇小说）、《狗的问题》、《巨盗》（均中篇小说）等，也写过不少文学评论，在文学界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尚钺先生 1902 年出生于河南罗山望族，幼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入河南省立二中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的宣传组织工作，是河南省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1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及英国文学系，听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尚钺寻求革命道路时，李大钊鼓励他到南方去。因为那里是革命的中心。1927 年的春

天，尚钺满怀激情地来到上海，准备迎接解放，参加革命队伍。不料，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尚钺跑到武汉去，汪精卫又背叛革命。他没有灰心失望，辗转来到开封，经汪后之同志介绍，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开封市任支部书记，当过《猛攻》编委、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长，年末回罗山家乡，在罗山、光山等县发动农民群众，举行革命暴动，开展游击战争。1928 年 1 月，尚钺两次被国民党逮捕，押在杭州陆军监狱。侦缉队对尚钺施以五次“老虎凳”的酷刑，他坚贞不屈，因而在狱中被难友誉为“五老虎”。鲁迅先生对尚钺被逮捕、遭受酷刑极为关注，遂请上海泰东书局经理赵南公出面，取保狱外就医。

1929 年尚钺出狱后，逃出杭州，来到哈尔滨，经楚图南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通过楚图南同志的关系，介绍他到吉林省会吉林市毓文中学，以教书作为公开职业，化名谢仲武，掩护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毓文中学在吉林省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校，也是国民党、蒋介石特务很注意的目标。这个时期，正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主张，“易帜”不久之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的许多活动，已开始由沈阳向吉林渗透。有的教员被收买了。教务处的高某，训育主任何某，体育主任马某，都是该校的老教师，这时都成了国民党员，并渐渐露出憎恶学生进步活动的言语和情绪，以多种方式破坏学生追求进步的活动，甚至将图书馆的进步书籍收藏起来，不准学生自由阅读。他们还异口同声地歧视占学生人数比重不小的朝鲜籍学生。

进步的学生们则在各班成立班会，出壁报，写文章，组织演讲会、辩论会，还订阅许多进步

报刊。

尚钺同志初进毓文中学，已知道学生中间存在着进步组织和活动，只是不清楚是共产党组织干的，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动的。他为了帮助党、团组织推动工作，选择了李大钊、鲁迅、高尔基的一些文章和作品，让学生阅读讨论，然后作一点启蒙式的讲解。

尚钺同志穿着朴素、平易近人，从不摆老师的架子，态度和蔼，无论汉族和朝鲜族的学生，都爱接近他。晚上，他的住室里常常挤满了学生。

在这些学生中间，有一个一年级乙班的学生，他是朝鲜族，长着圆圆的脸，稳稳当当，说话不多，但用词相当准确，他的名字叫金成柱，就是后来领导朝鲜人民解放祖国的金日成元帅。当时，他是一年级中新来的学生，常跟随其他同学来找尚先生。每次来他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尚钺很注意他这个特点。他感觉出金成柱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不大的年纪，却在精神的深处隐藏着祖国沦亡惨重的伤痛。

在金日成元帅著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由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第一部抗



尚钺在吉林毓文中学

日革命共有三章，第三章吉林时代里共有十节，第二节就是《尚钺先生》，有10页、6600字，在24幅照片中，就有毓文中学的7张照片，一张尚钺先生的照片，一张尚钺先生手稿的复印件，可见金元帅对这段学习生活多么重视，对尚钺先生多么尊敬。

这一节的开头，金元帅讲了毓文中学的环境，对该校的反动教员不满后，听说尚钺先生在1928年2月来当新语文教师，他是北京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同学们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他写道：

正是在这样的時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自然就精神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今天成柱同学来

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教师给予帮助。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的学生。”

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金日成元帅继续写道: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尚钺先生可谓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这样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来看。这会儿,我问老师说:“老师,你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的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

“老师,如果我要限制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只要您肯借书给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

“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



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时期的金日成

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

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点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轻声说:“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为独立斗争,我就以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住所。

尚钺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从叫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

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了我,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为着满足金成柱和许多进步学生的要求,

尚钺老师尽自己的能力并尽快地为学生批改作文。他常常在作文本子上写些鼓励进步和批判不正确思想的较长的批语。老师改的少或批语简短了,同学就感到不满足。尚钺对朝鲜籍的学生,着重地鼓励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朝鲜出卖祖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并激励他们友爱团结、光复祖国的爱国意志。

每逢星期日或假期,尚钺先生和许多进步的学生,常常到吉林市背后的北山或龙潭,或其他风景优美的景点去旅行。金成柱虽然平素很沉默,到了出外游玩的时候,总是显露出一般健壮年轻人喜好活动、爱说爱笑的活泼精神来,爬山、游泳、冬日滑冰,无不尽兴地玩着。他的身体很好,交谈中提的问题也多。所有关于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科学的问题,几乎没有不问的,但提问最多的,还是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问题。有一次金成柱问:“你认为安重根怎么样?”尚钺说:“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采用安重根式的恐怖手段是不妥当的,也不能解决民族灾难的问题。归根到底,要发动、武装广大人民,一起来推翻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才能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

尚钺先生感觉到,利用课堂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讲述,还很不够,于是他搜集了日寇侵华的各种史料,写了一份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的提纲,为毓文中学学生作了一个多星期的专题演讲。这个专题演讲,对在日寇直接、间接侵略压迫下的东北汉、鲜族青年,都是能够领会的。他看到金成柱听演讲的笔记,记得又清楚又详细。

尚钺先生注意到,当时在毓文中学的汉族和朝鲜学生中间,存在着某种隔阂,而金成柱和进步的汉族同学、朝鲜族同学相处却很融洽。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分子冯某,出面威胁校长李光汉,要开除学校里的进步学生,特别是进步的朝鲜籍学生,他说:“不把这些捣乱分子‘滴溜’起来(查出、驱逐之意),学校的课程就无法进行!”又诬蔑朝鲜族学生说:“这些‘高丽棒子’都是日本间谍。”从此,在毓文

中学国民党分子迫害进步学生,中、鲜进步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斗争,一天天地尖锐起来。

有一天,在学校教员闲谈时,体育主任马某就说:“这些‘高丽棒子’最坏哩。你们看,金成柱这家伙简直仇视我们中国教员!”尚钺先生立刻反驳说:“他年纪很轻,不知事的情形是有的。仇视中国教员的情形,我还没有发现。”马某立即说:“不要看他年纪小,心里鬼多着哩!”

尚钺先生怀着对反动分子的愤恨,常常辛辣地讽刺这些无耻之徒并鼓励进步学生与他们进行斗争。他教他们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从阶级分析中,认识、辨别谁是同伴、是朋友,谁又是敌人。使他们在阶级分析中,分清界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仇视敌人,憎恨敌人。

尚钺先生是个革命文学家,他善于给学生讲革命故事。使青年学生最感兴趣的故事,是列宁和高尔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的事情。列宁为推翻沙皇的暴政,在国内外坚持不懈地在工人中从事宣传、组织工作。沙皇的密探们牢牢地盯着他,伺机将他逮捕了。列宁在监狱中一刻也没有放弃革命斗争。他用牛奶写信,秘密地托可靠的关系送出去,指导狱外的斗争。

听到这个故事后,有的学生说:“咱们要学习列宁。”有的说:“咱们到苏联去。”金成柱却沉默着。尚钺先生问他:“你不喜欢到苏联去吗?”他回答道:“我很想到苏联去学习,可是不把日本鬼子赶走,在咱们这里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最要紧还是先赶走日本鬼子!”接着,金成柱问:“用牛奶怎么能写信,他又怎样同牢外的同志取得联系呢?”尚钺先生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比你们大几岁,也是一个大孩子,革命斗争经验还很少,不能完全回答你提的问题。我只能说,用牛奶写信,要写在特殊的纸上,收到信需要经过化学处理,才能显现出字迹……”

尚钺先生很自然地成为学生最受欢迎的教师。他组织的课外读书会,学生都乐于参加,他主编的《灿星》文学杂志,学生们也乐于投稿。知道哪天有尚先生的课,进步的学生都如饥似渴地盼着;尚先生讲课,学生们都专心留意地

听。尚先生注意到,在一年级乙班课堂的前两排学生中,每次都少不了那个年纪最小的、圆圆脸庞的金成柱。

尚钺先生指导学生作文,尽量尊重学生的个性。在很多情况下他让学生自己命题作文。这样,每周一次的作文,就有各种各样的文体,将各式各样的意见表述出来。最使尚钺先生难忘的,是金成柱写的文章。他有时写散文,有时写诗歌,有时叙事,有时议论,但他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反对日本强盗占领朝鲜,描述朝鲜人民因亡国而遭受的迫害和流亡异域的痛苦,歌颂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和冒险主义英雄安重根。

尚钺先生回忆到这里,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的是我的知识不足,斗争经验又缺乏,未能给毓文中学学生更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在学期末,就被毓文中学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欢迎’出来。”

1929年秋,尚钺同志转到黑龙江省昂昂溪市第五中学任教,与邹大鹏同志一起组织了反帝同盟,发动学生进行罢课斗争,反对反动的训育主任。尚钺同志遭到解聘后,于次年5月,经柯仲平同志介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任采访部主任。1932年4月,党中央派尚钺同志到满洲省委工作。1935—1936年又转到北平市委、宁夏中卫县工作。1938年4月,党的长江局派他到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建国以后,尚钺同志有过一段峥嵘岁月。1949年3月,他随华北大学进入北平,参加了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历任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50年代初期,他已年逾五十,除坚持讲授中国通史等课外,还要指导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研究生论文的写作,先后培养了四批共80多名研究生,编写了100多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1954年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力图用马克



尚钺晚年在中国人民大学

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简明通史。

1959年间,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尚钺和孙冶方、巴人分别被定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十年中,尚钺的身心和家庭再次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清醒的政治头脑。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尚钺继续担任历史系主任。他不顾高龄和重病,组织人力修订《中国历史纲要》,编写续篇。

1982年1月6日下午,尚钺同志因病逝世。

1991年3月23日,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诞辰9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领导知道我与尚钺相识几十年,也邀请我参加纪念他的座谈会,出席者不仅有人大领导、首都史学界专家,尚钺同志的女儿尚嘉兰,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的大使。人们缅怀尚钺同志一生的业绩,认为他的史学研究成果和他所倡导的学风,有着广泛的影响。朝鲜驻华大使在讲话中,特别表彰了尚钺同志对金日成元帅少年时期的启蒙教育,说他是金元帅的革命引路人,还说尚钺同志所写的与金元帅少年时期相处的回忆录,已为朝鲜革命博物馆珍藏。金元帅始终尊重尚钺同志,珍惜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朝鲜解放后,金元帅曾邀请尚钺同志到平壤去作客,作短期休养。

(责任编辑 吴思)

追忆胡绳同志

● 马仲扬

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的秘书从上海突然打来电话告我：“胡绳同志于今日8点10分逝世！”遽失良师，令我悲痛不已。

11月11日，我乘飞机到上海，参加12日举行的告别仪式。当“沉痛悼念胡绳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映入眼帘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随着排列得很长很长的胡绳的老友和新友，步入告别室，在哀乐声中，我听到了人们的抽泣。胡绳同志安祥地卧在翠柏丛中，我凝视这位对理论事业鞠躬尽瘁的无畏战士，向他致最后的敬礼。

胡绳与我第一次相见，是194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核心——重庆，现在算来已经6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香港，胡绳经东江游击区辗转返回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兼任《新华日报》编委，在生活书店主编《读书月报》；我当时在读书出版社门市部工作，南方局青委刘光交给我的任务是联络职业青年。我也经常去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联系。

在那种矛盾复杂交错的危险局势下，地下工作者的生死难以预测。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中统、军统特务横行，对共产党员或明打或暗杀。出入红岩村、周公馆、《新华日报》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的人，常常被特务盯梢。

当然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反对法西斯又坚决抗日的民主革命派，有开明的中间派，有各据一方的实力派等。那时既然国共合作，国民党顽固派也不能不受到国内和海外的某些条件的制约。

文化战线上的特点是，明暗都付之于书刊和新闻，谁也不好越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当时我们党提出：除了汉奸以外，都是争取团结

的对象，真正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精细准确，分寸得当，耐心说服，不能以势压人。在理论方面，既坚持原则，又态度温和。据我所知，胡绳在这些方面是出色的典型，人们公认他是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战士，又是广大青年亲切敬服的导师。他不仅在国统区是这样，在建国后的50多年仍然是这样。所以新华社对他逝世的报道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这是他当之无愧的。

闻名于国统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对三家领导人经常面示并帮助其解决困难，平时联系三家的是文委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三家逐步合为三联书店，总店先由重庆迁上海，后又迁香港。胡绳曾任生活书店期刊编辑、主编、直到总编辑。1948年，三联书店在香港正式成立后，他又是三联书店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我出席在上海的告别仪式，看到了方学武、岳中俊、丁之翔等不少老一辈“三联人”，不由忆起与胡绳在白色恐怖中共同战斗的岁月。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疯狂摧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新华日报》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首当其冲。韬奋愤怒辞去国民参政员，秘密离开重庆，胡绳名为伴行实为护送，先到达贵阳后分途转达香港。当南方局指令大批文化人撤离香港时，长途跋涉，陪同韬奋生活和活动的，仍然是胡绳。我读过胡绳写的有关韬奋的所有文章，文字虽有长有短，共同特色是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着重对韬奋思想的分析，既是韬奋人生之旅的真实记录，又是韬奋由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1948年,胡绳离港转奔解放区,在西柏坡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1949年9月,他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成员,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建国以后,胡绳出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和当时最受青年和干部欢迎的《学习》杂志社主编。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与胡绳相识或不相识,凡受过他直接或间接教益的,对他都会终生难忘。

我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那一段。自参加读书出版社起,业余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学习。那时大环境险恶,小环境却很自如。时间靠挤,学什么靠自选,读书出版社的领导都是鼓励和支持的。

我通过胡绳的通俗哲学著作,学习世界观方法论。胡绳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针对青少年的思想问题,语言生动,资料翔实,使哲学从迷惘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魅力的亲切读物。

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就曾经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成了我难忘的入门著作。他不仅从著作中诱导,也在行动上示范,我目睹他在红岩村和读书出版社之间的奔波,也看到他胸怀豁达,笑迎战斗的活力。我称他为启蒙老师,是发自心声的真实话。

1952年,我从中南新闻出版局调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干部班(9班)学习,并当了三年的学习委员。胡绳任马列学院一部主任,我们主要课程之一的中国近代史,由他讲授,他的《中国近代史提纲》,就来自这次讲课的讲义。

胡绳同志从我的启蒙老师变成课堂面授的教授,内容则由哲学变成历史。我每向胡绳反映学员对讲授提问和意见时,就见他房间里有几位辅导

员在场(那时不称助教)。我称他老师,他却向在场的人介绍是“老相识”。他对我的反映静静地听,有时还要记下来,以便及时解答。

他的讲课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他掌握了准确而丰富的资料,而且重要的是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联系历史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进行各种深入的分析,结论让学员思考和讨论。他对学员一向是亲切的平等的,从不居高临下,他不搞教训人的一言堂,即使有不对的意见,也是启发学员自己讨论解决。目的就是让学员逐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1955年,我在马列学院毕业后,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地址在西郊万寿路。

政治研究室是毛主席倡议重建的单位,延安时期曾有过政治研究室,撤离延安时就解散了。当时到马列学院去选调人的同志曾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拟着重研究理论,并亲自带领省委书记共同研究。调一些青年来作为助手,帮助书记查查资料。大家当然很高兴。

陈伯达是主任,胡绳、田家英是副主任,下设哲学、经济、历史、党史、党建等若干组,还有图书资料等部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胡绳和田家英。

在办公楼里还专设了毛主席、陈伯达、康生的办公室。毛主席始终没有来过,也很少看到陈伯达来,倒是在政研室不任职务的康生经常来。他来干什么,同谁联系,我都不知道。刚来时



胡绳 1996年在湖北蒲圻

向我们传达了一条纪律：在中央机关工作，不关自己的事不许乱打听，就研究自己的业务。

我分在哲学组，由胡绳分管，党的小组，胡绳参加，我是党小组的组长，胡绳和其他党员一样按规定过组织生活会，若有事就事先请假。胡绳曾问我在马列学院过组织生活的情况。我说：我们一个支部60多人，我是学习委员，主要任务是学习，交流学习体会是自由讨论。他说：我们整个机关，还没有你们那个支部的人多，机关新建，前几年主要任务也是学习，要有连续性。

从此以后，我在业务上由胡绳领导，又在一个党的小组过组织生活，接触、交谈就多起来，我一再向他说，我基础太差，哲学没有系统学过，欧洲哲学和我国古代哲学都不大懂，我们组的10多人，有的比我强。他鼓励我：我们都曾经受过磨难的考验，只要发奋，把搞地下工作的那股劲头拿出来，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胡绳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治学严谨，勤奋笔耕，平易可亲，以理服人，清廉朴素。他虽然当过许多领导，从来没有人称他什么官衔，他是具有学者风度的楷模，也是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据我所知，政治研究室一些新人的作品，好多都是经他修改推荐给报刊发表的。

1958年《红旗》创刊之后，政治研究室迁入沙滩五四大院，与《红旗》合署办公，陈伯达、胡绳为红旗杂志总编和副总编，政治研究室原领导未动，同中宣部同院同楼，三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政研室下边的机构和人员有些变化，大部分人分到《红旗》各编辑组。政研室还保留三个组，原哲学组改为“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党史党建组由田家英分管。1958年秋起，我负责“思想界动态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领导反映思想理论界的新的动向，编辑内刊《思想界动态》，其资料来源是大量的报刊和书籍，每星期五召开一次座谈会，主持会的有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我和丁伟志是会议的司仪，介绍会议的主题或代读重要的文件，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这个内刊是由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轮流编辑，送胡绳

签发付印。胡绳在《红旗》上开辟的《思想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的是经胡绳定稿刊出的。后来的“施东向”变成胡绳为首的共同笔名。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给《思想界动态组》的20来位同志分头查阅《列宁全集》，摘出大量卡片。胡绳告诉我：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生动活泼，引人喜读，不要枯燥乏味，时间较急，务必抓紧。为此，我特请了姚锡华同志与我共同编选。我们紧张地、精力集中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把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论述在代表团赴苏之际赶了出来。先在《动态》上发表，胡绳很满意，很快地得到了毛主席批示，全文在《红旗》发表。人民出版社出书时书名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署名为“郑言实”。

这一段的工作，对我以后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记得有一次要我查“山穷水尽疑无路”出自何经何典，说毛主席要这个材料。我发动了动态组的近20位同志，访问了许多文艺单位，还探询了何其芳主管的文学研究所，都无准确的答复。后来我去绍兴酒厂调查，对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作了一番实地考察。陆游是绍兴人，绍兴酒的水源是鉴湖，那一带的确是山水相间，觅路很难，所以陆游才写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那时，估计可能误传而出。但我仍没有找出“山穷水尽”的原始来历，至今每看有人用“山穷水尽疑无路”，都感到内疚。

1964年中央决定以政治研究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任院长，胡绳任副院长，我负责哲学组，党小组长是丁伟志。从全国各综合大学中选调了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另从中央党校和写作班子中调了一批骨干。人到齐，就到农村搞“四清”，接着又到工厂搞“四清”，“四清”未了，“文革”就起来了。胡绳未到研究院就被批斗了。从此，我与胡绳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可是师生之情没有断，他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他相识60年，从来没有见过他愁眉苦脸，他的面容总是呈现青春活力，高兴起来谈笑风生，平静下来不是分析情况，就是议论理论。我们都喜欢游泳，时常在游

一幅令人难忘的血缘亲情图

● 何 标



左图是 50 多年前台湾《文化交流》杂志的封面。图上写有“台湾”字样的幼儿，正扑向张开双臂迎接他的祖国“母亲”的怀抱，形象地表达出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时，两岸同胞那种深厚的血缘深情。

辈黄呈聪先生，就不畏强权在 1923 年 1 月号《台湾》杂志中写道：“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母子生活关系情浓，不待我多说，大家的心里已经明白了。”

《文化交流》杂志创刊于台中市，第一辑于 1947 年 1 月 15 日出版，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人兰更与（远澄），主编杨逵、王思翔（张禹）。杨逵（1905——1985），台湾台南人，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即为台湾进步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历经坎坷，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光复之初，他提出“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以后又多次发表文章，“疾言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托管论”。后虽因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坐牢达 12 年之久，但其热爱祖国，切盼国家统一、富强之志终生不变。

现正妄图斩断台海两岸亲情关系、进行分裂国家的那些人，重读这幅图画，难道不为自己的数典忘祖而愧疚吗？

用母子亲情形容台湾与祖国的关系，是老一辈同胞常加引用的比喻。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文化革命前泳池里谈健身，他说我游的好，我说不过快一点。他自患重病起，就少游和不游了。我到医院和他家中去探望他，我总对他的病愈满怀信心，还曾向他推荐过一位老中医。现在看，我的预想落空了。

当我写这篇稿子时，心情是沉痛的。从上海到北京，写写停停，仍在迟迟进行。初稿放下后，我听说了关于不久前胡绳在南方出游的故事，又看了胡绳的孙女胡云珠写的《怀念我的爷爷》一文。感到有以下几点补充的必要。

一，胡绳带病出游，是外出调查，特别到他熟悉的地方，他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以便作纵的历史比较和横的差距比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向是他思考的理论问题，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新意，实际上是探索、是创新，根据是正在步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他的调查，出于结合具体实际和时代的需要。

二，今年春节，我曾与胡绳留影，但胶片冲洗出来，前几张全是空白，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我发现要补时，他已外出，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三，看了小云珠的《怀念我的爷爷》一文，使我感到惊奇，文中说到祖孙二人在书房里背诗测试的故事。胡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选》上册，告诉她：你随便抽一句，我对下句，云珠说一句，胡绳对一句，结果，无论抽到哪里，他都对到那里，甚至页码胡绳都说得出，云珠问爷爷为什么这样熟？回答说：在干校一边打扫厕所，一边读唐诗，这是当‘臭老九’的“成绩”。

我惊奇的是胡绳偌大的年纪，记忆力不衰，智力不减，若他能增寿的话，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洛松）

漫谈陈独秀

● 曾彦修

我的体能和智能都不允许我对陈独秀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了,因我已 80 多岁,无能为力了。但 30 年代初,尤其在陈独秀于 1932 年被捕时我看到全国名流的一片抗议与声援之后,才找了陈独秀的书来读,即种下了钦佩陈独秀的种子。那时还不知道苏联的托派及中国的托派都是德、日的“间谍匪帮”,等到 1936 年苏联第一次公开大审判,平沪宁各大报均有大量报道时,我已经只当作新闻看而有点怀疑其为真事了。因为,这等于说中国的同盟会除了孙中山以外,连黄兴等人都是日本间谍一样,叫人不可思议。所以,康生 1938 年 3 月在延安发表的文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每月出三百元收买的间谍,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对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态,从未相信过一丝一厘,又觉三百元也太笑话了,这还不及 20 年前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时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么想出来的。我看当时同在延安的同学、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我 1939 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研究室的同学马子静(后来改了名,在社科院法学所),是康生的同乡,时常用开玩笑的办法来挖苦康生,他学康生讲话的声音说:“肃清民族公敌日寇汉奸托洛茨基匪徒——康生”,康生是文章的署名,故意一气念下来,这个罪名就落到康生自己头上了。1980 年我见到马子静时,还互相回忆了这个笑话一番。总之,我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 11 年 3 个月,从未听任何一个人重复过康生的这句话,可见大家在心里都是不相信康生的。

我这个漫谈不是学术研究与考证,但不知是否可供专家们在研究陈独秀时提供一些拓

宽考虑问题的角度。

前几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我看陈独秀》短文,千把字,一点感想而已。大意是说,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稀有伟人,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稀有伟人。发表后麻烦不小。其实,我那意见,是属于放空炮性质,引经据典的论文,已非我所能担任了。

但该文只是我原稿中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就把余下的部分补述出来,因为这两三年情况已大变,尤其是把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通通归在陈独秀身上,有些学者根据无数确切材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多年的说法,认为这罪名另有来历。既然这个最尖锐的问题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么其他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谈错了再反驳就是。我认为,对陈独秀比较彻底的平反,其实只能提高党的威信,而绝不会降低党的威信。今日对胡耀邦,谈者对之无不极表尊敬者,无他,均佩服其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之感人精神与勇气而已。对陈独秀的平反问题,只要不把外国领导人的名声、利益放在高于中国民族利益的地位,据实予以必要的平反,我以为是不算太困难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共的一个主要缔造人,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反就成了什么坚持高举之类的东西呢?说不通的。

一、第一个号召中国人“用头立地”的中国人

大家都比较熟悉,恩格斯晚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有一段著名

的、经典性的论述。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04-405页）

恩格斯这段著名的像诗一般雄伟的语言，对14世纪以来几百年欧洲文艺复兴即反封建反神权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了一个深刻总结。这个运动在中国也发生过，不过时间很短，真正比较集中进行的，如果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发刊《新青年》杂志算起，不过十来年。

是谁在中国发起和全力推动中国人民也应该“用头立地”，即人人都应该有独立的、自由的、解放的思想，要用头脑立在土地上行走，而不是一生生活在盲从、愚昧和奴隶状态中的人呢？正是陈独秀。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用头立地”的思想伟人，正是他号召中国全民族都应该进入一个“用头立地”的伟大时代！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可是，几十年来都是用李大钊来代替一切，这就同毛的正确说法相对立了，毛在这里却说得很清楚，李大钊同志不管功劳多么大，但毛泽东仍是把他归入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之一。

二、陈独秀一出马就是民主与科学道路以及改革、开放的倡首者

陈独秀为中国应走的道路而发表的第一个纲领，是他早在1915年为《新青年》（第一年名《青年杂志》）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

一文。他在文中宣布该刊的六条宗旨是：

-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
-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2）
-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3）
-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4）
-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5）
-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6）

实在的，民主、科学、开放、改革这里都讲了。这里的第一条讲的是民主问题，即自由思想与反对奴隶式服从的生活态度问题。第六条讲的是要相信科学与发展科学问题。第四条是明确地反对闭关锁国，中国必须投入到世界中去“开放”问题。第五条在表面看似仅仅是个反对形式主义的问题，但这事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因为一切封建旧礼教都特重繁文缛节，把这些象征天命、皇权、尊卑、贵贱的繁琐礼仪，发展到了隆重骇人的程度。至于二、三两条表面看似只是一般地提倡积极向上精神的，但是它也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因为封建社会所要求的，正是消极、保守、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精神状态，所谓“三年毋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所以，这二、三两条，解释成是陈独秀在热烈提倡改革精神，反对陈陈相因的保守主

义,也是自然的,而非有意拔高。当然,陈独秀在1915年所提出的这六条纲领,应该说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还是不够明确坚定的,但他在1915年时已经具有民主科学的迫切要求,沟通世界的开放要求,不断改革进步的要求,等等,则是非常明显的了,这样,他就不能不是当时一切先进中国人中最先进的领袖人物了。

邓小平1982年给北京育才学校的题词,指出中国的教育必须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道路。实际上,这首先就是整个中国必须遵循的前进道路。而陈独秀的上述六项主张,当然还远远比不上邓小平那么明确、规范,但说陈的这些主张已具有邓小平这“三个面向”的某些萌芽与滥觞,或者说具有某种雏形,则不能说是夸大。因此,在谈到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问题时,陈独秀之不应被湮没,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三、陈独秀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评价他时必须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前提

评价陈独秀时还要看到陈独秀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而不是简单地属于某一阶级或某一党派或某一民族的。这是陈独秀这个人的根本历史特点。在这点上,陈独秀同孙中山是一样的。因为陈独秀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为中国现代化而终身奋斗的实践,为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新中国的实现所作的号召与努力,是最真实地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因而,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便成为一个带有是否坚持爱国主义的问题了。如果你把全国各民族的瑰宝当成一块顽石来看待,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是否坚持爱国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现在是到了不能不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再不能把金玉当成顽石,把芝兰当成秽草了。毛泽东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管陈独秀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时期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错误,但究其一生对全国各民族的长远贡献说来,终究后面这件事才是决定性的大道理。中国要现代化,就不能数典忘祖,陈独秀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最先起来奔走呼号者之一。

四、对陈独秀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

对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如何,事实上要牵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在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正确口号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从发展科教本身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民主与科学是改造和振兴中国的必由之路的第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有文章特别论述陈独秀不是政治家,自可讨论,不过我不大同意此说)。在中国,不仅自然科学界的新老专家,还包括人文文学界的新老专家多对他持赞美和拥护的态度。陈独秀更主张开放政策,历来主张研究、吸收西方民主主义的一切文化与科学成就。所以追本溯源,第一个对世界先进科学文化采取异常热烈欢迎、学习态度的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也可以说,陈是中国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第一个提出者。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专家,大多都对陈独秀抱有好感、导师感、启蒙者感。贬低陈独秀,抹杀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会使这些知识分子感到不平与惶惑,甚至会使他们感到仍在受压。

第二,从政治上说,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大都对陈独秀具有尊敬的、最低限度也都不敢对他采取无视、否定或侮辱的态度。左派、中派不用说了。什么叫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我在这里很慎重,不敢说胡适就是右派,因为,过去内心里赞成或基本上赞成胡适的人多得很,现在有很多学者也是如此,但这些人无不很爱国,便不好轻易叫他们为右派了。因为现在不少同志的心目中,所谓“右派”,乃是“敌我矛盾”,即敌人,所以不好随便乱加此项头衔的。有些人,其中有的甚至是国民党特务头子,他们又确确实实是知识分子,而且多是留学生,例如,陈立夫(指20年代至解放前时期)、张道藩、徐恩曾、潘公展、陶希圣……这些先生,以及“一二·九”运动时,在全国几乎是惟一的公开出面反对学生运动的北师大物理学教授杨立奎这类人,他们就不能不是知识

分子中的右翼了。可这些人都有一定的聪明，常识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去戏弄、贬低和侮辱陈独秀，这样做，会激起公愤，对他们个人很不利。这就是说，在解放前，几乎所有右得不能再右的上层知识分子们，也不会傻到去攻击陈独秀的。因此，我说，攻击以至于侮辱陈独秀，是中国许多新老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的。

解放前，毛泽东对于陈独秀作过中肯的评价，1936年他对斯诺说陈独秀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结论很明显，对陈独秀是以肯定、赞扬为主，还是以抹煞、否定为主，都可能影响到现在以及今后知识分子的心态。毛泽东讲过“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话，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实践毛的这一提法。

五、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文化思想运动，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王观泉的一篇题作《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文中，看见他引用姜义华论陈独秀文的一小段（原文我至今未读到）：“陈独秀倡导科学、民主、社会主义，改变了20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基本观念，基本取向。他用新的学理武装了整整一代精英分子。……陈独秀对20世纪中国整个大众文化影响之大，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恐怕也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以为姜文抓住了一个带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使我深受教益，这就是：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原则上改变了两三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人生价值取向。自先秦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历史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用民间的通俗说法，就是升官发财，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儒学的孔孟等则把这个“价值取向”经典化了，叫做“学而优则仕”，叫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这个训示确实直“通”下来，通到陈独秀出来发动他的新思想文化运动之前都是如此。教人读书为了什么？“教忠教孝”而已；

自己努力读书为了什么？“学忠学孝”而已。忠于谁？忠于帝王一个人和他所需要的一切上层建筑。过去读书人家在门两边往往悬有或刻有一副对联，叫做：“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就是孝的放大，孝的归宿。读书人必须移孝作忠，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两千几百年来，都必须是舍孝取忠，为皇帝老子一个人牺牲一切。两千几百年来，一切读书人的最高目的，就是大小能够取得一个官做，把自己变成这副庞大复杂的皇权机构中的一个小零件或螺丝钉。成不了螺丝钉的，也要成为这个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漫天罗网中的一个小小帮凶或牺牲品。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而且有很多非常好的、极其优秀的部分，历史上责备做官者和读书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指摘他们违反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良的、可敬的、永生的道德准绳，但本文非谈此事，故一概从略。

问题是，在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以前，两千多年尤其是宋以来近一千年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网罗、箭戟和污垢是太大、太密、太残忍和太黑暗了，古代文明中积累下来的美好训示与愿望，已被压制得越来越褊小了。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早已成为维护落后的、消极的、以至凶残的封建纲常伦理制度的主要力量了。广大的大小知识分子则始终在这个网罗中主动地害人或被动地受人害。我们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同外国先进国家比起来，当时不是落后几十年而是落后一百年甚至二三百年来。人家已经进行过的民主主义的“文艺复兴”、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工商交通贸易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发展，都在我们之前的一二百年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广大的大小知识分子们还是处在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网罗中，还不知道科学、民主与机械化的大生产为何事，现代化为何事，还在学而优则仕的牢笼中奋斗，还在吃人或被人吃。就是说，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来说，在陈独秀起而启蒙时，基本上还是处在混沌、沉睡与谬误的取向之中（升官发财，努力做人上人）。而知识分子则是社会的温度计和晴雨表，这说明我们整个的民族在陈独秀起而奔走呼号时大致上也还是处

在沉睡中。

这就是西方人说的，中国那时还是一只未醒的睡狮。

陈独秀和他所发起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就是要唤醒这只睡狮。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触动这只睡狮神经中特别敏感的部分，即触动它的眼睛和耳朵，让它睁开眼睛来看看世界的多姿多彩，竖起耳朵来听听地球上的风声雨声和电闪雷鸣声。

中国这只睡狮的眼睛和耳朵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知识分子。所以，陈独秀做的工作，首先就是解放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工作。因此，陈独秀掀起的新思想文化运动首先必须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作电闪雷鸣般的呼号和轰击。他的这个呼号和轰击得到了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一大批知识界猛士们的同心协作，他们不比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大师们差劲，他们勇敢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救救孩子”这些口号。

所以，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新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确确实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工作。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大体上明白了，他们的任务是在为挽救国家的危亡，

为争取国家的现代化而服务，而不再是为维护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或某一个人服务了。

这样的历史功勋，难道还不能够永垂史册，不应该永垂史册么？

六、陈独秀是同时代杰出人物中的凤凰

要评价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就不能不大致看看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那时，中国正是处在混乱、黑暗而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候，因此就显出陈独秀的特别难能可贵，更加表现了陈独秀这只海燕之不怕暴风雨的突出坚强性格。如果看看这时期的革命先进人物以及曾经先进过的一些代表人物，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问题就特别明显了。例如，孙中山先生于1914年在日本将原来的“民元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这一行动实际上并没有为他领导的革命寻得任何新的出路。他所总结出来的教训是新的中华革命党必须完全服从他个人，实际上缩小了团结面与群众基础。而在行动方面，孙是更加注意于一些小型的无胜利希望的军事起义。事实上，孙本人这时期已处于茫无头绪、作用大大缩小的困境中。另一个曾经先进过的严复，则在陈独秀《敬告青年》雄文发表之前一个月就参加了公开号召恢复帝制、劝请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的活动，而且名列于五个“筹安会”劝进人物中。至于康有为则整天梦想的是宣统废帝如何能够复辟，以至1917年军阀张勋在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时，康有为竟公开成为张勋最有力的支持者、策划者，并参加了一切复辟丑恶活动。

即以贤明如蔡元培先生而论吧，1914—1915年时，蔡先生正避居于法国南部一小城中，以撰写《红楼梦索隐》一书消遣，而观点则恐怕正是蔡先生的“光复会”式的小说家言借以寄兴的吧。从此事，可见蔡先生当时也尚处于苦闷无计的状态中（蔡先生写《红楼梦索隐》的具体时间、地点，是不久前湖州张建智先生告诉我的，谨此致谢）。

凡此都可看出当时中国的黑暗、混乱和消



沉于一斑了。陈独秀在中国如此黑夜沉沉的情况下登高一呼,它所起的复苏万物、萌发百卉的作用,是何等巨大!说陈独秀是为中国窃取光明之火的普罗密修斯,完全是事实,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多么黑暗啊!

七、陈独秀的呼号在亚非拉地区也应有他杰出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的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重大历史贡献,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因为,那时除了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北美之外,全球一切落后或相当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亚洲、大洋洲,可以说都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陈独秀发起的这样一个战斗的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以日本而论,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启蒙运动的,但这个“启蒙”可惜又是同鼓吹对外侵略、首先是占领朝鲜与部分占领中国的鼓吹联在一起的。在19世纪最后十年,即使他们最著名的民权运动代表人物在侵华问题上竟也抱支持态度。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197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一书中说:“日本人,不用说天皇制官僚和统治阶级,就连最先进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也如此深入而广泛地被帝国主义思想和心情所束缚,人民摆脱其束缚的困难可想而知。”(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53页)日本的经济的发展虽然走在了亚洲最前列,但他们对亚洲、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并没有起过什么直接推动作用(对富国强兵的变法自强运动当然起过某些推动作用)。中国的进化、民权、自由等思想,还是直接从欧洲带回来的(以及传教士们附带传进来的)。当然有的人是从日本的西文译书及受课中学习来的,但不是从日本的社会生活和运动中学来的。陈独秀这个窃火者之特别可贵,是他把窃来的火种,在中国燃烧成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熊熊之焰,他既不是为了修补清廷的皇权统治,更绝不是为了走日本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19世纪前30年出现了一批领袖,出来领导反对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军事占领与白人的庄园主奴隶制度的战争,但他们是带着欧洲思想的欧洲人,这同

纯属本土人的独立解放斗争并不全同。那里原来的社会还是比较原始的,并没有一套像样的神权、君权与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相应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所以,在那个广泛领域并没有发生过那么一个广阔有力的、持久的文化思想上的民主启蒙运动,当然也就不曾发生过像中国反对“吃人的旧礼教”这种类型的群众运动了。

所以,你如果放眼去看一下当时广泛的亚非拉情况,你就不能不承认,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当时全亚洲、全非洲以至全拉丁美洲杰出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呐喊者和最先进的战士。陈独秀在那个时期全球一切落后国家和地区内,都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最先进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领袖,一个真正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的普罗密修斯。

所以,你如果纵看几千年、横跨亚非拉,你就可能毫不迟疑的去正视陈独秀的突出历史地位了。

八、陈独秀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建人,是光荣还是耻辱?

陈独秀在中共建党初期,是一个主要的建党号召人和筹备人,一个建党时期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这是确切的历史事实。抗日战争以后,对此即避而不谈,即使谈也是一笔带过,说陈不过是那时若干个小型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之一罢了。近若干年甚至出现了一种奇之又奇的说法,说中共之所以在1921年至1927年五次党代会上连续选举陈独秀为主要领导人(总书记或其他名称),是由于党的幼稚的原因。即那时的代表们都是分不清好坏的人,所以才把陈独秀错误地选到主要领导岗位上了。这类说法真是过于幼稚可笑,这是把历史研究当成信口开河,也把20年代的中共代表们全都当成傻瓜了。而且,1921年中共的一大上,那时陈独秀在广东开辟工作,陈是在本人缺席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当然是在众望所归,非陈莫属的情况下才能当选的。

毛泽东同这类曲解家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毛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党的“七大”

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毛在这里直接说“创造了党”，文意是很明白的，很难任意作其他解释。

几十年来，为什么绝对不谈这件事呢？大概是由于陈独秀后来被中共开除了，以后，陈曾一度加入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并成了他们的一面旗帜。在这种情况下，据实说明陈是中共

的主要创造人，岂不辱没了党吗？

我以为，事情正好相反。中共有陈独秀这样不仅是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中国当时一位最先进、最受青年爱戴的伟大人物，而且也是当时一切亚非拉的一位最先进的历史人物作为党的主要创建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而决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只要想通了这一点，那就一通百通一切都可以据实直书，而无所用其忸怩与回避了。

我这篇确实是大而化之，不足以跻身于学术之林，夸夸其谈之讥，也不敢辞。大而嫌空，但非全空。如能得到某些求真务实的学者一顾，对其中可参考者参考之，不足参考者弃之、驳之均可。

（责任编辑 方实）

代 购 代 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师 哲	32.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代 苏采青	59.80	5.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知情者说 第二辑（共八册）（邮购全套八册邮费 12.00 元）			
之一	肖思科	15.70	3.00
之二	张树德	13.90	3.00
之三	魏敬民 徐 林	15.10	3.00
之四	程 瑾 朱 仁	14.50	3.00
之五	万 须 木 心	13.90	3.00
之六	山 椿	15.10	3.00
之七	庄 园 郑宏颖	14.50	3.00
之八	范广群 霍 岩	13.90	3.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海丝	杜明明	28.00	4.00

《知情者说》是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该书介于历史与纪实文学之间。它的特点是少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份而追求材料的真实可靠和鲜为人知，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第二辑收入了共和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实录，并配以珍贵的历史照片。

《回首文革》上下两册各自汇集了三十六七篇文章，上册侧重总体分析，下册偏于事件介绍。作者阵容整齐，皆为高层当事人和权威级研究者。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为人处世齐家治国必有规则，规则却未必明说，明说的又未必当真。这本书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咀嚼中，品出了一些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不明说的规矩。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 1 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聆听毛泽东在延安的五次讲话

● 曹慕尧

“喜从天降”与“西天取经”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和陈云三位党中央领导人,从苏联回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央首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洛甫)总书记、秦邦宪(博古)等党政军负责人、机关、学校、部队及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机场上召开了极为隆重的群众大会。

当时,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三大队第八队工作,率本队一百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规模盛大的欢迎集会。我站在队前,对回延安同志下飞机的情况,中央首长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致欢迎词时热情洋溢的讲话,都看得很清楚,听得很仔细,留下的印象很深。

初冬的陕北黄土高原已相当寒冷,欢迎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首长们,骑马到机场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嗡嗡、嗡嗡的声响,自空际传来,由远而近,不多时,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出现在延安城的上空,转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徐徐降落。随着舱门打开,从舷梯上走下来四个人,除三位中央领导外,还有一位苏联朋友。他们身穿飞行员皮夹克,头戴毛茸茸的黑色大皮帽。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来者一一拥抱,互致问候,其他首长也都一拥而上。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硬是给毛泽东戴在头上,自己换了布棉帽。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也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如此高兴。整个会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领袖们的热诚友爱,亲密无间,显示着党中央领导人磐石般的团结,显

示着中国革命事业前程似锦,胜利在望。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了这次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题目是《喜从天降》。他说:今天是我党大喜的日子,中央三位领导同志,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骑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不是喜从天降吗?同志们会问:他们去昆仑山那边做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到西天取经。你们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做《西游记》,里面讲唐僧师徒四人,历尽艰苦,克服困难去西天取过经,却不知中国共产党也派人去西天取经,唐僧去的西天叫天竺国,就是现在的印度,他们取的经是佛经。咱们去的西天是苏联,取来的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经可比唐僧的经用处大,它告诉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美好新社会。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本经,认真贯彻这本经,根据这本经的精神去干工作、闹革命。真正精通了这本经,革命就一定能胜利,新社会就一定能建成。当然,精通可不是死记条条,而是会用,用经上讲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说,马列主义要中国化……

在王明、康生讲话之后,陈云同志第三个登台致答词。他表示:自己对这本经学得很不够,取经不过起了通信员的作用,认真学习这本经,才是全党的严肃政治任务,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和全党同志一起,把马列主义学好,研究通。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在革命斗争中使用,不是摆样子看,这一点与和尚念经有根本性的不同。学了马列主义之后,要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条件去工作、去闹革命,决不能生搬硬

套。马列主义的理论,是革命运动的指南,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确实十分重要,但是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按实际情况办事,否则,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

陈云同志致答词以后,那位苏联朋友也登台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博古同志为他做翻译。

毛泽东的欢迎词和陈云的讲话,时间都非常短,却使我受益匪浅。“喜从天降”这个富有诗意的新鲜标题,极其形象化地表达了当时当地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是去是留,请发表高见

1938年初,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员毕业,要奔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时,长期在抗大担负教育工作的干部,许多人思想波动,也想到前线去轰轰烈烈一番,不做思想工作,将影响到抗大第四期开学。当时,主持抗大实际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先担任教育长,后提升为副校长),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请他给大家做思想工作。

初春的一天上午,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共百余人,集合在延安城东门外的延水河畔。检查一遍军容风纪之后,罗瑞卿教育长把我们带进城内西山(凤凰山)脚下一所长条形的院落,那是毛泽东的住处。

我们排成四列横队,席地而坐,把院子挤得满满的,毛泽东站在院落中间讲话时,连一张小桌子也没有。恰巧那天我坐在对面,距离毛泽东不到一公尺,他的膝盖正对着我的眼睛,破旧的棉裤上,有两块大补丁非常明显,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表示问候,他称赞说:“由于大家的辛勤劳动,学校已经培养出大批优秀骨干,很受部队欢迎,前方不断来电,要求尽量多派一些抗大毕业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领导迅速发展的抗日队伍和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

接着,毛泽东就讲起了当前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和扩音器,毛泽东放大嗓门高声讲话,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小本

子,依托自己的膝盖,边听边记。散会之后,大家进行讨论,核对笔记,形成资料。

主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迫切需要办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办一份全国性的大报纸,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阐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件事已经办了,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面向全国发行;第二件是办一个全军性的大学校,培养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就像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党帮助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那样,培养北伐军的领导骨干。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就落在抗大全体干部的头上。现在全国人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三面大旗:一曰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曰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的男女青年,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成群结队向延安涌来,我们设在南门外的接待站,每天应接不暇。这些青年人要求来延安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学习中国革命的道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拒之于门外,让他们乘兴而来、扫兴而返呢?还是留下来办学校,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骨干,毕业后去领导人民抗战呢?

“你们都想到前方去,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种精神可嘉,愿望甚好。但是要仔细想一想,抗大还办不办?如果大家都走,让罗瑞卿同志一个人去办抗大吗?局部要服从整体,组织上该不该把学校关门停课,去满足你们个人上前线的要求呢?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必须动员全国的人民群众,把人民组织起来,一齐去参加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现在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高,迫切需要干部去领导。究竟你们这一百多人到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你们的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发挥的作用大?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利益出发,你们做个比较,自己去回答该不该到前方去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站在党的立场,从党性原则上做结论吧!”

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怎么办?

请大家发表高见。”原来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求去打日本满有道理,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过去驰骋疆场,习惯了戎马生活;现在前方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正需要我们去冲锋陷阵。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即刻便感到自己担负的责任重大,局部要服从整体,没有理由离开学校了,你瞧我,我瞅你,面面相觑,心里觉得内疚。有的人伸了伸舌头,作个鬼脸。

毛泽东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接着讲:看样子你们没有不同意见,这就很好,应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每个人都要下决心,在抗大工作四十年,死了就埋在清凉山,守卫这三面大旗,多光荣啊!

一句话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毛泽东讲完之后,掌声雷动,群情振奋,原来愁眉不展的脸,一个个笑逐颜开,精神舒畅。毛泽东不论是即席讲话,或是讲课、作报告,从不照本宣科,他没有写好的讲稿,只有一个简要的提纲,每次除把预定的问题讲完之外,还允许听众写条子当场提问,谁有不明白的地方,写个便条,交给坐在自己前边的同志,迅速就传递到他面前。通常由值星员(抗大集会时,由各级指挥员轮流值星,负责调动队伍,维持会场秩序)汇集起来,交给毛泽东作解答。有些学生采用新闻记者的手法,提的问题很古怪,也能得到圆满解答。

关于“爬山主义”等等

毛泽东讲话、作报告和上课一样,每次是半天时间,中间有20分钟休息。毛泽东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和学生谈话,问长问短,了解他们来延安前的情况,也询问他们是否听得懂讲话内容。那时我的好奇心很强,几次趁机趴在小桌上,仔细翻阅了讲话提纲。

毛泽东喜欢用毛笔,写在白毛边纸上,字的大小不一,有的如同花生米粒,也有的像黄杏或红枣那样大,而且大小间隔配合,字体苍劲有力,书法流利,涂改的地方也不誊清,看样子准是一气呵成。我们现在用的稿纸,每页写三四百字,同样大的毛边纸,他只写七八十个字,甚至更少些。我特地数了一遍,这次讲话提纲列出了

十个问题,有的问题下面还分几点,共用了六页毛边纸,可惜大部分内容没有记录好,都忘掉了,只剩下三个问题:“爬山主义”、“劳动大学”、“与工农兵结合”,记得很清楚。这些问题标题很简单,只有寥寥几个字,可是每个题都讲出一大篇道理,整理出来就成一篇好文章。现在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中有许多文章,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抗大和其他院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经过整理而成的。

“爬山主义”这句话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原来抗大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出早操,经常有一个爬山项目,恰巧驻地附近又有这个方便条件。延安城处在群山环抱之中,西边的城墙,就建在凤凰山上,依山就势,高低弯曲。城外东北有清凉山,东南有宝塔山(真名嘉岭山,因上面建有一座高塔,人们习惯称为宝塔山)。此外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山,都被抗大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身体弱,累得够呛,爬山老是掉队;请假不去,又怕别人说落后,心里不高兴。有的发牢骚,向队里的领导提意见说:“学会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革命;搞爬山主义,究竟有啥用?”

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在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在华北作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练习爬山,成为能手,要求动作迅速而敏捷。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都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爬山的动作慢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能够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作战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红军长征时,依靠两条腿,爬山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军,终于顺利地到达陕北。爬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今天仍要重视,不能把老传统丢掉了。至于某些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练习爬山掉了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跟上去,这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但不要说成个什么主义。

“劳动大学”这个名词,也是学生发牢骚讲怪话反映出来的。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第一课是打窑洞。因为学校扩大,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进延

安,没有房子住,打好窑洞才能安家。吃小米饭,煮山药蛋(即土豆),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包括油盐菜和烧的柴炭。吃粮需要学生自己去粮库领取,因为公家既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学生有的用自己的床单或毯子卷成一个筒,两端用绳子扎紧;有的用自己的裤子,把裤脚和裤腰扎好,两条裤腿成了米袋。烧柴需要自己去山上砍,晒些日子然后背回来。冬天取暖用的木炭,也是自己派人去烧。做饭的柴供不应求,有时用煤,学生到煤窑去背。这样许许多多的劳动,占去不少时间。有的学生讲怪话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好了。”

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基本原理开始,讲到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说:学校要办,又缺乏经费,生活必然要艰苦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立即开赴前线去作战,在敌人后方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红军中原来的战士都当了指挥员。后方各机关、学校的伙夫、马夫、勤务兵、司号员一到前方就提拔为干部。抗大的学生有数十个队,好几千人,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烧的,处处都需要有人服务,现在每个队都配备了必要的勤杂人员。但是由于编制限额,也不能再增加了。你们大家想一想,日常生活中还有大量事务性工作,应该叫谁来担负呢?可不可以从前方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学生担负这些繁重劳动?如果这样做那是增加抗战力量,还是减少抗战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的力量,咱们能干不能干?

毛泽东把情况一摆,问题放在桌面上,叫大家用主人翁的态度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商量应该怎样做?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学生们的思想很快就通了。原来讲怪话的人,自知输了理,在讨论会上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丢掉知识分子的旧习惯,增强劳动观念。

三条道路,我们走哪一条?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从柳树店出发,经过桥儿沟飞机场,沿延水河北行,进了会

场,已是人员满座,我们没有位置,主席台上有人指挥,告诉说就在讲台下面第一排凳子前席地而坐。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主持大会,简单讲了会议日程,作动员报告的是毛泽东。他从抗日战争的形势,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条件,讲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困难,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最后鼓励大家坚定信心,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接着又打了许多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在我军深入敌后方,各项工作都迫切需要干部,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延安办了许多学校,培训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再加上党中央各部门和边区政府机关人员的充实,边区部队的扩大,各种人民团体的组织机构建立与健全,脱产人员越来越多。革命队伍里的人,都需要吃饭穿衣,可是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只有120万,地瘠民贫,生产力很低,养活不了这样庞大的革命队伍。国民党和他们的“委员长”,掌握着国家的军权、政权、财权,高官厚禄,位据要津,“占着茅坑不拉屎”,不但不领导人民抗战,而且暗地里积极反共,对战功卓著的八路军不发粮、不发饷、不给枪械弹药,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不补助一文钱,反倒实行经济封锁,在边区周围搞磨擦,进行蚕食。国民党内有些人历来就是靠反共起家的,他们吃的是“磨擦饭”,发的是“国难财”,处心积虑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怎么办呢?”毛泽东诙谐而风趣地笑着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这句话的话音刚落,就引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那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高潮,革命队伍里人欢马跃,都想在战场上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见个高低。

毛泽东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

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毛泽东双臂交插,向胸前一抱,做个束手无策的形象,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毛泽东继续讲下去:“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要满面红光,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毛泽东又把劳动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和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客观条件,做了详细的说明,告诫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多打粮食,多种蔬菜,真正收到好的效果,增加物质财富。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现在各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不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干部,而是全国各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是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还有不少公子少爷,千金小姐,要让他们走出课堂,上山开荒,抡镢头、握锄把不是简单容易的问题,必须深入地做思想工作。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只有和工农兵结合,才能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

副校长罗瑞卿是个非常活跃的领导人,他显得特别忙,时而和其他首长打招呼,时而又凑到毛泽东身边耳语,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只听到毛泽东的干脆回答:“行,可以,同意。”从此,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般地开展起来了。

宪政促进会上讲申公豹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大会是在延安城北门外中央组织部的礼堂召开,有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出席。会长吴玉章致开幕词,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说。这篇演说后来整理成文章,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

政》,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事实上,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讲了一段精彩的插曲——关于申公豹的传说,文中没有收进去。

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呢?因为不经过人民的大力督促,国民政府就不会实行宪政。国民党里面有一种人十分顽固,别人浴血抗战,他们专门捣乱,发国难财,吃磨擦饭,以反共为职业,主张专制独裁,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们顽固不化,躺着不动,不但不肯进步,而且向后倒退。这种人好有一比,就像是《封神演义》里面的申公豹。据说申公豹这个人真是奇形怪状,他的后脑勺朝前,脸面朝后,专门向后看,走路时向后倒退。

毛泽东说到这里,故意模仿申公豹的动作,自己在台上背着手后退了几步,做了倒退的样子,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有的笑得前俯后仰。

毛泽东继续说下去,申公豹为什么脑袋长成这样子呢?据传他有割头还项的本领,向姜子牙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并且劝姜子牙保商灭周,投奔纣王。姜子牙不信那一套,申公豹法场做表演,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抛在空中,他那种法术只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过期就安不上了。恰巧一只仙鹤飞来,把申公豹的头抓住不放,急得他就地转圈,束手无策,苦苦哀求,等限定时间到了,仙鹤把头放下来,在慌忙急迫之下,脑袋被安反了,前后颠倒,才变成如此怪状。

今天的“申公豹”,死抱着“正统”观念,时时刻刻想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说是“异党”“异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是申公豹的化身,他们反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对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他们从来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从来不给一点权力。口头上喊几句口号,实际坚持过去一党专政的老办法。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动全国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要求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目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责任编辑 洛松)

反“五风”亲历记

● 张广友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并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协助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作为新华社抽调的下放干部之一,我经历了这个运动的全过程。

所谓纠正“五风”,指的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还有瞎指挥风。

在下去纠“五风”之前,我对“五风”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是“五风”的亲历者。“五风”盛行的时候,我大都是在农村。下面是我当时搜集整理的几个调查资料:

徐水实习

1958年夏季,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一批师生来到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省徐水县。这时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时期,“高产卫星”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高。毛泽东对这些“卫星”也信以为真。8月1日,湖北孝感突破水稻亩产一万斤大关,放出了亩产1.5万斤的卫星。8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徐水视察时,对全国竞相放出的“卫星”情况大加赞扬。他说:“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以后,各地推波助澜,“卫星”一个比一个高。8月13日,湖北麻城报出亩产36900多斤,号称“天下第一田”;没过10天,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又放出了亩产43075斤的“卫星”;9月18日,四川省郫县放出了亩产82525斤的特大“卫星”,同一天,广西环江竟放出了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

对于这些“卫星”,人们都不大相信。可是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怀疑反对。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在农村长大,又是学农业经济的,一亩地有多大,能产多少粮食,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反右派刚刚结束,惊魂未定,我哪敢公开表示疑义呀,只能不吭声,跟着装糊涂。

在徐水,我们最大体会是那种“冲天的干劲”,疲劳战术。白天在地里干活,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夜里开会,有时要走十几里、几十里,开会经常开通宵。那时最大的感觉是又累又困。有时在回来的路上走着就睡着了。……这种疲劳战术情况,实在难以忍受。好在我们在徐水时间不长,实习20多天就回校了。我担心的是那些农民,常此下去会怎样?

我的另一点重要体会是公共食堂。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康濯,在一篇通讯报道中写道:毛泽东对徐水县集体化程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表示了更多关注,参观食堂时,他看得很仔细,连贴在墙上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都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他赞赏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全县共11万多劳力,抽出4万多人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动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

据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从此公共食堂就成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不过那是夏天,刚开始,好歹还能吃饱。那时高产“卫星”那么多,以为粮食多得不得了,所以叫“放开肚皮吃饱饭”,吃饭不要钱。连毛主席都提出: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耕地要实行“三三制”。

宁津调查

此后不久,1958年9月,我们农经系四年级毕业班的十几名同学,在彭老师率领下,来到河北省宁津县(后来划为山东省)刘营伍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当时,全国已经实现公社化,各生产队、生产大队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我们依然是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金色的10月,正是北方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那年这里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非常好,到了秋收时,由于人民公社搞军事化,大兵团作战,搞形式主义,生产效率低,秋收进展迟缓。到了10月下旬,种麦季节即将错过,大部分秋庄稼还没有收。秋种种不下去,必然影响来年夏收。时间紧迫,上级决定要以秋种为主。为了赶时间完成秋种任务,公社指示能收则收,收不完就直接播麦。结果许多已经成熟了的白薯、花生、大豆等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就被犁掉了,拔掉的棉秆抛在田头,上面挂着许多棉花和棉桃,农民看着实在心疼!可是,有的干部却说:“埋在地里可以肥田。丢掉粗粮明年吃细粮。”尽管如此,种麦季节已过,种的多是晚茬麦子,且播种质量差,结果第二年的夏收受到很大影响。

原来以为有那么多的高产“卫星”,粮食多得不得了,没有想到入冬以后不久,许多公共食堂陆续缺粮,农民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得不限定粮食供应。特别是春节过后,许多地方发生春荒,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直到1959年4月传达了郑州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加上春天的来临,形势才稍有好转。有些公共食堂搞“大集体小自由”,有的把粮食分到户,有的变成了农忙食堂。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形势逆转,强调坚持公共食堂是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五风”随之也越刮越大。

沔阳材料

关于“五风”情况,除上述经历之外,我还在河北、山东农村作过一些调查,可惜这些第一手材料大都没有留底。现在手头找到的是1960年冬天,发给我们下放干部的一份材料。这是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于1960年9月18日为上报省委领导而写的有关“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这份材料主要是反映他和沔阳县委一道,在通海口人民公社搞试点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材料准确扎实,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将其中有关刮“五风”部分,摘录如下:

“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蒂固。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41个单位,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

“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年账,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材等84万斤,砖瓦147



三秋期间,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将公共食堂搬到了田头

万块,家具 24906 件。

“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比如,搞木轨化,就拆房子、伐木料;搞五有化,也是拆房子盖猪圈;盖了猪圈没有猪,又得拉社员的猪子;搞车子化,就砍光社员树;搞大协作,就乱调人,乱吃饭,乱拿工具。公社化以来,城关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 25 次,最严重的是 1959 年,这一年就刮了 15 次。

“‘共产风’给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据各生产队粗略地估算,仅‘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屋、死亡的耕牛、破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口平均,每人要损失 50 元左右,多的达 100 多元。这个损失,就相当于一两年的分配收入。

“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统一指挥生产。怎么指挥?群众称之为‘电子化’,就是靠电话。

“公社统一派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的。

“在一块地里,往往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秧了,有半截是光板。

这就是全社统一行动的结果。对此,群众称之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种‘一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是腊月 28 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笑话,也不是历史,而是去年有,今年也有事实。

“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例如,洲岭生产队,1959 年粮食总产 59 万斤,需要口粮 60 万斤,种子 5 万斤,本来应当供应 6 万斤,反而卖了 18.5 万斤,结果国家又供应了 23.9 万斤……卖过头粮的结果,不但在搬运、集并上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由于供应不及时,给生产队带来极大的困难,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刮别队的‘共产风’。

“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做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哪有心思搞生产?哪有心思爱护公物?哪有心思提高工效?哪有心思细收细打?全公社、各个管理区和绝大多数的生产队,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和 1957 年或 1958 年相比,总收入、粮食总产、社员收入,一般都减少 20%、30%;严重的达到 50% 以上,有些富队变成了穷队,特别是过去的工作重点队‘共产风’刮得更大,损失也更大。”

这份调查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和福建省闽侯县委《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两个文件作了重要批示,“要求省级、地级、县级和公社级党委,要



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图为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社员整队去田间劳动

求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下放在农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极严肃地、认真地研究这两个报告”。中央认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加上某些浮夸、强迫命令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使干部严重脱离了农民群众,使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这种严重情况必须大力改变,绝对不能允许再拖延下去。”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接到这个通知指示后,立即参照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的整顿办法,……作全面彻底的解决。”

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位于江汉平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份调查报告所反映刮“五风”情况,在全国许多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里毕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一些。在我看来,相比之下,贫困落后的重灾区问题要严重得多。以我作为新华社干部下放的山东省惠民地区为例,那里不仅五风严重,而且自然、经济和交通条件都很差,所以造成的危害也严重得多。“五风”刮走了农民的一切,以至一些地方土地盐碱化了,耕畜死光了,树木砍光了,锅砸了,房扒了,屋空了,甚至有的人也死了。“五风”刮得农村一贫如洗,前来慰问的江西慰问团团长曾无限感叹说:“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据我在惠民地区大于公社朱老虎、大孙家两个大队调查,有这么几个数字:耕地 80% 盐碱化了,其中有 40% 寸草不长;耕畜死了 80%,余下的 20% 中有一半不能使役了;人口死亡 15—20%,余下的水肿、干瘦病号占 80%。

反“五风”得到群众的拥护

针对“五风”问题,中共中央在《紧急指示信》中提出:“今年(指 1960 年)冬天,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整社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彻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摸透。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

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

整风整社是我们万名下放干部的重要任务。我们来山东之后,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参加省、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会,同大家一道揭批“五风”,层层听取他们的检讨,然后又深入到农村社队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吸取群众的意见与呼声。

总的情况,一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普遍承认自己刮了“五风”,犯了错误,并作了检讨;二是农民普遍是“五风”受害者,他们最痛恨“五风”。农民最怕的是“共产风”。它的突出特点:一是“归大堆”,对农民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实际上是一种“剥夺”。剥夺了农民的一切生产资料,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二是“吃大锅饭”,砸了农民的锅。公共食堂使农民从吃不饱饭到吃不上饭,以至危及到了生存权。

农民群众是刮“五风”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反“五风”非常积极;纠正“五风”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所以农民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

在各级干部为刮“五风”作过检讨之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得到了农民的谅解。但是,令人至今难忘的是,在各级干部认真地真诚地检讨自己责任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如,为什么全国都刮“五风”?风力怎么那么大?“五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否与人民公社的规模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问题有关?再者,“五风”所以遭不到强有力的抵制,假话盛行,“左”比右好,是否与 1957 年反右,1958 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有关?

设身处地看基层干部

对干部队伍中的这些思想,我是同情的,理解的。我们下放干部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大家研究认为:一方面,如实地向上反映情况;一方面,要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讲我们的一些看法:现在整风整社主要是整顿人民公社基层组织的思想作风,我们应当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对照检查自己,我们有没有错误?不能说一点儿都没有。有!而且有的还很严重,不要小看多吃多占,不

要小看强迫命令,不要小看浮夸……要看到它们的危害和不良影响。至于对上边意见那是上边的事儿,我们可以向上反映。但上边的错误代替不了你们的错误。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我们经常用这样一段话谈我们的一些看法:“民主革命经过几个反复,才找到它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也很难说一次就找到。道路不可能是平坦而笔直的、一点弯曲起伏都没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够,也不应当在错误面前,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怨天怨地,而应当勇于承担自己的过失,勇于脱下裤子,让群众打屁股,打了以后不哭,爬起来更好地为群众办好事,为群众服务,为党工作……”我们这些想法、看法、说法受到绝大多数干部欢迎。

我们的这些思想和这些做法,除了我们大多是搞新闻的,了解农村实际外,同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惠民队的领队兼地委常委、惠民县委第二书记任丰平有密切关系。

任丰平是位“三八式”的老干部、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资历深,经验丰富,信息灵通,了解上情,也比较了解实际,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的思想作风,对我们有很大影响。记得1960年冬天,在我们学了中央文件,听了中央领导的报告,特别是到了灾区之后,看到“五风”严重,给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给人民生产带来的严重灾难,对灾区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五风”严重的基层领导干部很气愤。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1月26日,他召集我们下放干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时,讲了一段很令人深思的话。查当年我的笔记本他是这样说的:“大家都是较高理论和文化水平的新闻工作者。这次下来之前学了中央文件,听了中央领导的报告,下来之后接触了实际,了解了很多情况,有了切身的实践体会。应该说你们现在最有发言权了。大家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研究和解决问题。脑袋是长在自己肩膀上的。要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很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看问题应当改变从上向下看,应当从下向上看。不仅要从中央来看下边,还要从生产队、从社

员去看上边。要体谅下边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角度来冷静客观地看问题,要设身处地想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人家的优点和缺点,看到问题所在。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想得很多,但是想的有时会不切合实际。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上边来的,从中央来的,没有亲身经历这段实践,不了解或不真正了解这里的实际。所以,我们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多听听各方面意见。特别是要听听基层干部的心里话,要设身处地为基层干部想想,想一想如果当时若是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怎样?”他说:“提意见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多提些参考性的意见,因为我们对具体的实际情况,常常是了解得不够,或不够真正了解。所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更不能强加于人……。”任丰平的这些话,寓意很深,我明白,我理解,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在当时这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事。这对我们正确分析农村形势,正确对待各级犯错误的干部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新闻工作者,下边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与我们不同。他们肩上有担子,而我们肩上没有担子;他们是“演戏的”,每个人都有具体角色,而我们是“看戏的”,没有具体角色;他们是回避不了矛盾和问题的,而我们对任何问题都不负直接责任,可以不介入,对看不清的可以不表态、不写稿,有的还可以写内参。想到这些,使我深深感到绝不能以钦差大臣自居,要扎扎实实地作好调查研究,设身处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解决问题。这可能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是否完全正确,有些还值得研究,但这毕竟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实际。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 吴 思)

哭笑不得的故事

● 刘 衡

1961年，我们18个下放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的右派分子，先后回到人民日报社了。除我之外，都摘掉了帽子。

我被分到资料组，能够接触新闻业务了。报社开大会，我常常能够参加旁听。特别是1966年春天，报社开了几次民主大会，全让我参加了。反右前，我长时间在内蒙古，和报社的同志接触较少，现在，听了有些人的发言，我好像认识了一批新朋友：

农村部的林晰，说起话来耐人寻味。一次会上，他发言说：“我这个人比较偏激。在革命运动中，偏激能给人启发。我听说毛主席批评咱们的报纸没啥看头，我好高兴！这样，可以震动一下啦！”以后我才知道，他在鸣放期间，有过一些和我类似的发言，如果不是林韦等同志的保护，想他也难逃厄运。

农村部副主任李克林，思想活跃、语言生动，我们在解放区当小干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县委宣传部长了。她的爱人林韦年龄比她小，听说主要是因为喜欢听她讲话，才和她结婚的。反右倾时，她是被批斗的重点，人们揭发她说了许多尖端的话。例如，党提出以粮为纲，带动一切，她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能出铁，她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人们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说到“浮夸”，她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面压的。”说到“风源”，她说：“风从上边来，不能光怪下边。”因为李克林说的有根有据，弄得批的人无可奈何。在这次民主会上，她的讲话果然十分

风趣、幽默。她说：“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要有自己的思考、体会，不能老是吃梨子，你也吃梨子，我也吃梨子，老是吃梨子，老是那个味。”

在民主会上，行政部门的同志对“编辑老爷”提了不少意见。例如：有的部主任为个人问题大发脾气，老虎屁股摸不得。分房子四不住：离报社远了，楼层高了，两家合着，不向阳，都不住。有些同志没有劳动观点，光动嘴，不动手。比如：有个部门，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柜，一把椅子，由2楼搬到3楼，打电话让房产科去搬。去了两个女同志，一看，房子里有四五个男同志围着桌子等着。两位女同志把东西搬上去后，男同志才空着手跟着上去。经过多年的劳动改造，这些意见不再使我无动于衷，我的心和行政部门同志的心一块跳动。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对记者工作的意见。一位编委一股劲称赞某记者，说他是记者的方向，如果报社有10个他这样的记者，报纸就会办好。顾雷却说，有的人说这位记者写文章是贴高级标签，甚至提出质疑：这个记者的做法算不算调查研究？符不符合蹲点精神？他要把记者带到什么路上去？郭小川还谈到他和这位记者一块到东北采访的观感，说还没到目的地，这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了个差不多，他的文章没有多少事实，但有许多远见卓识；好多地方不合逻辑，但很有气势，鼓动人心……

由于民主会开得十分活跃，会议期间，一些同志还向党委提出对我的疑问：为什么不认罪？不摘帽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等等，我是没有发言权的。4月20日，资料组万青同志根据党委

书记指示上台介绍我的情况，说我一直不服罪，写了许多不服罪的“思想汇报”。他说：“她还写了反右派体会（上来便引起人们的笑声），写了一篇、两篇，还写了第三篇。这次开民主会，她也发动起来了，写了一个意见，题目是《说出来的蠢笨》（听众哗然），现在我给大家念一念：

高尔基说（哄堂大笑，笑我是个言必称希腊的“书呆子”）：“说出来的蠢笨像皮肤病似的，容易医治些。而蠢笨藏在思想里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内部器官的病症，较难医治。”许多年来，我一直遵守这个教导。在学习民主集中制以前，我已写过一些意见。现在，再写一些。如果我说对了，请予接受。如果是皮肤病，请给我治疗（大家又笑了）。

我的意见有五点：一，报社在消灭三大差别问题上，特别在消灭体力、脑力劳动的差别上，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二，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方面，领导同志要起带头作用；三，某某式的记者只能是记者中的一种，不能成为记者的方向；四，目前大家指出，报上有些新闻、通讯太长，不爱看，主要是指有些长东西架子

大，内容少；五，报社应大力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大军，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大家政治、业务水平。

近千字的意见书，万青原文读过后，又在会上念了我的两个汇报。

其一是《给党委》：“我写了许许多多，不知你们感觉如何？（‘好！’有人叫了一声，但立刻被嘘声制止，从此大家一声不吭地静静听着）希望能被理解，不仅是我害怕孤独。我写的每字每句，真实而且可信。请你们细细审查，多多提出疑问。不光提出疑问，还请具体提出批评。我当虚心检查，做到彻底否定。”其二《给图书馆》：“你们说我很不老实，不知指的哪里，请你们具体谈谈，我好检查自己。”请你们加强斗争火力，帮我枪毙旧的自己。要想重新做人，就要剥皮挖心、翻根究底。如果指的右派帽子，那就白费力气。我已稳如泰山、坚如磐石，谁也不能让我回心转意。我已写了反右派体会，上面讲的十分详细。我不承认右派帽子，正因为我对党老实，坚持真理。‘不老实’在哪里？请你们说个明白，斗个痛快，不要把我蒙在鼓里。”

万青念完，笑着下台了，好些人也笑了。

一散会，资料组孟祥桢脸上笑成一朵花，向我走来……8年前，他才20岁出头，在行政部门当公务员（不是当今意义的“公务员”）。领导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常常当他的面商量划右派的事。财务室统计员朱克潜被划右派，在他看来就太轻率了，不让人信服。我到资料组后，和他在一起工作，他从来不向我流露什么，但在各方面对我十分关照。这天，他挤过拥挤的人群，笑得不行，找我说：“你把我们的民主会变成了朗诵会……”他的话充满了友善、温馨，包含了对人的理解、尊重。

1973年，我们干校从河南叶县搬到昌平小汤山。离北京近了，干校的学员一年一年轮换，而我和朱克潜两个“专政对象”却一直不动：种田、养猪、喂鸡、缝麻袋……

来干校轮换的学员分析我的出身、历史，觉得我成长在革命队伍里，如今老呆在干校不是办法。应该先给我摘帽子，而后争取分配工作。



一九四五年作者在延安《解放日报》时留影

图书室主任姚伟一股劲劝我，让我承认错误，表示永不翻案。

尽管大家左劝右劝，好说歹说，我始终不为所动。我不承认这顶帽子，怎么能摘这顶帽子呢？

为这事大家真是动了心思。报社保健医生吕秀芳是摘帽右派尹瘦石的夫人，曾经三次到干校劳动，送过几位学员看精神病，与看精神病的安定医院大夫很熟，她向领导建议：“应该想法给刘衡弄个有精神病的证明，说她有精神病，不肯承认既成事实，或许可以把帽子摘掉。”

有一天，班长穆扬找到我：“你老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是不是有精神病？应该到安定医院检查一下。”我从小就对精神不正常的人感兴趣，喜欢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说：“我很愿意去，我要看看人们怎样检查精神病，不知检查起来痛苦不痛苦？”他说：“不痛苦，光是和你对话，从对话中发现你思维的破绽、问题。”我说：“好，我们快去——你看，我是从心里就愿意去，这说明我并不真的有精神病，小说里就写过，真有精神病的人死活不肯去检查的。”

于是，一天吃罢早饭，穆扬、吕秀芳领着我坐上干校的吉普车开到安定医院。那时的安定医院还是一片平房，雕花的栏杆，曲里拐弯的通道，进去就不容易出来。我们到了一间屋子，穆扬、吕秀芳和司机走进里间，和医生说话，把我一个人留在外间。一会儿，吕秀芳出来，把我叫了进去。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坐在桌子的两旁，满脸皱纹，十分和气地笑着，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老医生。他们叫我坐下，我很有礼貌地点点头，笑着坐下了。女医生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我是来看病的，当然要说我不舒服的地方，就回答：“我经常失眠，心闷。”两位医生对看一眼，又问：“听说你常常一个人发笑……”

我笑出了声：“是的是的，我明明热爱生活，他们却劝我不要自杀。我明明是最忠诚的同志，他们却说我是最顽固的敌人，你说，这不

可笑吗？我是笑他们，笑我的同事，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你们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也会发笑的。”

“你怎么经常一个人哼哼唱唱？”

我又笑了：“他们对我孤立，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只好一个人唱歌，我唱的都写给了组织，像《我不能对党说谎》、《群众和我并不对立》、《我是一块瀑布》……”

两位医生又对看一眼，女医生提高嗓门，十分气愤地问：“按说你的处境十分悲惨，你应该十分悲痛，你怎么还这样高兴？”

我说：“因为我知道反右派没有结束，反右派结束的那一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现在，你看，有一个回来的没有？没有！可见，反右派没有结束。”

医生叫我一个人出去，和穆扬等谈诊断结果。好一会儿，三人出来了，吕秀芳扬起手上的诊断书，高兴地叫：“好了，好了，可以摘帽子了！”原来诊断书上写的是：“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但不知是什么问题，建议到所辖地区的精神病院继续检查。”安定医院是精神病院中级别最高的，却要我到他们的下级医院检查，这明明是推托。我说：“走，到另外一个医院去！”穆扬说：“我们不跟你去了，要去，你一个人去。”我说：“看精神病不比看别的病，看精神病要有人陪着。”吕秀芳笑了：“光听你这句话，就知道你没有精神病。”

他们让我看病的目的就是要我得到一张有精神病的诊断书，现在诊断书上有“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用不着再去看病了。

看病的秘密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于是，在干校内外，传着我有精神病的流言。有亲友到报社找我，回答说我有精神病，不让他们到干校去看我。

吕秀芳的爱人尹瘦石是著名书画家，他1946年就到内蒙古工作了。我们1954年在内蒙古建立记者站时，他是内蒙古文联的副主席，1956年又当了美协内蒙古分会主席。我和林沫常常到他那里看望。50年代，我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他们文联也只有几间平房。尹瘦石只有



刘衡近影

一间办公室兼书房兼会客室、一间卧室。他把办公室布置得十分高雅，三个书柜装满了书，还摆上不少叫不出名字的文物古董、美术工艺品。墙上挂着毛主席书写的《沁园春·雪》、他自己画的奔马……连他招待我们喝茶的茶壶、茶杯都是精美的工艺品。我们一坐到他房里，感到是一种休息、享受。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时，主要是画人物。我们问他：“听说您是全国第一个画毛主席像的？”他赶忙更正：“不能这样说，只能说我给毛主席画的像是第一个发表的。”他来到内蒙古后，画马成了他的特长。他笔下奔腾的马群，都画活了，就像风暴中的海浪滚滚，是继徐悲鸿画马之后取得较高成就的画家。田汉曾称赞他们：“宜兴（两人都是宜兴人）并代两神工，石瘦鸿悲意境同。”有一次，我站在他房里看他墙上的马，心里一股劲叫好，但形容不出好在哪里，竟说出一句十分傻气的话：“听说您现在画的马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马。”我一说完，十分懊悔。但他“大人不见小人怪”，笑了起来，说：“我现在坐机关是多了些……”

1957年，尹瘦石到北京中国国画院当副秘书长。1958年，内蒙古文联又把他调回去批斗，因他在鸣放期间曾经给内蒙古宣传部某领导人提了些意见，就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接着到北大荒劳改。1961年初，他原先的夫人和他离婚了，丢下三个小孩由尹瘦石的老母抚养。年底，尹瘦石被摘掉帽子，1962年底回到北京画院。我们

报社的沈同衡是著名的漫画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到新疆劳改去了，他的夫人袁林还在报社。沈同衡夫妇早就认识尹瘦石，1963年，袁林看见我们报社的医生吕秀芳温柔、美丽，就介绍她和尹瘦石认识。有好心人相劝：“尹瘦石虽然摘了帽子，但他还是一个摘帽右派，你可不要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吕秀芳有她自己的眼睛，她在和尹瘦石接触中，发现他善良、厚道、画好、字好、有才华、有学问，1964年和他结了婚。吕秀芳知道一些右派分子的来龙去脉，因此对我比较

同情、友好、关照。有一天，我去找吕秀芳看病，她见周围没有别人，悄悄问我：“那天你说，反右派结束的那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真的会有那一天吗？我看不会吧……”我知道她关心尹瘦石，赶忙回答她：“会的，会的，会有那一天的，你等着吧。”1978年底，我“改正”了，1979年3月，尹瘦石也“改正”了。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吕秀芳，对她说：“那一天等来了吧？”她高兴得直跳，拉着我的手直摇，久久不放。

最近，吕秀芳告诉我，那次到安定医院，检查我的男医生是张院长，女医生是一位主任大夫。吕秀芳事先和张院长打过招呼，张院长觉得这牵扯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十分重视，所以亲自出马，还找了那位有经验的主任大夫一块来和我对话。对完话后，他们避着我谈诊断结果。张院长说我对答如流，说得有情有理，看不出有什么病。吕秀芳恳求他：“既然来看了一场病，还是写一点什么，回去好交代。”张院长似有所悟，才写下那个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诊断书。当然，这些做法，只是同志们的一番好意、一个愿望。因为诊断书交上去后，并无下文，我的帽子也没摘成。不过，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可以笑谈的故事。

（作者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现已离休）

（责任编辑 洛松）

“运动”中的人世情

● 刘镰力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到戏剧口革筹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李英儒同志的指示,到机关团体去听取运动发展情况。李英儒要求我们听后回来汇报,不准乱指示乱发言。

1969年我和剧协群众一起下了五七干校,当时带我们下干校的是军宣队,我所在的剧协是五连,连里的军宣队一个是老王,原是部队的一名司务长,性情温厚,三十出头的年纪;另一个姓陈,二十七、八岁,很开朗,我们叫他老陈。那时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干活时也在一起,大家都很开心。大概是1969年底,干校里开始抓“五一六”分子。当时单位里各派头头都是被怀疑对象,我和剧协曾被抽调到戏剧口革筹的另两个人,更是首当其冲。但因是运动刚开始,主要是让大家写揭发材料,还没把我们这些人当审查对象看待,军宣队对我也还比较好,所以我感觉当时人际关系并没显得过分紧张。过了不久,剧协那两个被抽调到戏剧口的人,突然不见了,继而军宣队老王也不见了,紧接着又走了数名“革命群众”。他们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早已危机四伏,因此总是打听:老王他们到哪里去了?有

一天,《戏剧报》的老编辑刘乃崇告诉我,他们是在“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我十分奇怪,去“中戏”干什么?我又去问军宣队老陈,老陈也告诉我,他们是在“中戏”。

大约是1970年初,我轮休时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在大雪中骑着车到了“中戏”。站在大门口碰到了一个我们连队的“革命群众”。我问她老王在不在,能不能见?她很怪异地看了看我,说让我等一等。过了一会儿,老王出来了,变得不像过去热情,问我有什么事。我突然感觉自己恐怕不该来,就说没事,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干校。老王是怎样回答的,我已不记得,但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怅怅的不安。

第二天大雪还在继续下着,我和剧协的几个同事一同回干校。一进干校的大院,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大家见了我,都是一脸唯恐避之不及的脸色,没一人上来说话。不一会儿,就见大家都进了我们连队女同志的大宿舍,有人让我站在院子里等着,不许离开。过了大约十分钟让我进去了,只见上下铺坐满了人,个个脸色严肃,剑拔弩张,问我在北京干了什么。我模糊地意识到可能是去“中戏”出了事,但也没意识到有多严重,就把前后事情如实说了。有人立刻站起来斥责我说:“老实交待吧!不要再表演了!”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并没有表演,就笑着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里,人人都在表演。”没想到我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的心。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大家心里想的是,我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说这种话!会场里一下子静默下来,几乎能听见人的心跳。突然有人大喊:“打倒五一

六！”接着有人把我押到干校的最高领导王副团长处。王副团长过去一直待我很好，他很朴实厚道，不善言辞。这晚是他单独和我谈话，他开始很和气地跟我说：“是‘五一六’没有关系，你还年轻，只要承认了，就是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了，就马上解放你。”还说：“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比较信任，这次我很希望能拿你做榜样，首先解放你，给其他‘五一六’分子看看，让他们知道，只要老实承认，就有出路。”他说得十分诚恳。但我真的不是，怎么能说是呢？所以又笑着说：“王副团长，我真的不是‘五一六’。”他听了一下子怒从心起，拍着桌子大骂说：“你个王八蛋！非要挨斗才肯承认是不是？”这时军宣队老陈被叫了进来，王副团长叫他带我回连队，立即组织群众对我再次进行“帮助”。那时已夜里十点多，夜很黑，老陈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我住的老乡家里走。到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农场，组织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称为“五七干校”

了院子里，他站住，乘没人，十分同情地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王副团长是真心想保护你。”可我还是那句话：“老陈，我真的不是‘五一六’分子。”他叹了口气，把我带进屋里。屋里已是严阵以待，坐着四五个人，都是我连队的“革命群众”。他们先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继而是义正辞严地训斥，最后是劳而无功的疲累。时间已过半夜，只好作罢。这就是我当“五一六”审查对象的第一天。

在此后的几天里，批斗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是谁告诉我“五一六”审查对象集中在“中戏”的？我说告诉我的人绝对没有问题，他们自然不信。后来我想，刘乃崇这位老编辑决不能说，说是他，他必会立即被隔离审查；说了是老陈，自然很对不起他，但他是军宣队，是他们的自己人，可能问题不大。所以在第四天的批斗会上，我说是我问老陈，老陈才告诉我的。当时会场就哑了，马上宣布散会。此后批斗我时，再别提这个问题，我估计是老陈承担了，所以心里始终对他怀着一份感激。

当时正是隆冬天气，不宜“促生产”，只宜“抓革命”。“革命群众”白天可以轮流睡觉，但我要一天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连续接受批斗。

有一次，已经是夜里11点多，挨完了一天三个单元的批斗后，没想到又把我拉到食堂，换了一拨人，继续批斗。记得那天批斗我时，让我交待我和“五一六头子”李英儒的关系。我说：“我觉得李英儒不是‘五一六’。在戏剧口革筹李英儒是我的领导，他要是‘五一六’，肯定会发展我。可他没有发展我，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我说的话，在那种异常情况下大家怎么肯信？于是斗我斗得更厉害了。

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个女同事，M是负责看着我的，我的任何行动，都由她监视。另一个是赵，当时是排长，她聪慧而又有正义感，但是眼里揉不得砂子，看到任何卑劣的事都嫉恶如仇，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意。当时我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而突受审查，自然精神上沉重得不得了。有一次，她趁M去上厕所时，对我说：“你哭什么？你现在比我们强多了，我们现在整天坐在一

块儿‘喊话’。这个说：别装了，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那个说：‘革命群众’眼睛雪亮，谁是‘五一六’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么互相喊，喊得你心惊肉跳，早晚有一天我被他们喊疯了！你倒好，反正是揪出来的死老虎一条，豁出去也就算了。我们呢？整天如坐针毡！”又说：“现在好人都成‘五一六’了，上哪儿说理去！那天斗你，有人坐在上铺，看你被斗，偷着流泪，没想到被人看见，连她都斗了！”我这才知道还有人为我挨斗。

一天傍晚，我连的军宣队老王和美协的军宣队老李，一同来到我住的地方，脸上冷若冰霜地说：“你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盖棺论定的‘五一六’，不要再装了，我们有证据，你再装得天衣无缝，也要把你揪出来！现在是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

那天老王和老李刚走，就有人来把我带到了五连大会场。屋中坐满了人，我站在中间，让我交待。刚才军宣队对我是怎么说的？我立即如实复述一遍。我知道，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出人，立刻就会被冠以隐瞒军宣队指示的罪名。大家群情激昂，有人突然高呼：“把大衣脱了！”我立即脱了。大家让我交待我不肯承认是“五一六”的症结在哪里，并说如果不肯当着大家的面说，现在可以马上到军宣队老王那里去，如实地向他交待。于是又有人押着我去见老王。刚要出门，忽听有人大喊：“穿上大衣，谁许你出去不穿大衣的？”我赶快又穿上了棉大衣。出来以后，天早已黑下来，外面冷得滴水成冰，我当时身上只穿了两件单衣，幸亏有人让我穿了棉大衣，我真感激那个喊话的人。那是老孟，是位从部队来的老革命，“文革”前刚从部队调到剧协当秘书长，此人正派、耿直，过去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军宣队说的话当成圣旨，他们有什么水平？不过是部队上的一个小司务长儿！”别人是谁也不敢说这种犯忌的话的，可是他敢。那天晚上实际上他是以批斗的口气在保护我，怕我冻坏。这是我以后才明白的。

到了军宣队那里，靠墙一张桌子，老王和老李在桌子两边正襟危坐，见我押进去，老王说：“你就交待吧。”于是我又说了那句话：“老

王，我真的不是‘五一六’。”老王一听，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我厉声说：“你知道不知道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如果你就是这句企图蒙混过关的话，现在你就给我再回到革命群众那里去接受批斗，什么时候肯老实交待了，再到我这里来！”于是我又被押回干校大院。押我的共两个人，一个人先进入会场，命令我站在外面等着，留下司机小刘看着我。当时外面的天气干冷干冷，好像连天上的月亮都冻得惨白惨白的。那进去的人半天还不出来，我心里想，是不是他们在商量押我去北京批斗的事情呢？这时司机小刘突然打开一辆汽车的车门，对我说：“你进去吧。”我心里紧张地一动：难道真的要拉我去北京批斗？小刘看我站着不动，就又低声说：“外面太冷，车里暖和点儿。呆会儿我叫你。”当时我的脑子几乎木了，只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好意，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老王的房间和群众的批斗会场之间被押解着来回走了三次，但我始终是那句话：“我不是‘五一六’。”

有一个晚上，几个连的人都排队坐在院子里，开批斗“五一六”的动员大会。我坐在地上，冻得一个劲儿发抖。突然有人从后面给我披上了一件棉衣，我不敢回头看，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这个人再因我而挨斗。过了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下来，背着手又把棉衣塞给了后面的人。但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说有人同情“五一六”分子，给“五一六”分子披棉衣。后来赵告诉我，给我披棉衣的是美协的唐棣，那是位极有正义感、心地又善良的老人。

到了春耕大忙季节，大家都去干活，开我的批斗会少了，只在下雨天不能干活时批斗，平时就让我在家写交待。赵偷偷告诉我，军宣队都到北京开会去了，揪“五一六”好像要有什么变化。

一天上午，我正在写交待材料，突然军宣队老王和老李来了，那是在他们离开干校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以后。这次的态度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严肃但没有了杀气。说中央发布了“3.27”文件，他们来向我宣读，内容大概是揪“五一六”分子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之类

的意思。读完又对我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是‘五一六’就是；不是‘五一六’就不是。”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句话没说，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以前他们说我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时，我只想笑，可是这时我一直哭着，哭到他们走，我也没说一句话。后来赵告诉我，全国揪“五一六”，整死不少人，这次发了文件，不许再搞逼供信。赵又对我说：“你的日子会好过点儿了。”

果然，第二天就宣布我可以随“革命群众”一起出去劳动了。我心里无比高兴。连队里经常有一些零散的重活，一般都派男壮劳力去干。因为我能干活，也能常常被挑中。干这种外差，人不多，大家就比较随便，特别是老季带我一起出去干活的时候。老季是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从来不搞极左，他挑我一起出去干活，就从不把我当成审查对象，我就可以比较随便地和大家说话。在这一点上，我这个审查对象，好像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5月份，突然传出了原军宣队要撤离的消息，有新军宣队要来接替他们。那些天，他们都有些灰灰的。在他们临走的前一天，他们集中各类审查对象一起开会，训话的内容是要老老实实，如果谁趁军宣队撤离之际捞稻草，绝没有好下场之类。第二天，全干校开盛大的送别会，大家按连排成横队，夹道欢送。不少人抢着和他们握手告别，有人还流下热泪，哭着相送。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审查对象，应有自知之明，不要抢着上前。正在想着，就看见军宣队老王一边和前排的人握手，一边走了过来。见到我站在后边，他犹豫了一下，突然排开众人，挤了过来，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一句话没说，就又退回去，继续往前走了。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的问题还没弄清楚，作为审查对象就还是人民的“敌人”，他怎么敢和我握手呢？一回头，美协的几个人正站在那里，这一幕他们瞧得清清楚楚。但是我想，这件事我一定不和任何人说，因为会对老王不利。我觉得很可能老王已经觉出他们整我们不对了。

当时连队一些骨干和军宣队一起回了北

京，共同总结前一段揪“五一六”中的问题。赵也去了。过了几天她回来后，趁没人时责备我说：“你吃饱了撑的去和老王握手！”我吃了一惊，心想老王主动和我握手的事，我没对任何人讲，她怎么会知道？原来他们在京一起总结前一段运动情况时，是老王自己突然说：“临来时，大家和我们握手告别，没想到‘五一六’审查对象刘镰力也混在里边，过来和我握手。”我听了以后，心里一下子像是吃了一颗苍蝇。我跟赵说了实情，赵说：“他一定是发现美协有人看见了，怕人家告他丧失立场。美协那几个人，恨他们恨得牙痒痒。那几个都是正派人。”

过了不久，新军宣队来了，最高领导是杨副政委，他是师政委，剧协的老司机李光华开车去接的他。李光华回来后，趁在食堂吃午饭，故意坐到我旁边，十分兴奋地偷偷跟我说：“我都说了！他们怎么整你，我全跟杨副政委说了！”当时派到我们连的军宣队是张部长和他的通讯员小王。张部长为人温厚稳重，政策性很强。没过几天，杨副政委和张部长一起找我谈了话，听我叙述了被审查的全部经过。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听得很认真，然后杨副政委问我：“你说你不是‘五一六’，你估计会不会有人说你是‘五一六’呢？”我想了想说：“我觉得不会。我不是‘五一六’，怎么会有人说我是‘五一六’呢？”当时我不明白杨副政委为什么那样问我，但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却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不是‘五一六’的话，那你经过这次审查，今后就有免疫力了，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是在被审查后最为高兴的一天，因为我觉得我终于看到了希望。

有一次我去井台挑水，两大桶水压得我溜歪斜。这时恰巧张部长的通讯员小王看见了，他立刻走过来，一言不发，一口气替我把水挑到了家。没想到小王替我挑水的事一路上被许多人看见，无形中成了一种信号，不少过去的好同事，都惊喜地偷着对我说：“不简单哪，军宣队替你挑水啦！”结果就好像暗中开了禁，从此大家敢和我说话了。

过了不久，赵排长向我宣布，说连队里研究

过了，以后没有人再监视我，我可以自由行动了。有一次恰好连里改善生活，包饺子。我因为从小不吃肉，而赵也不爱吃肉，所以连里特准我俩自己包素饺子吃。我们去食堂领了韭菜，赵突然说：“咱们还应该领几个鸡蛋，他们吃肉，咱们吃几个鸡蛋总不为过。”于是她又跑回食堂，我就站在墙根儿下等她。那正是连部门口，我正在那里捧着韭菜低头等着，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见是连指导员、著名漫画家江有生正站在连部门口的台阶上。他说话时眼睛没看我，看着天。我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就左右看看，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他和我。说完这句话，他仍然不看我，就又走回了连部。我当时感动极了，我知道他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到了夏天，干校革命群众按部队的规矩，各班选五好标兵，每人都要写一份学毛著的思想总结。审查对象不参加选标兵活动，但同样要认真检查思想，写总结。我经过将近一年的审查岁月，突然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我要写出我对审查的真实看法。

晚上当我提起笔来开始写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太轻率了？自己现在还是审查对象，“五一六”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怎么有权利去写什么审查是错误的？自己再是好心，现在也不是说的时候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挨批斗凑材料吗？

果不其然，过了不久，美协的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带着申诉材料从干校逃跑，到北京去上告，结果被抓了回来；曲协的“五一六”审查对象互相“串连”；舞协还死了人，这自然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干校一下子变得气氛肃杀，全干校开大会，揪斗“五一六”进入新高潮。我实在庆幸自己没有写那个材料。当时许多同情“五一六”分子的人也挨了揪斗。那些天，军宣队一再找我谈话，问连指导员江有生和我有什么接触。我说他是美协的人，我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军宣队说：“他自己都交待了，你还不肯交待！回去写个材料来！”后来我想，他说的那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是毛主席语录上的话，即便说了也没有错，于是就

这一情况写了交上去了，并特别写明他是冲天说的，不是对我说的，只不过我听了以后觉得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自己是个鼓励。但写了以后，我心里总是很不安，总觉得有些对不住江有生。

那时候干校已由宝坻县的北清沟搬到了静海县的团泊洼，并已全部住进自己盖的宿舍里。当时已到冬天，没有什么活儿，主要搞运动。一天下午，我和赵正坐在宿舍里，忽听食堂里一阵一阵的口号声，不时又有“义正辞严”的训斥声、批斗声，但听不清说什么。赵告诉我，美协正在批斗江有生。我听了以后，难过极了，我不知道我写上去的材料是否成了批斗他的炮弹，我极力给自己宽解，我那材料里写了他是冲天说的，没对我说，但是他说的话，毕竟只有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听得见。用毛主席的话去鼓励一个“五一六”分子，能没“罪”吗？我听着那边一阵一阵的批斗声，就像一鞭一鞭抽在我的心上。我在灵魂深处实际已经承认我是顶不住军宣队的压力，才写了那材料的。其实他说那话时，真的只有天听得见，我听得见，绝没有第三个人听见，我完全可以顶住不说。尽管后来我知道揪斗他主要是因为他和美协的其他“五一六”审查对象的接触，但我始终不能原谅我自己。钱钟书先生在给杨绛《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道：《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那就是“记愧”，惭愧自己在运动中的怯懦。我觉得钱先生说得很对。

这个严酷的冬天过去以后，又到了春天的大忙季节，揪斗“五一六”渐趋平淡。到林彪一伙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运动的重点就改为批林批陈。当时干校的军宣队不断撤退，干校的学员不断被各单位要去而回京。到了1973年，我也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要去。临行，连长把我叫去，给我的结论就是像“莫须有”一样著名的那句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材料销毁，结束审查”。就这样，我一下子又从“阶级敌人”变成了“革命群众”。

在严酷的运动中千方百计以真情待我的那些善良的群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并将永远视为我心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责任编辑 吴 思）

追寻父亲的清白

● 何 奇

1998年6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文:“郭洁民(系原北方局军委军运领导小组秘书长),1939年被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公安局以叛徒罪处决,经我局复查,属于错杀,应予平反昭雪,按因公牺牲对待。”

这是我父亲郭洁民冤死60年,我申诉18年后终于盼来的结论。这是父亲生前战友积极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打听父亲下落成了亲人心病

父亲是我一生中见面最少,对我影响最大的亲人。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地从事革命工作,很少回家,我自幼跟生母及祖父母在山西老家生活。记忆中,我一生只见过父亲两次。

第一次是1928年冬,我不到三岁,一早醒来,睡眼朦胧中发现躺在一位陌生男人的被窝里,我放声大哭起来。那男人笑着说:“华狗(我原名郭重华,亲人叫华子或华狗),不要哭,我是你爸爸。”哭声惊动了正在厨房做饭的妈妈雷般数,她边跑边喊:“住、住(停住哭之意)”,跑进屋来说:“华狗不要怕,这是你爸爸。”她笑着对那男人说:“你看,孩子都不认识你这个爸爸了!”这甜蜜而又苦涩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就是这次见到父亲以后不到一年,生母病逝,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第二次见到父亲是1933年,我已七周岁,上小学了。那是个三夏大忙季节,父亲偕继母冯若舟(以下称母亲)与刚出生的妹妹从太原回来。这次我对父亲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英俊潇洒,温文儒雅,和蔼可亲,说话总是笑眯

眯的。我表现得有些拘谨,不同他多说话,但是老悄悄地看他,心里甜滋滋的:我爸爸回来了!记得一天母亲同祖父母说到他们在太原的处境,大意是说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在教员预备室说过“看来郭老师是‘红脸’”的话,校长是开玩笑说的,实际上已对爸爸产生怀疑,所以他们想尽快离开太原(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师范国文教师)。我听了这不明不白的話,总是端详父亲的脸,还奇怪地问:“爸爸的脸不红,怎么说是红脸呢?”爸爸拍拍我的头说:“你还小,长大就知道了。”三夏大忙过后不几天,我父亲与母亲留下出生不久的妹妹,便又到外地从事革命工作了。从此,我再未见到父亲。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父经常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人贪得无厌,占了东三省还要侵占全中国,也不知道你爸爸怎样了?”1938年,听说父亲回到了晋察冀边区,在一个抗战干部学校做领导工作,祖父母非常高兴。可是,1939年以后,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从此,打听父亲的下落成了老人们的心病。就在这个时候,祖父母向我讲了父亲的一些情况。

祖母是位善良的农家妇女,一天她对我说:“你爸爸从小喜欢读书,是个不多说不多道的规矩人。他说现在这个社会不公平,穷苦人一年360天劳动,没饭吃没衣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就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词。

祖母思儿心切,常常坐在炕上从窗户里呆呆望着街门,有时坐在村口望着父亲回来的方向。直到1947年初祖母病危,临终前还牵肠挂肚地想着父亲:“魁元,你在哪里?”她带着痛苦

的思念离开了人世。

祖父郭懋德，字宣三，是位由农民走向旧官吏的人。他30岁以前在家务农。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为培植自己势力，办了个警官学校。祖父考入这所学校，毕业后先当巡官，后来当过繁峙、静乐、长治县和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1929年离职回老家。祖父也经常对我说到父亲，他说：“你爸爸是做事的，不像我是混事的。”还说：“我培养他念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家里花了很多钱，本来希望他走升官发财之路，光宗耀祖，可他不听我的话，一心信仰共产主义。”

1941年2月的一天晚上，祖父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发生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了，国民党军队在茂林消灭了新四军一万多人，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在那里，他也可能牺牲了。”

祖父还说：“1924年任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时，与在军界做事的徐受谦（徐向前的哥哥）交往较多，徐向前来太原找工作，我对他说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要不你考黄埔军校吧！徐向前同意，我做保介绍他报考了黄埔军校，（《徐向前传》也提及此事）。现在人家徐向前是八路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了，你爸爸却打听不到下落。唉！”

那时已经15岁的我，对于父亲不只牵挂还很敬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走父亲走的路。这天晚上，心里焦躁得无法做作业，我撕下一张纸，神使鬼差地给父亲写起信来，叙述祖父母对他的思念和我决心也要干革命的打算。信写好了，但是父亲在哪里呢？信往哪儿寄呢？沉思良久，只好拿上火柴到院里，把信点燃，任纸灰飘落，寄托我的心愿。许久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给父亲的唯一的一封信。

苦境中寻觅丈夫的坚强母亲

1942年夏，我的母亲冯碧川带着二妹丽波回到太原。那时我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托曾在小学教过我日语的张信毓老师给母亲找了个小学教员的职业。从此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她虽不是我的生母，但待我很好，我这个自幼

失去生母，父亲又不在身边的苦孩子，终于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母亲原名冯林书，字若舟，又名冯碧川，是一位坚强的女性。1910年生于河南清丰县城内的一个贫苦家庭，其父冯云升是抗日初期的共产党员。冯家姐妹三人，她排行老三，家里省吃俭用供她一人上学。1929年考入在大名的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加入共青团。1932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同年秋来北平，与我父亲结婚，加入共产党，改名冯若舟。从此，她随丈夫在山西太原、河南许昌、北平、天津等地，积极从事党的工作。

1938年初，父亲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母亲随行。但当他们即将动身时，我的最小的妹妹突患急病。父亲只好先走，母亲暂留天津给女儿看病，说好等边区派人来接。不料父亲走后不几天，孩子夭折，冯若舟忍着悲痛，带着二女儿焦急地盼望党组织派人来。却左等右等几个月，不见人来，她从此与父亲失去联系，也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为维持生活，只好改名冯碧川在天津当小学教员，一面糊口维生，一面寻丈夫、找组织。

在太原，母亲三十几岁，带着八、九岁的二女儿，靠一个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糊口，有时还



冯碧川（摄于一九四四年）

要周济我上学,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对母亲来说最痛苦、最揪心的是多年打听不到丈夫的下落,找不到丈夫也就找不到党组织,为此被折磨得体弱多病,心力交瘁。

我清楚记得1944年春天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去新城街小学看望母亲和妹妹。这次母亲同我谈了很多关于父亲下落的话,她忧愁地说:“你爸爸究竟到哪里去了,在天津等不见他来,在太原也打听不到他一点消息。”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爸爸(1938年)从天津走时,还带了几个青年学生去边区,其中有两个女学生,是不是他和哪个女学生要好,把我们忘记了?”我说:“不会的。”母亲也说:“他不是那种人。”但转身她又说:“你爸爸做的工作很特殊,经常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有时还要打入敌人内部,是不是边区有人怀疑,误会他了,把他整了?”我说:“不会的。”劝她不要瞎猜。

母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痛苦,但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仍尽其所能为党工作。她过去在河南的战友金力耕被俘后,她千方百计地搞到个假“良民证”,让大北门街的河南老乡欧阳书老太太,利用探监的机会交给了金力耕,使金力耕伺机逃离虎口,回到了太行根据地。解放后金曾在国家建设部工作。

我参加地下党的事,开始没有告诉母亲。1945年暑假,我以回老家为名带着太原中学学生武崇智与太原师范学生齐德温,到建平县杨家桥村中共冀晋二地委城工部学习并汇报工作。谁知母亲竟先于我带着妹妹回到老家,见没有我的影子,她先是奇怪,后是焦急。等我从根据地回来,她便生气地质问我去哪里。我这时才以实情相告,她也转忧为喜说:“这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你在沦陷区走了邪路呢!”接着兴奋地对我说:“我能够找到党了!”

这年8月,我将母亲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中共太原地下党负责人张照同志,经党组织考察了解后决定,在母亲前段党龄未得到证明之前,暂按重新入党接上了组织关系。母亲从此又回到党的怀抱,工作更加起劲了。

抗战胜利,阎锡山抢先回到太原。党组织派母亲打入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同志会”,担

任“太原晋华卷烟厂同志会”特派员的秘书。一天她接到特务机关通知,说晋华卷烟厂一位姓马的女工有“伪装”嫌疑(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让特派员监视其行踪,伺机逮捕。母亲心急如焚,告诉这个女工,怕暴露自己身份;不告诉又怕自己的同志遭毒手。她反复思考,毅然亲自将“告警”的纸条从门缝里塞进这位女工的住室,使她及时脱险。

1946年6月29日深夜,我领导的一个党员被捕。次日(星期日)上午,敌人来抓我,我不在学校,捕了跟我要好的两个同学;当天半夜,再来抓我时,我已躲到母亲那里。有长期白区工作经验的母亲,机智地掩护我逃脱敌人的追捕后,她和我妹妹却被阎锡山特种警宪指挥处抓走了。特务头子梁化之亲自审问:“你丈夫郭洁民在哪里?你儿子郭重华在哪里?交待出太原地下党名单,就放你们母女出去。”母亲沉稳机智地回答:“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知道这些?我还找我丈夫呢!我把儿子交给学校;儿子失踪了,我还要向学校要人呢!”

母亲在狱中受尽严刑和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于1949年2月下旬(太原解放前夕),惨遭敌人杀害,母亲时年仅39岁。据杀害她的刽子手交代,母亲是被敌人先用绳子勒住脖子,反绑手臂,拉到城外活埋的。我可亲可敬的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她心爱的丈夫的下落!

得知父亲被错杀的曲折过程

父亲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好多年没有一点消息,直到1946年7月,我才算听到一种“说法”,可是30多年后的1978年,才获悉这个“说法”是当时不得已而编出来的。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八路军发动了北同蒲战役,定襄县城第一次解放。那时,我刚从太原撤回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城工部工作,随地委城工部副部长郭伯诚到定襄县下乡。恰巧原二地委书记、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张连奎也从太原撤到定襄。我听母亲说过,张连奎同志认识我父亲。一天下午,我趁一块打篮球的休息时

间,向张连奎做自我介绍,并打听父亲的下落。连奎同志得知我是郭洁民的儿子,惊讶地说:“我和你爸爸是老乡,很熟悉,他是老革命了。”

张连奎同志回忆起过去。他说自己是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时入党的。一天受组织指派,到西单一个茶馆根据规定暗号同上级组织接头,接头人正是我爸爸。并说那时我爸爸在北方局军委工作。

当我问及爸爸后来的情况时,张连奎同志思考良久才说:“1938年你爸爸确实来晋察冀边区了,后来听说组织又派他到北平做白区工作,被日本鬼子逮捕,牺牲在监狱了。”他还颇动感情地对我说:“你爸爸对党忠心耿耿,很机智,理论水平很高,是位职业革命家。你长得像你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要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我得到这一不愿听到的但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消息,赶紧告诉祖父。只是怕祖母一下子难以承受,没有让她知道。

“文革”十年是是非颠倒的十年。在审查我的历史和家庭时,“造反派”一再追问我父亲的情况,我按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交代,人家阴阳怪气地说:“不一定吧”,要我老实交代,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他们好像怀疑父亲一些什么。我纳闷并感到某种压抑。1970年初,新华社派我到西安,主持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工作,1978年又调回北京。

父亲的真实情况,是在一个偶然的機會,从薄一波同志口中知道的。1978年4月,我从西安来北京向新华社总社汇报工作,正赶上五机部原副部长张连奎同志病逝。我参加追悼会时,见到了与父亲有过深交的许多老同志。当他们得知我是郭洁民的儿子时,都惊诧地看着我感慨地说:“郭洁民还有后代啊!”过了几天,我跟一些老同志去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望革命老前辈薄一波同志。没想到薄老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感慨、坦诚地说:“洁民我很熟悉,他是被晋察冀边区公安局错杀的,他是被冤枉的。”

这一令我惊心动魄的消息,使我心酸,引

起我了解父亲生平及被错杀详情的强烈欲望。此后我多次拜访薄老。薄老说:“洁民相貌英俊,性格沉稳。中等个,长方脸,皮肤白净,喜欢读书和研究理论,写得一笔好字。1929年洁民写了一本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小册子,给我看过,很有理论功底。1929年,我在天津河北省军委工作时,洁民曾介绍武竞天(铁道部原副部长)来天津工作,我让武竞天做省委内部交通,洁民也留在天津工作一段,与周新民、王伯堂等办《实话报》、北方书店等。不久,洁民返北平做军运工作。1931年6月,因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我和洁民、胡锡奎等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关押在北平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审问时,叛徒廖划平站在一旁指证。当时出现了一种情况:凡是叛变了的人就不再回监房,被释放了。一次洁民被提审后也没有回到监房,恰巧敌人紧接着提审同牢房的胡锡奎,且打得很厉害,胡锡奎怀疑是郭洁民出卖了他。从此,狱里的同志都认为郭洁民叛变了。直到1936年我出狱后见到洁民,起初我对他还有些戒备,洁民问我现在干什么,我便说不干了。洁民心里很难受,眼里噙着泪说:‘那你是又不相信我了。’接着洁民向我讲了出狱经过,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原来那次被提审后,洁民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转到陆军监狱了,是他本家的叔父郭向民(阎锡山省政府交际处长)托人情,家里花了很多钱,才从陆军监狱保释出来的。尔后,我又向组织上进行了核实,情况属实,他没有叛变。”

薄老对我说:“你父亲是1939年被晋察冀边区公安局副局长李×按叛徒错杀的。1943年我在延安,李×也到了延安,我向他打听洁民,他说1939年搞内部除奸时把郭洁民处决了。我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即批评了他。他坚持说:‘你们1931年被捕就是郭洁民出卖的。’我说:‘不对,我们被捕是廖划平叛变出卖的。’李×这个人很粗野,错杀了一些好同志。我后来又询问了其他老同志,都说洁民没有叛变,被杀是冤枉的。”

听了薄老的讲述,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少年来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原来是别人不好向我讲真实情况。随后,我又向其他熟悉父亲的

老同志了解情况。

曾任国家建工部计划司司长的周铭同志说：“1941年在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我曾向刘仁打听过郭洁民的情况，刘仁同志告诉我：1939年郭洁民在被审查中，正赶上日军向边区扫荡，在转移途中被公安局李×处死了，中央批评了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曾任石家庄地委书记的康瑞华，1944年任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城工部部长时，我曾趁几次回根据地学习、汇报工作的机会，向他打听我父亲的下落，但他总是说打听不到。1978年5月我将薄老讲的真实情况告诉康瑞华同志时，他才说：1945年他到边区开会时打听我父亲的下落，刘仁同志说过郭洁民在1939年受审查被当作叛徒错杀的事。

听了老同志们的真实情况介绍，我想过去那种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务千方百计地潜入革命阵营搞破坏活动，为了纯洁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应该实事求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确也错杀了不少忠于革命的好同志。因此我认为，党组织应该认真吸取血的历史教训，给被错杀的同志以公正的结论，还他们一生的清白，以告慰他们的英灵。

长期白区工作的职业革命者

我小时虽从祖父母口中得知父亲是共产党员，却对他的经历很少了解。解放后我一头扎在工作里，顾不得、也不懂得与父亲的老战友们联系，对父亲还是知之甚少。1978年，听薄老讲了父亲被错杀的真情后，我下决心要了解父亲。我在千方百计搜集有关父亲资料的同时，积极四处奔走，拜访幸存的与父亲相识的老同志。

父亲的乳名叫郭魁元，学名克勤，字洁民，又名郭晓村、陈学礼，笔名小知，别号拙斋，山西定襄县智村人，1905年生。1920年考入山西

省立第一中学，受“五四”运动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趋向进步，翌年10月参加共青团员王振翼、贺昌等人组织的“青年学会”，探索救国之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4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1926年参加共产党，先后从事党的工运、学运和军运、情报等工作。

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初，郭洁民与在中法大学读书的孙晓村、北平大学读书的郑佩、郑佩等中共党员编辑出版《人言》刊物。主要发往各大学，颇有影响。当时在天津的张友渔、宋绍初等中共党员也参与《人言》的工作，他们经常与郭洁民联系。1929年，郭洁民积极协助山西籍在北平的李舜琴、郝德青、雷任民等中共党员组织了“鳌尔”读书会，出版《鳌尔》刊物。“鳌尔”英文Our（我们的）谐音。《鳌尔》刊物的封面就是郭洁民亲赴天津通过宋绍初请进步画家肖松人设计的。1928年郭洁民介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郭良才加入共青团，并以小知的笔名为郭良才主编的《校友会会刊》（五月特刊）撰写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为此郭良才受到校方的惩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省党组织遭到破坏，一批失掉了组织联系从山西来北平的中共党员，许多都是通过郭洁民接上组织关系的，如外交协会原会长郝德青、对外贸易部原副部长雷任民、农机部原副部长黎玉、铁道部原副部长武竞天等。《武竞天传》中写道：“1928年秋，我在太原进山中学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辗转来到北平，失掉组织关系，心情很苦闷，最后通过赵祥甫找到郭洁民才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并在郭洁民直接领导下，打入敌军内部工作了近一年之久。”“1929年7月，我的工作引起敌人怀疑，向郭洁民汇报后，他当即安排我去天津河北省军委薄一波同志那里工作，并为我转了组织关系。”

1929年以后，郭洁民主要从事党的军运、情报等工作。1931年6月他在中共河北省军委做军运工作、兼任互济会河北省总秘书长时，由于河北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而被捕。

1932年初，郭洁民被营救出狱后，到河北省大名县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他帮助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不久,女五师发动了学潮,七名进步学生被开除,郭洁民也被校方解聘。暑假后郭洁民返回北平,经党组织审查接上组织关系。同年秋,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的冯林书来北平,不久与郭洁民结婚。

1933年初,中共北方局派郭洁民夫妇到太原做军事情报工作。郭洁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师范国文教员,冯若舟是太原后小河小学教员。郭洁民利用其叔父郭向民是阎锡山省政府高级官员的关系,周旋于敌人高层之间,终于搞到不少军事情报。郭洁民夫妇在太原的工作虽有很大进展,但考虑到长期呆在太原会暴露身份,于1933年秋转赴河南许昌。

1933年9月,郭洁民在许昌协助失掉组织关系返回故里的共产党员贺仲莲(又名贺建华),创办了私立霸陵中学。校长由贺仲莲的父亲贺升平(曾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担任,贺仲莲任校务主任,郭洁民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郭洁民团结霸陵中学及其它学校的党员和进步教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革命活动。中共许昌市委党史办公室沈世昌、光华合写的《中原大地之星火》一文说:“郭洁民同志富有革命思想,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经常利用晚间或公休假日,以聚集聊天方式与进步教师议论抗日救国时局,不择形式地开展时事讲座,以日军侵占东三省,猖狂向华北进犯,蒋介石破坏抗日的事实,绘声绘色的言谈发人深省,诱人忧思祖国前途,深受师生欢迎。”文中还说:“郭洁民在同事和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他讲课善于联系社会、政治生活实际,启发学生的民主思想,期望科学、民主、幸福、进步的未来,春风化雨般的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许昌的同志从海参崴出版的《拥护新文字报》上看到用拉丁化新文字刊载的《八一宣言》,立即译成汉文印出来散发。一时许昌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其中的文化教育界表现最为

活跃。

为了掌握好斗争策略,严防敌特破坏,郭洁民起草了几条活动的原则,邀集许昌女师教员郭晓棠(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昌男师教员王大明(现名柳林,解放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霸陵中学教员曹乐生(“文革”前曾任西安市教育局)等同志讨论,大家认为其政治方向明确,切实可行,一致赞同作为当时进行革命活动的指导原则。

1935年秋,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王定南(解放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回家路过许昌,得知当地党员卓有成效的活动后,返北平当即向党组织汇报。北方局立即派王定南返回许昌,以霸陵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组织领导河南党的工作。先成立了霸陵中学党支部,郭洁民任支部书记。是年秋末,成立中共河南省工委,王定南任书记,郭洁民任组织部长(一说是宣传部长)。

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郭洁民与王定南、贺仲莲等研究,决定发动群众,支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推动抗日救亡形势。郭洁民当即向他介绍入党的三年级学生吴思温(现名吴剑,曾任东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和半工半读职员中共党员栗元恒(现名栗再山,曾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布置,要他们到各学校进行串联,并让他们到城西关做卖烟叶的烟农的工作。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地方绅士中间做宣传工作,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同情。郭晓棠起草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宣言》。12月25日成功地发动了以霸陵中学为主力,许昌各校学生、烟农、铁路工人、店员、市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最后向专员公署请愿,专员派代表接见了学生代表,除“释放一切政治犯”外答应了请愿书所提条件。

游行后,从内部得知国民党复兴社反动分子散布这次学生运动有“政治背景”,准备下毒手。1936年初,王定南第二次到北平汇报,中共北方局派沈东平到河南领导工作,决定已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到外地。郭洁民夫妇奉命返北平。

返北平后,郭洁民夫妇仍在中共北方局军委工作。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军委在北平成立军运领导小组,领导整个北方地区的军运工作。组长姓赵,刘子厚任副组长,郭洁民任秘书长,冯若舟做党的机关工作。他们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策,千方百计地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斗争。郭洁民多次到北平南苑军校,与二十九军内地下党组织联系;多次到东北大学做流亡学生的工作;委托郭晓棠编写了用来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士兵读本》;派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张仁槐、韩纯德到包头血海滩做争取地方武装的工作;当郭洁民从中共北平市军委书记梁寒冰那里得知河南省陵宝县一带有一支地方武装可能争取时,立即派人前去做工作。此外,中共北方局军委还让郭洁民打入青洪帮做工作等。

“七七”事变后,1937年冬,郭洁民夫妇转到天津,继续做党的军运工作。1938年初,根据上级组织通知郭洁民到晋察冀边区。

父亲在晋察冀边区横遭不幸

1938年春,我父亲奉命到晋察冀边区,改名陈学礼。他在边区实际上是边受审查边工作的。开始他自己并不知道组织上对他有怀疑。

国家经委原副主任史立德(1938年任冀中抗联主任)说:“当时根据地初创,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重不足。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和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冀中区党委于1938年9月在高阳县出岸村创办了区党委党校,对外称民运干部学校。由李常青任校长,陈学礼任教导主任,党建、马列主义等理论课主要由学礼同志讲授。大家对他的讲课非常欢迎。他还夜以继日地找学员个别谈话,发展党员。曾参加党校学习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至今对陈学礼同志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作风和他的为人、品德念念不忘。”

当时担任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张君说:“陈学礼是教导主任、党总支部书记,我还听过学礼同志讲课,很有理论水平。”林业部原副部长

马玉槐说:“我当时是党校回民大队队长,陈学礼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不苟言笑,工作严谨,不是夸夸其谈的那种人,但又不呆板,有时还开个玩笑,是工农化的知识分子。”

1939年春,晋察冀分局调我父亲到《抗敌报》社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中共大连工学院原党委书记周明(当时任《抗敌报》编辑科长)对我说:“193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邓拓对我说:分局分配来一位老同志叫陈学礼,党组织关系放在分局,不分配具体职务,工作量力而为,生活你负责照顾好。学礼同志主要是帮助编审一些稿件,还给职工讲过课,如讲社会发展史等。同年秋,日军向边区扫荡,分局通知调陈学礼回分局,我们派一位通讯员,骑着马送他回了分局,从此再未见面。”

就是在这次日军扫荡中,边区公安总局押着受审查的干部转移,在一个紧急情况下,怕陈学礼逃跑,便就地处死了。时年仅34岁。

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对我讲:七七事变后,李常青是留在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陈学礼是留在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1938年党中央社会部通知把他俩调回晋察冀边区进行审查,怀疑是托派。1939年2月,我们一行四人,李常青、陈学礼、李耀庭和我从冀中深县到冀西,一路上有说有笑。到分局后,我和李耀庭去党校学习,李常青在分局宣传部工作,陈学礼在《抗敌报》社工作。1957年我曾向刘仁同志打听陈学礼等人的情况,刘仁说:“李常青同志的问题建国后查清了,作了结论,解除怀疑。陈学礼在《抗敌报》社接受审查,不久日寇扫荡,由边区公安局带着转移,不几天便被处死了。学礼同志如果当时不被草率处死,以后也会有正确结论的。”

问题的症结 历史的误会

1980年11月,我写了申诉材料,请熟悉父亲情况的几位老同志过目后,呈送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组织了认真的调查。1982年4月在查阅胡锡奎同志的档案时,了解到胡锡奎在1966年写的材料中说在狱中出卖他的是俞振

邦,不是郭洁民。杨实人、冯建武也证明这一点。但是,从胡锡奎档案里还发现两份历史文件,一是1932年3月15日河北省委向党中央的报告,说对叛变的16人永远开除党籍;另一份是9月5日写的署名阚孝双的“狱中来信”,信中列出18个叛变人的名字。在这两个名单中都有郭静鸣(郭洁民狱中化名)的名字。

参阅河北省档案馆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中共河北省党组织历史沿革概况》,其中有“河北省委根据部分党员被捕后的投敌叛变行为,于1931年10月12日作出决定,开除廖划平等

16人的党籍”的记述。可以看出:1932年3月15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报告中讲开除廖划平等16人的党籍,实际上是复述1931年10月12日河北省委开除廖划平等16人党籍的决定。河北省委的决定又是根据9月5日的《狱中来信》提供的情况而作出的。而《狱中来信》说郭静鸣叛变一事,正如薄一波等老同志所讲的,是当时狱中同志的一个误会。

1991年4月,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处长对我说:“你父亲的问题,我们调查了几年,没有查清,许多档案都找不到,只是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一片纸,写着:‘郭洁民是公安局的侦探’。对此,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所以不好做结论。”

“公安局的侦探”成了问题的症结。后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这“症结”还是始自前边提的《狱中来信》。信中讲廖划平等叛变后,(这些人)“现在津平公安局宪兵司令部等处做事”。这与河北省委开除廖划平等16人党籍的决议中所说:这些人“可耻的投降敌人营垒去,自首叛变替反动统治阶级当侦探,一变而为敌人的忠实走狗”,完全是一致的。现在,既然《狱中来信》认为郭洁民叛变是狱中同志间的误会,从而否定了郭洁民狱中叛变,那么“公安局的侦探”一说也就不能成立了。历史事实



由于诸多原因,郭洁民没有给家属留下一张照片。这里是其子何奇夫妇及其孙辈的合影

是:郭洁民被提审后没有回监房,不是被释放了,更不是叛变了,而是转到了陆军监狱。狱中难友误认为他叛变了,河北省委决定开除他党籍时,他还被关押在陆军监狱。郭洁民被亲友营救出狱后,经组织审查,还接上了组织关系,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为很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发展了很多新的党员。

终于平反昭雪告慰英灵

1998年6月,中组部终于对郭洁民60年的冤案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1999年5月15日,在老家山西定襄县革命历史纪念馆为我父亲郭洁民和母亲冯碧川立了纪念碑。父亲生前的战友薄一波、刘子厚、雷任民、史进前、韩纯德、史立德、马玉槐、周明等革命老前辈送了花圈,县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我终于能够面对纪念碑,向九泉之下的父母倾述了压在内心多年的话: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不幸牺牲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可以欣慰的是,你们为之奋斗乃至献出生命的理想和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 洛松)

漫画之星

屠益范

● 汪 澄



1943年冬,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爆发的持续近一年半的清毒运动,不仅给日军和汪伪以重大打击,还使许多进步学生在斗争中受到磨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屠益范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和屠益范同志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相识。他1925年生于宁波,家居上海。瘦长的身材、清秀的面容、温文尔雅、沉静聪慧。我们初次见面,就互相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住进一个寝室,成为挚友。民族恨、国家仇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相处久了,我觉得他真是一个“热水瓶”,表面上看,他沉默寡言,甚至有点孤傲,但他的眼光常在一闪中发现顽皮的火花和跃动的热情。他胸怀坦白,待人以诚,最讨厌虚伪,他求知欲特强,知识面很广,关心天下大事。我清楚记得,在他的床头贴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他根据二战战局变化,随时画上各种符号,标明战争动向。他广泛阅读中外报纸,把重要的报道剪下来贴在大本子上,积累了几大本。由于他的用心,他对时局往往有超出常人的真知灼见。有的进步同学到我们寝室,就说我们这里是“作战指挥部”。

在学业方面,他的素描和速写不错。油画习作却有点“怪”,不大符合主课老师的口味,认为低于学院标准,同学们也觉得不够好。然而他的漫画创作,才华横溢,没有谁不翘大拇指的。因为他能掌握漫画艺术的规律,寓庄于

谐,幽默而不粗俗,并善于捕捉人物特征,运用夸张手法,极为传神。记得他曾画过一幅群丑图,把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昌祖(当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等一批文化汉奸刻画得惟妙惟肖,丑态百出,在校园和社会上广为流传,观者莫不拍手称快。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爱好漫画。1945年南京学生反对国民党“甄别审查”的斗争中,作为斗争信号的第一张大幅漫画就是我在屠益范同志的指点下创作并张贴在中大大礼堂墙上的。1946年南京临时大学结束,屠益范同志返回上海。他以笔当枪,在《民主》、《文萃》、《群众》、《文汇报》、《联合晚报》等左翼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漫画,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具有极强烈的战斗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初步统计,仅在1946、1947两年中,屠益范同志以范凡、一饭、凡、F等笔名发表在《文汇报》和《联合晚报》上的作品就有96幅之多。据益范表兄洪廷彦同志回忆,当时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冯宾符先生对他的作品极为称赞,鼓励他多为《联合晚报》作画。1947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查封左翼报刊。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秘密成立了漫画工学团。屠益范参加了该团主办的名为《春梦图》、《送葬曲》的两次地下月展,因其高水平的作品,被漫画读者们公认为他是是堪与米谷、丁聪、沈同衡、陶谋基、张文元等并列的杰出的漫画家。他画的《国民与代表》是40年代中国大变局中最

有力的讽刺漫画之一,被辑入《中国漫画史》,并在1991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史料展览会”上展出,得到普遍的赞誉,他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优秀漫画家。

1947年,在沪的屠益范由于失去了“作战”的主要阵地,重返南京,住在我的宿舍里备课迎考。次年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后转入艺术系)。他在南京学生运动中所作的漫画,犹如投向敌人的匕首,刀刀见血,极大地鼓舞了进步同学们的斗志。他还联络南京各报纸的编辑、作者,组织尖锐泼辣的杂文,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连续进行大逮捕。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监禁和特刑庭的审讯。白色恐怖笼罩着石头城。在这种情况下,屠益范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怕牺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迁校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和谈阴谋的斗争。作为党总支委员、党支部书记,他设法在校外设立秘密联络站,掩护南京地下党学委系统的领导同志开会研究敌情,作出决策。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在协助军管会接管中央大学,团结教职员工,恢复教学秩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

1952年院系调整时,屠益范同志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参加建院工作。他热情高涨,不顾体弱有病,深入群众,积极工作。谁料他与筹建该院的某些领导干部发生意见分歧,矛盾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和建院的一些方针上。因当时院党委尚未成立,屠益范和几位党员同志依据党员的权利,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坦诚,向上级反映情况,要求速派院领导来院,以利工作。结果招致一些人的报复。

屠益范同志心情不佳,曾向我吐露打算应米谷之请,到《漫画》杂志编辑部去,拿起他惯用的画笔,以漫画这一武器来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次会晤之后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

屈指算来,自1955年以后,40多年,倔强

的屠益范与所有的同学、同志失去了一切联系,杳无音信,屠益范及其漫画,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星辰,被一片乌云吞噬,迅即消失了。屠益范究竟到哪里去了?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岁月悠悠,这个屠益范去向之“谜”,太晚、太晚地才被揭晓。2000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校党字011号文件公布了《关于为屠益范平反并恢复党籍的决定》。文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记述:“1955年7月,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华东航空学院党委反映屠益范实系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并应其要求,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江苏省公安厅对屠益范的住处进行搜查,同时将其逮捕进行审查。1955年9月华东航空学院党委以屠益范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为由,将其列为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其党籍。”此后,因在漫长的审查中查无实据,而对屠益范宣告释放。其时华东航空学院已迁往西安转为西北工业大学,屠益范同志未能回校,遂回到上海家里,就此在人们眼里长达四十多年地“失踪”了。

现在知道,屠益范同志在十分窘迫的情境下,虽然失去了组织,仍本着一颗素来爱国爱民的心加入了上海建工系统支援福建山区林业建设的队伍,被分配到三照市中村伐木场当伐木工,后因伤致残。据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屠益范同志仍然坚持编写墙报,以漫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鼓舞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直到1976年9月17日死于晚期肺病。屠益范同志去世后,其家属收到三照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寄来的一个包裹,全部遗物是:几本旧书和一个沾有血迹的小枕头。

近年来,经过屠益范同志家属的申诉和关心他的老同志、老同学的不懈努力,经过南京市委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寻找档案,认真复查,西北工业大学党委最后作出决定:“经重新审查,历史上华东航空学院党委认为‘屠益范实系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结论应予以取消,开除屠益范党籍的理由不能成立,可以为屠益范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至此,屠益范同志历经45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 洛松)

农村合作医疗创始人 覃祥官

● 胡振栋

今年 66 岁的覃祥官思维敏捷,举止洒脱。提起他早年创办合作医疗,从农民到厅长又辞官还乡的曲折人生,老人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农村合作医疗的诞生

1933 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覃祥官出生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贫,他只读过 3 年私塾。1964 年春天,乐园公社党委把覃祥官送到县中医进修班学习。1965 年 4 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进修结业证书》。覃祥官学成归来后,便担任了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成了一名“吃皇粮,拿工资”的国家公职人员。

在与病人的广泛接触中,他深切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好多人“小病拖大,大病拖垮”。这年冬天,乐园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全公社有 1000 多人不幸感染,杜家村一天就死了 4 个患病儿童。一位钱姓农妇因黄疥疮布满全身,肿痛难忍,竟一尺青绳断了性命……

深夜出诊回家,32 岁的覃祥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难平:“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合作社,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和疾病作斗争呢?”

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公社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重视。

1966 年 8 月 10 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静悄悄地挂牌了。覃祥官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

饭碗”,在村卫生室当起了赤脚医生。

农民每人每年交 1 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 5 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 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的好处,深受人民群众拥护。

杜家村创办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都盛赞它的种种好处。乐园公社向县卫生局汇报后,迅速在全公社 6 个村进行推广。

1968 年 11 月,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同年 12 月 5 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文中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此后不久,卫生部部长助理魏福凯、邹梅奉命来乐园,进一步总结合作医疗经验。覃祥官也

被众多新闻媒体誉为“合作医疗创始人”。

1969年，覃祥官可谓“三喜临门”：一是他的名字连同乐园的合作医疗，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二是他应邀赴京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了周总理、邓颖超举行的家宴；三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

这年，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人们在享受免费治病的同时，没有忘记合作医疗的创始人覃祥官。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这里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人。

沉寂的土家山寨，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此时已是1972年，覃祥官虽担任了乐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但实际上仍是一个靠村里工分吃饭的农民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官运”

1974年4月20日，《中日航空协定》在北京签定。同年9月29日至10月6日，覃祥官以“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中日通航首航纪念活动，并在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日本访问的8天时间里，覃祥官先后到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城市，并拜会了日本外务大臣和运输大臣。他不失时机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合作医疗，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第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



1976年，覃祥官（中）在菲律宾介绍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

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说：“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

覃祥官清楚地记得，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达尔·马科斯自始至终听完了他的报告，并特邀他前往礼萨省塔乃山村访问，同当地医生进行交流。此后，这位总统夫人引进中国的经验，在菲律宾礼萨省办起了“合作医疗”。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由于省卫生厅机关住房紧张，覃祥官暂住在厅招待所。当时的厅长还多次催促他，将本人及家属子女的户口粮油关系迁来武汉，并说这是省里领导的意见。但覃祥官表示，老家的妻子和两个10多岁的女儿在农村住惯了，她们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再则乐园的合作医疗事业也离不开他，他只打算在厅里“搞几天就回去”。就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直到如今，他的

合作医疗的命运

覃祥官文化程度低,又有山里人不善言辞的习惯。当了副厅长后,除了下基层之外,他只得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要么就是整天开会,讲话发言。夜深人静之时,他想念老家的妻子女儿,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惦记村里的合作医疗。

浑身不自在3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急流勇退。住房让给了别人,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此后,他再未到省卫生厅上班,但副厅长职务却一直保留着。还乡的覃祥官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村里的农业生产劳动。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此时的覃祥官,依然是政治上的“红人”。1977年12月,他再度当选第五届省人大代表;1978年2月,他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覃祥官(左)与县长探讨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问题

此后,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到劳,公社解体后,乐园公社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药很快被刨光了,合作医疗制度也陷入低谷。覃祥官唯一保留的职务是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什么事可做时,就帮忙扫扫地。好事者便传出“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的闲话。他一气之下,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透过这几句自我解嘲的顺口溜,我们似乎可以读透他当时心情的苦涩。

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现在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越来越困难了。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八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视对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防治。”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

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卫生室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

由于覃祥官最后担任的正式职务是县政协副主席,长阳县委为他正式确定为副县级干部,每月有700多元的工资。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退休了,他和年近花甲的老伴刘维菊共同生活在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4组。

晚年归隐的覃祥官还是不愿歇下来,总爱使些小单方,为邻里乡亲医些小病小恙,或到乡卫生院,最远到县卫生局一两趟,与旧时的老同事聊聊天,谈谈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问題,有时也回忆20多年前合作医疗之盛事。

(责任编辑 吴思)

我父亲苏静

参加“军管”二三事

● 苏晓林

1967年我的父亲苏静将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毛主席当时关于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才有所谓“支左”一说。当时领导干部被批斗，工作靠边站，群众派性对立，生产无法正常运行。父亲对于铁道部的业务工作是一窍不通，参加军管的绝大多数同志也都不懂业务工作。

父亲认为，派他到铁道部去军管，并没有要他支持哪一派的任务，也没有要他打倒哪一个领导干部的任务。相反，为了使铁道部的工作正常运行，必须紧紧地依靠铁道部的领导干部，努力做两派的说服工作，消除群众的派性对立。

按照这一思路，父亲到铁道部后，不管群众怎么批斗打倒吕正操同志，他都不表态支持。最后吕正操同志受迫害是中央专案办直接插手，将吕正操同志抓走的。对于两派群众，父亲坚持认为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支了一派，就会使已经对立的两派更加对立。那时两派对立，矛盾激化发展到武斗是很平常的事，有些地方武斗甚至连枪炮都用上了。如果铁道部的两派对立也发展到这一步，其结果必然是全国的铁路运输完全瘫痪，全国的经济也跟着会瘫痪。这正是江青一伙所希望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打倒周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江青一伙暗中支持铁道部的一派群众组织。父亲当时心里也很明白

他们支持的是哪一派，可就是坚决不表态，因此军管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就特别大，军管会经常被围得进不去、出不来。父亲也经常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特别是在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被诬陷打倒后，揪斗军队走资派的风声很大，提出要反“带枪的刘、邓路线”，军队的高级干部一批批被揪斗、被打倒，军管会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军管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为了统一军管会内部的思想，父亲把军管会全体同志拉出去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在学习期间，父亲强调的中心议题就是不能支一派，要作两派的和解工作。

由于父亲的这种态度和作法，江青一伙要搞乱铁道部的目的始终未能达到，只好亲自插手，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了谢富治和文革小组的人，并且邀了一些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陪同到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大会一开始，就由谢富治出面将他们认为革命的那一派的头头叫上了主席台，而对另一派却置之不理，明显冷落。这实际上是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中央文革的态度。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谢富治把这派的头头叫上主席台后，我就把另一派的头头也叫上了主席台，顿时会场大乱，会开不下去了。陈伯达很生气，带着所有来的人一起下了主席台，把我一个人留在台上。我没办法，只好也到台下来，陈伯达见无法开会，又让我上台主持开会，然后我又



将陈伯达等人一个个重新请上主席台。”会后，“打倒苏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就上了大街。

这对我们全家震动很大，因为在当时，陈伯达的分量有多大谁都很清楚。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点名一个打倒一个，真不知道被他点名打倒的有多少人。父亲这么明目张胆地与陈伯达唱对台戏，那还不是有十个打倒十个。父亲当时也觉得自己在劫难逃了。看着他不停地吸烟，一句话都不说，我们都很着急，很难过。按照当时的常规，接下来就应该是被批斗、被抄家，然后被关押，我们也就马上要变成所谓的“黑五类”了。奇怪的是，就在第二天，再去看街上的大字报时，原来的“打倒苏静”全都被盖住了，一点也找不到了。几天之后，毛主席关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的最新指示发表了。这下军管会的地位和威信可高了，群众还以为父亲能通天，会提前知道毛主席的精神。

铁道部的形势很快好转，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并成立了革委会。

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压一派，铁道部肯定要大乱，全国的经

济也就大受影响，我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陈伯达对着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反正横竖都是要被打倒，所以只有豁出去了。”

在铁道部成立革委会时，因为考虑到军管会副主任杨杰同志原来是总参军事交通部的副部长，比较熟悉业务，所以安排他当了铁道部的革委会主任。这时父亲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向周总理提出了要回部队去。周总理却提出让父亲到国家经委去任军代表，李富春同志提出还要把国家计委、王交政治部、劳动部、地质部等近十个部委全都管起来。父亲提出自己不懂业务，坚持还是回部队去。周总理提出可以派人协助他，经父亲提议，周总理把袁宝华同志从物资部调到国家计委协助他工作。

父亲到计委任军代表，感到计委的工作非常复杂，业务性很强，而熟悉业务的余秋里同志受到批斗，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余秋里同志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敢于讲话，被江青视为眼中钉。对此，父亲根本不予理会，为使计委正常工作，父亲坚持要保余秋里同志。在群众批斗大会上，群众举手喊打倒余秋里，父亲就是不举手。父亲说，群众看他不举手，劲头就不大了。1968年3月，就因为江青施威，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无故被抓。他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这对军代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许是觉得江青得罪不起，军代表中有的同志沉不住气了，要撤掉余秋里同志的电话，被父亲知道后，马上制止了。据父亲的秘书讲，当时父亲发了很大的脾气，而父亲对周围的同志是很少发脾气的。余秋里同志是独臂将军，生活中很不方便，父亲专门从铁道部调了一名炊事员来照顾他。在革委会成立之前，各部委的人选安排都是由军代表确定的，很多部门的正职也都是军代表出任的。当父亲看到上报的计委革委会主任是自己时，马上将自己的名字勾掉，改为余秋里同志。在选举九大代表时，对于提名余秋里同志为九大代表，周总理感到很为难。父亲说，这是我们军代表的意见，周总理还是认为希望不大，父亲向周总理保证，这件事由我们军代表向群众做说服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陈伯达点了计

委一些他认为是反革命的群众，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父亲则坚持“没有证据，不能抓人”。陈伯达很生气，中央专案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又多次到计委来，为计委清查工作的不得力大加训斥。父亲悄悄告诉军代表的领导干部都不要出面，只派一般的干部应付他。在抓人与不抓人的问题上，军代表内部出现分歧后，父亲说，抓人有什么难的，但是抓人容易，放人难。为此，父亲专门把延安时期的一篇题为《特务多不为怪》的文章找出来印发给大家看。

父亲曾经做过保卫工作，他深知对人的处理一定要特别慎重。1938年底，肃反扩大化波及到山东，出现了肉刑和大搞逼供信，使滥捕、滥杀之风愈演愈烈，湖西根据地先后有300多干部被杀。事件发生后，父亲出任保卫部长，专门负责处理平息事件后的善后工作。因此父亲深知抓人的事情事关重大。随便抓人，对群众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消除的。

1969年，在党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父亲是整个国务院系统的国家机关大组召集人。在中央委员选举提名时，父亲提出凡是到国务院军管的军代表都不要参加国家机关大组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并说，如果军队大组有人对我们这些军代表提名是可以的。父亲这样提议，并无任何人授意，他这样主动放弃了对自己提名的任何可能，完全是从大局出发。因为当时在各部委中几乎全是由军代表在主持工作，如果父亲不这样提议，提名和选举的结果就很可能对各部的业务工作和领导干部的解放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当时耿飚同志说：“那一个不提也不好哇！”这样父亲才被提名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父亲从一参加红军开始就在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中任司令部参谋，抗日战争又在115师任侦察科长，跟随林彪参加了平型关的战斗。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时，父亲就在他身边，并将他扶到路边。特别是在东北时期，1945年11月父亲任“前总”情报处长，虽然情报处下属仅一百多人，但效率很高，大量地破译了敌军密码。父亲及时上报准确敌情，使我军得以捕捉有利战机。在秀水河子和大洼等战斗中，我军利用

情报将孤军冒进的敌人整团、整师地歼灭，这在东北战场初期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极其难得的。因此林彪当时对秘书季宗权说过“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的话。

解放后，我们家与林彪的家距离很近，只有一街之隔，即使步行也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路。可是父亲在北京只去过林彪家两次，而两次都是因为工作。第一次是毛选四卷出版之前，罗荣桓为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要父亲去林彪家征求意见。第二次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要父亲与其他几位参加军管的干部去谈谈军管工作的情况。

父亲不去拜访林彪，并不是因为对林彪有什么意见，而是觉得领导同志都太忙，不宜去打搅，也实在想不出去拜访的理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父亲与林彪过去关系很深，显然也就成了被怀疑和调查的对象。但父亲心里很坦然，他不但回避，反而在群众大会说自己与林彪关系最密切，要群众对自己揭发。

1978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找父亲谈话，要他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父亲没有同意，要求回部队去。纪登奎同志追到医院去做父亲的工作，父亲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部队去了。

父亲回部队时，国务院领导对他在国务院十余年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做了一份评价很高的鉴定，指定王任重同志到总政治部介绍他的情况。父亲对职务和生活待遇一向看得很轻。父亲在计委工作期间，一直坐的是从部队带去的那辆时速超过80公里就开锅的旧吉姆车，房子还是原来那个旧四合院，其中一半的房子连暖气都没有。计委的同志先要给他换房，后要给他翻建，都被父亲坚决拒绝了。

父亲去世后，一位曾负责过父亲警卫的干部回忆说：“我跟随苏静同志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应该怎么做人的。”

（责任编辑 吴思）

卜少夫和他的《新闻天地》

● 李 伟

让我随风而去，让我静静、悄悄地消失吧！

——卜少夫

曾任《中央日报》总编、《申报》副总编的报界奇人卜少夫，于2000年11月4日，在香港逝世。

卜少夫是江苏江都人，1909年出生，经历漫长曲折，享年92岁。

由卜少夫独力支撑创中国期刊史的奇迹，长达56年又10个月的《新闻天地》杂志，在卜少夫去世前一月停刊。

卜少夫自己说：“我为《新闻天地》尽瘁一生。”也有人说：“《新闻天地》生他生，《新闻天地》死他死，生死一命，休戚相关，生死不渝。”这又是个奇迹。

幼有新闻天赋

卜少夫自幼就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天赋。据卜乃夫（即作家无名氏，卜少夫之四弟）说，卜少夫在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时，才十几岁，就创办了《雪花报》，以后又办《活跃》周报，成为当时南京最“活跃”的刊物。卜少夫童年时，也有优异的口才，在全南京中学生演说比赛中得冠军。

1929年，卜少夫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当时胡适任校长。一学期后，转入中华艺术大学，也在上海。这个学校是中共地下党为吸引青年，为“左联”有一基地而创办的。校长陈望道，李初黎、钱杏邨、夏衍、郑伯奇任教员。张爱萍将军是他的同学。两学期后，中华艺大被查封，卜少

夫离开学校。

这时，卜少夫对新闻事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考虑与准备，远渡重洋，去日本进明治大学，在该校新闻科毕业。

卜少夫在三次东渡完成学业后，从1932年起，历任嘉兴《民国日报》编辑部主任、南昌《真实报》编辑部主任、南京《新民报》编辑、南京《扶轮日报》采访部主任、南京《新京日报》采访部主任。抗战发生后（1938—1940年），他先任印尼《吧城新报》香港特派员、香港《立报》编辑，以后又担任广州市《民国日报》、《武汉日报》、香港《立报》、香港《大公报》这四家报纸的战地特派员、战地记者，辗转于湘、粤、黔、滇、桂等战场，从事报道。1941年起，卜少夫进入《中央日报》系统，历任贵阳《中央日报》资料室主任、重庆《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到1945年，他已成为西南大后方新闻界的一个知名人物，为蒋介石的智囊人物陈布雷所器重。

《新闻天地》问世

1945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重庆一家烧饼油条店的楼上，挤着11个人，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

这11人都是当时在重庆的年轻记者，他们是：卜少夫、陆铿、乐恕人、丁中江、刘竹舟、罗保吾、邱楠、刘问渠、李荆荪、毛树清、黄绵龄。这些



卜少夫(1909年—2000年)

人都是各报的中坚力量。

讨论的结果,产生了共同的意见。鉴于当时国内缺少一种新闻性的杂志,他们决定创办一个新闻周刊,以美国的《时代》周刊为榜样。他们还有一番雄图。先创办一个周刊,逐渐由一个周刊发展为七个周刊。计划实现后,再以七个周刊为基础,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杂志。

初生的婴儿,定名为《新闻天地》,16开,每周一期。卜少夫提出,在刊名下,刊出两行警句:“天地间皆是新闻,新闻中另有天地。”刊物定性为新闻性、内幕性、批评性的杂志。

众人公推卜少夫为总编辑,掌管编务(他在《中央日报》工作,只能兼职)。业务由黄绵龄负专责。各人拿出法币五千元,作为创刊基金。

1945年1月下旬,《新闻天地》创刊号问世。真所谓异军突起,连续几期发表各报知名记者的文章。如陈博生、赵敬恒、钱纳水、徐钟璠、沈宗琳及叶明勋等。国民政府中枢要人,冯玉祥在创刊号发表文章,第三期发了陈诚的文章,何应钦也有文章刊登。一时间,刊物颇引人注目,

特别是一些内幕新闻,吸引不少读者。发行数逐期上升,成为当时重庆的一大畅销刊物。

正当《新闻天地》蓬勃发展时,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当时政府机关和各报刊都纷纷从重庆直下江南,忙着接收。《新闻天地》的十一个发起人,各有各的工作职位上的调派,以致杂志的事落在他一人身上。

到上海后,卜少夫离开《中央日报》总编位置,到历史悠久的《申报》去当副总编辑。虽然新任伊始,编务极忙,卜少夫仍独力支撑《新闻天地》,不使刊物有一期中断。

依靠着卜少夫交友遍天下(他常借酒宴拉稿),还有《申报》庞大的通讯网,《新闻天地》迁到上海后,比重庆时期办得更有声色。

据卜幼夫(卜少夫的六弟,台北《展望》杂志主持人)说:“1946年至1949年这四年为全盛时期,发行九个航空版,销路直线上升至15万余份左右,直追上海《新闻报》及《申报》,排名第三,但在杂志界,则是独占鳌头,位居全国第一。”(《历史的见证》)1948年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常一日三跳,才自动降低发行量,每期出10万份。

1949年4月后,《新闻天地》迁往香港。不仅继续出版,而且发行英文版。60年代,还创办兄弟刊物《旅行》杂志。

双肩独挑尽言责

双肩独挑《新闻天地》长达56年的卜少夫,其间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卜少夫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办刊期间,多次遭遇经济困难,在难以为继、面临停刊时,卜少夫卖掉台北的房子,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刊物的言论态度,也屡屡引起麻烦。卜少夫本是国民党员,1933年曾是南昌行营调查科主任邓文仪手下的秘书,编过刊物《青年与战争》。又曾在《中央日报》系统任职五年以上,且是要职。1981至1986年是侨选的台湾“立法”委员。无疑他本是倾向于国民党的。但作为新闻记者,秉着良知,为维护新闻自由,也公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分庭抗礼,揭露阴暗面。

这里略举几例。

1948年，南京新闻界采访外交部的记者们，不满意外交部长王世杰对美国奴颜婢膝的外交政策，以及对记者的倨傲态度，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新闻天地》。卜少夫以《首都外交记者炮轰王世杰》为题，发表于第33期。王世杰恼怒之余，稍稍改善了态度。接着《新闻天地》又发一篇《王外长又低了一次头》。这一下震撼政府当局，王世杰又告了御状。幸而由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出面打圆场，致函卜少夫斡旋解决了这场风波。首都记者也答应不再杯葛，仍到外交部采访。

同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各大战场连连失利，面临崩溃。海军先开始南移台湾。《申报》派了记者濮德珩随军舰采访。卜少夫要濮为《申报》写通讯外，给《新闻天地》也写文章。不久，濮德珩写了篇《海军需要人和》，批评海军不得人望。发表以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大为不满，下令封锁基隆和高雄两个港口，通缉濮德珩。濮只好躲藏起来。

《新闻天地》(177期·1951年)有篇文章和封面照片，用了“中共”两字。触怒台湾当局，认为应称“共匪”。省政府新闻处长朱虚白下令查封，报摊上的该刊物全没收。卜少夫立刻提出抗议，两次发电报给吴国桢(台湾省主席)与陶希圣(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后来还是谷正纲在中常会上为卜讲话。该期杂志才放行，但已是明日黄花。

1953年7月29日，《新闻天地》发了“宋子文被开除党籍”的言论。蒋介石大动肝火。据蒋的侍从秘书沈铸回忆，那一天蒋很少讲话，连吃饭时都闷不作声。蒋听了宋美龄的意见，决定对《新闻天地》加以处分。自该年9月份起，不许结汇。本要吊销登记证。当时陈诚、王世杰、俞鸿钧与黄少谷等都认为无此必要。因为既不准结汇，就无法在台湾生存。吊销执照必须说明理由也有困难，结果搁置下来。蒋介石为此事曾召见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及第一组主任唐纵大加申斥。

在《新闻天地》的56年历史上，卜少夫颇敢尽言责，挑战权贵，这种勇气值得称道。

首反“台独”于港台

进入80年代，卜少夫已是耄耋之年。他的政治信念有了新的转变。

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不忍两岸同胞的长期分离，在台湾开放大陆探亲(1987年)之前，卜少夫就力主“解禁”。在“立法院”他公开呼吁：“我个人主张开放，应该有选择地邀请大陆的学者、专家、教授来台访问。”

他说：“中国的和平统一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反对‘台独’。我在‘立法院’多次发言就是这样的内容。大陆的《参考消息》有一个时期曾多次发表我讲话的消息，也许北京注意了……”

说到反“台独”，充分显示卜少夫和他的《新闻天地》大胆敢言的特色。在台港两地首刊反台独文章的是《新闻天地》。一篇《斥台奸》就是卜少夫执笔。1995年，当时台湾正举行“总统”选举。《新闻天地》12月号有一篇介绍李登辉的文章中写道：“李登辉确是位大坏人……李登辉当年在台大求学时为了开脱自己所犯的罪名，陷害了同学六人被判死刑枪毙。如此出卖朋



卜少夫(右)与《解放日报》总编秦绍德

友的不耻行为，正如古语所谓的‘卖友求荣’……加上个人毫无诚信的原则，独裁专制树立一言堂，又有何德何能再寻求担任‘国家元首’之职……”该文作者李子雷。

自此后，反“台独”一直成为《新闻天地》的常有的内容。2000年4月25日，卜少夫被邀请出席香港反‘台独’促和平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坚决相信中国必定和平统一》的发言，清楚表达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和心声。这发言后在5月号《新闻天地》发表。

“我从1990年到现在，就在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而默默地工作。”1997年12月12日，笔者亲见卜少夫先生于上海银河宾馆，他对我说这样说。他还说：“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和平统一，这是我的毕生愿望。我余生的精力将致力于民族和平统一，不管有多少影响，也不管能发挥多大作用，昭昭此心，将尽瘁于此。”

1997年，卜老两次回大陆。10月间，去北京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卜少夫文库”落成典礼的剪彩。他把他的著作与藏书以及五十三年的《新闻天地》合订本（全套177部）捐赠该馆。这些书刊弥足珍贵，是研究海峡两岸当代关系的绝好材料。友人冯亦代、丁聪、吴祖光、冒舒湮都出席。现代文学馆长舒乙说：“‘卜少夫文库’的出现，或许是‘卜少夫这个人’最好的写照了。他的爱国，他的执著，他的豪放，他的奉献，全在其中了。”上海《新民晚报》用《著名老报人一片丹心》为标题报道这一消息。

同年12月，卜少夫又有上海之行。在沪期间会晤中华艺术大学同学张爱萍将军。张将军赠书《神剑之歌》并亲笔题词。他还和汪道涵先生会晤。这是7年中（1990——1997），卜汪会谈的第三次。他还寻访当年《申报》旧踪，并与老同事相聚。

《新闻天地》停刊卜少夫告别人间

进入2000年，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卜少夫已是92岁高龄。当年《新闻天地》的11个发起人已有7人先后弃世，只有卜少夫、丁中江、陆铿、乐恕人四人尚在。

如此高龄，卜少夫身体也大不如前。一路行程艰苦，由他一人背负的《新闻天地》，虽有悠长的历史纪录，却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陷入重重困难。

进入2000年之后，卜少夫先后住进四家医院。进后两个医院时，他已有“逃不了开始与终结”的预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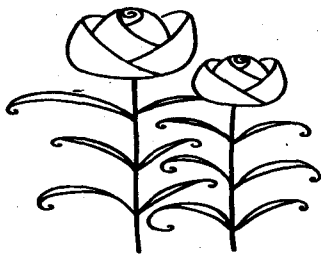
2000年9月号《新闻天地》，卜老的专栏《我心皎如明月》预告：“因本人年迈，精力衰退；因历年亏累，经济上难以支持，决定10月号出版后停办。”还特别预告“同期（指10月号）亦公开揭露十年前我与何景贤博士（台湾中国语学院院长——笔者注）共同从事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运动之‘长流计划’全部经过。”消息传出，港台与海外的许多读者都为之惋惜。

从9月6日到25日，断续20天，卜少夫在病中写了告别读者书，文仅千字，足见病已沉重。告别书以《我自横刀向天笑》为题，开头说：“当我决定告别读者时，当我决定公开‘长流计划’时，我即有谭嗣同谭浏阳当年的绝命诗中的这一句的慷慨情绪。当然我的决定怎可与他的爱国行动相比，不过有那种气势而已，主要在无愧无悔，可以对天大笑。”告别书特别指出：“‘长流计划’由于好友们的劝告，我也认为时不适宜，可留待将来写回忆录时再为发表。”

然而晚了，他的回忆录已不能完成。一个月后，11月4日上午10时30分，在香港律敦治医院，卜少夫逝世。

卜少夫走了，《新闻天地》停刊了。卜少夫说：“《新闻天地》过去的一切，让它留在大家回忆中吧。俱往矣。”

（责任编辑 吴思）



新式标点第一人 ——汪原放

● 安绩常

汪原放(1897.6—1980.4)学名家谨,乳名麟书,安徽绩溪城内人。父亲汪希颜1902年病逝时,汪原放只有5岁,随大叔汪孟邹生活。在仁里思诚丙等学堂初小毕业后,13岁的汪原放到大叔汪孟邹在芜湖开设的科学图书馆当学徒。1913年,汪孟邹到上海新办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也随之到上海当大叔汪孟邹的助手。

汪原放是一个刻苦学习、奋进向上的青年。赴沪的第二年,边工作,边自学,边进上海青年会的夜校学习英文四年。1917年起,亚东接手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来亚东接洽此事的是宗白华(又名樾,现代著名美学家),当时宗先生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任编辑,汪原放的第一篇译作——托尔斯泰的《只有上帝知道》,就在《学灯》版发表。因亚东经营《少年中国》的印刷出版,与宗白华接触两年多,汪原放的译作水平提高,兴趣也更浓了。

1920年起,汪原放开始用新式法标点《水浒传》,其间又自学了日语、德语、法语等。1925年由陈独秀的大儿子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亚东图书馆党支部书记。1926年4月受党委派去武汉后,汪原放担任过中共中央第二任出版局长。党的“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驻地仍从武汉迁回上海,汪原放与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1927年9月

回亚东图书馆工作。

汪原放一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其标点的图书继《水浒传》后,有《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十多种,译著有《一千零一夜》、《我的旅伴》、《鲁宾逊漂流记》、《伊索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等近十部,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出版家、翻译家和自学成才的专门家。

汪原放标点古籍,与胡适大有关系。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要汪孟邹写信向胡适约稿。1917年7月胡适留美回国,7月10日乘大轮抵达上海,汪孟邹等在码头相迎,下榻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与胡适初次晤面,一见如故。汪原放小胡适6岁,称胡适为“适之哥”。

汪原放看到胡适的《藏晖室札记》,爱不释手,对其中《论白话》、《标点符号》等札记,录了一些放在手头。从此汪原放心中埋下了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

1917年汪原放和章洛声在三井洋行学习了几个月的华文打字,之后为三井洋行到北京推销打字机,在胡适的住处——北京竹竿巷一庐,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胡适见汪原放在看英文版《希腊史》,胡适翻翻说:“我看不如看看《沙氏乐府本事》。”又要汪和胡的侄儿看看《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胡适爱才惜才,热情支持汪出版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和

其它古典小说。

1920年新式标点《水浒传》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式标点的新版古籍。成书前胡适有一封明信片给陈独秀,上面说“我一定送原放一篇三万字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暑假,胡适要到南京高校授课,先到上海亚东落脚,汪孟邹宴请胡适,开桌时适之先生笑着,站起来说:“原放,来,敬你一杯,你做的工作很好,很有意思。”原放赶紧站起来回道:“不敢当。我起初以为标点、分段不很难,现在才知道不容易做好。今回是尝试尝试,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的教教我。”胡适赞扬“印得很不差”,并指出《水浒传》版权页上“句读者”写“亚东图书馆”不对,“句读者”应老老实实的打上“汪原放”,这样,打上个人名义,一人做事一人当,责任更重。汪原放就照依了。根据胡适“校读后记,要越详细越好,举例愈多愈好”的意见,汪原放认真写成《校读后记》、《句读符号例》,介绍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和助读功能。

新版《水浒传》8月正式发行,第一批四百部,决定借胡适在宁讲学之机,带书到南京等师范学校去卖,8月18日到南京,8月19日胡适授课讲白话文学,也讲到《水浒》,中午一点还未到,就有许多人来买书,越来越多,四包书很快就售完了,只好收摊。汪原放托胡适的福,只恨带的书太少了。

在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头面人物的支持下,汪原放1921年即标点出第二本《儒林外史》,1922年至1928年共标点十多本。新式标点《水浒传》等出版发行,陈独秀、刘半农等“五四”名人人都为其作序跋,胡适还撰写有学术价值的序言,鲁迅也称赞他“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邵力子、陈望道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胡适的朋友)都著文肯定他的历史性创举,胡适还把青木正儿在日本京都《支那学》第三号的一篇评论寄给汪原放,以示特别鼓励和祝贺。

新式标点的提倡,在当时是一场斗争。正如鲁迅所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第一次用新式标点实

际运用于《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更有着重大的意义。”

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君用新式标点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

《儒林外史》标点出版后,胡适又说:“我的朋友汪原放把《儒林外史》标出来,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是一大牺牲。他这点牺牲精神,竟使我不得不履行为吴敬梓作新传的旧约了。”

1921年为了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汪原放去北京,住在胡适的家里,两个人又讨论过标点符号、分段、排式等等。汪原放说,我越做越觉困难了,真有“三年徒弟,寸步难行”之感。胡适笑着说:“标点、分段确实不很容易。因为北大招考要考标点、分段,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子。随手拿出一本《汉书》,拣定了一段做题目。有的说:‘考标点,最好要定出一个标准来;不然的话,看卷很不容易。’……后来拿出来交换看看,哈哈,没有一个相同的,六个人倒有六个样。”1925年11月,胡适从京到沪治疗痔疮,住在温州路汪原放处。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两个人又深谈标点小说、重印古书及出版哲学丛书等事。

著名学者张静庐自传中曾说:“亚东版的古典小说标点本和严谨的作风,我们不能抹煞汪原放先生的苦干精神!为一部小说的新式标点,费一年、半年的时间 and 十次、八次的校对,是常有的事。”可见汪原放为标点十多部小说,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

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白话古典小说、书籍在今日是不可想象的。有了标点符号,我们才能自如运用中国语言,为此不能不感谢汪原放新式标点符号的开创工作。现代书评家、上海《书城》杂志主编倪墨炎先生评价说:“汪原放是一位属于‘人虽死了却活着的人’。”这个评价是朴实确切的。

(责任编辑 吴思)

代邮:请作者速与本刊联系

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

● 郝俊卿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发表的陈虹所写《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介绍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平反经过,读后颇有收获。但文中提到:“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帅赶出了北京”。话虽一句,却涉及一些重要史实,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愿就自己目前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的来龙去脉进行必要的辨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关于“第一号号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布的,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的说法,最早见于“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于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中,《通知》说:“1969年10月18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接着在1972年7月2日印发的中发第24号文件中再次说:“1969年10月17日(应为10月18日,引者注),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这两个文件对“第一号号令”的定性是一样的,但后者比前者加了一些细节和过程,却将林彪指示的时间错为10月17日。同时说明是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的。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扬,一些党史工作者和当事人的知情人逐渐披露了实情,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最早最有力的证明,是1980年11月至1981年元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审判中,没有把曾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列为林彪的罪状。只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在与他人合著的《超级审判》中,才披露了原曾打算把“第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的罪状起诉,但经大量查证,认为“定罪理由不充分”,决定“不列入起诉内容”的实情。

再一个有力证明是,1986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其1981年10月的版本作了实质性修改,它不再援引中发[1972]24号文件的说法,而是明确指出:林彪“根据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但这一修改由于未在报上发表,也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反响,不少人仍沿用原来的论断。

到了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多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编著者在该书中对“第一号号令”的记述完全采用了客观叙事的方法,除直接录用了1986年8月版《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提法外,还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情况。《实录》的责任编辑刘野同志于1994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引出的话题,“实录”的故事》一文,介绍了“实录”的编写会议对“号令”写法的讨论过程,充

分肯定了“实录”的编写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此后,公布的不少材料和陆续发表的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对于1969年10月前后中苏关系紧张情况作了详实的说明,在当时的形势下,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特别防止苏联利用谈判搞布拉格式的突然袭击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共识,形势使之然。

10月18日下午5时许,林彪向其秘书张云生口述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六条紧急指示,并让张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7时,张云生以“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为题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并没有称其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作战部向部队传达时,也讲的是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几条指示。后来,作战部参谋人员按“前指”成立以来的发文顺序将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编为“第一号号令”,接着还有第二、第三、第四号令。这就清楚地说明,第一号令的内容是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把它俗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就不准确了。但那时林彪如日中天,有些人虽对此称谓有看法,也没人出来纠正,就这样以讹传讹。“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央文件上,将作为“号令”内容的“林副主席指示”提到标题上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号令”。应该说这是不实事求是的。

至于把疏散中央领导和在京老同志的事与“第一号号令”联系起来,如说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送往×地之类,更有甚者说“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干部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等等。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特别是防止苏联以谈判为名向我发动布拉格式的突然袭击,如上所说,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的共识。“第一号号令”和疏散中央领导及部分在京老同志是在这一形势下同时采取的两项措施,不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二、疏散中央领导和部分在京老同志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周恩来于1969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周为主要负责人,具体工作由汪东兴为主任的中央办公厅办理。疏散方案是报周恩来

审定批准的。其间,毛泽东于10月15日去了武汉,林彪于10月17日去了苏州。10月17日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看完体育表演后,周恩来与几位政治局委员在休息室分批会见了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王震、陈奇涵等一些老同志,向他们通报了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决定,要求他们在10月20日前后离开北京,并说明他已向所在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让他们把老同志安排好。由于聂荣臻、徐向前未来观看表演,周恩来委托陈毅第二天转告。可见,疏散部分在京老同志到外地与林彪和他管的军委办事组没有关系,他们没有参与此事。

三、从时间上看,“一号号令”是10月18日晚发出的,而疏散老同志的决定是10月15日作出的。据相关资料显示,陶铸是10月15日接到疏散通知的,邓小平接到通知也在10月18日之前(据毛毛的回忆文章,邓是在周恩来10月18日向江西省革委会打招呼之前接到疏散通知的)。

四、从“第一号号令”的内容看,“号令”只涉及部队,未涉及地方党政部门,也没有提到疏散老同志的问题。从发送范围讲,也只发给部队,并没有直接发给地方党政部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于一些军队领导是地方革委会领导人,有的军队领导在收到“号令”后便在革委会领导中作了传达,便被一些造反派头头捅到社会上去了,引起混乱。为此,黄永胜等人还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这也说明“第一号号令”是仅限于部队的。

“疏散”决定的前后史实确是如此。但必须说明的是,在疏散过程中和疏散之后,当时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许多老同志,受到无端的、不同程度的迫害。刘少奇、陶铸最惨,疏散后不久即惨死。邓小平次之,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处境虽好些,但一直处于半打倒状态。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罄竹难书,“历史罪人”的恶名是他自己的历史所写就。但我认为,即使对待历史罪人也要实事求是,不是他的罪名,我们也绝不会强加给他。这就是我写这篇读后感的缘故。

(本文主要参阅严实的《林彪的“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和张云生的《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及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责任编辑 洛松)

上书毛泽东 揭露秦城监狱的 是刘淑清

● 郭 华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刊登了《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一文。读后,深为陆定一同志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所感动。但文中说,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冒死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种种残酷现象和刑讯逼供等,并不确切。准确地说,上书的不是刘建章,而是刘建章的夫人、杰出的女共产党员刘淑清。

刘淑清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阜城县刘莘庄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明朴实。1932年刘淑清嫁给了毗邻的景县大刘庄村的刘建章。刘建章是1926年在北平入党的中共党员,入党后被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珲春县委书记。后因被敌人察觉遭到追捕,于1931年夏回到故乡景县开辟工作。回景县后,刘建章先后培养发展了陈东、王任重等共产党员,并于1933年正式组建了中共景县县委。刘淑清与刘建章结婚后,在丈夫的影响下,很快投身革命事业,并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景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当时刘建章以教书为公开职业。刘淑清毅然卖掉了自己的嫁妆,购置课桌,在大刘庄办起一所小学,作为党的地下机关。时任中共津南特委书记的赵博、共产党员王任重、赵志刚等均在该校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

作。1936年春,刘淑清随丈夫调往北平,从事党的交通工作。

抗战爆发后,刘建章奉组织委派再次回到津南,刘淑清也于1938年春天回到阜城县刘莘庄的娘家,并在娘家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当时,中共津南特委书记赵博和中共河北省秘书长姚依林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刘淑清进行的。这期间,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奔波在平、津和津南各县,传达文件,传递情报,接送过往干部,成为津南地下党内闻名的刘大姐。

1938年8月,刘建章出任我党组建的抗日政权冀南五专署专员,刘淑清和丈夫一起在衡水、武邑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在冀中行署参加土改工作,后于1948年调石家庄铁路工会。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从事妇女和工会工作,50年代曾受到全国妇联的表彰。

“文革”开始后,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建章先是被打倒,后又被无辜监禁,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在那极左盛行的年代,刘淑清自然也逃不脱被打倒的命运,但她不畏强暴,于1972年愤然上书毛泽东,反映了刘建章无端被捕以及在狱中遭受的种种迫害。毛泽东看了刘淑清的信,当即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很快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使包括刘建章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改善了处境并陆续获得解放。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淑清重新担任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并出任全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7年12月25日,这位一生对党忠诚的老大姐不幸病逝。吕正操和夫人刘沙送的挽联写道:“投石开天惊四野,迁客囚友躬折节;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刘志坚夫妇挽道:“黑云压沉,青春少女有远见,舍弃嫁妆建学堂,爱我党情深意红;群魔乱舞,白发老姬有胆识,上书抗暴救忠良,为革命铁骨铮铮。”宋任穷同志则称赞她:“不畏强暴,直言上书。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女干部。”这些由衷的赞叹,使一位无私无畏,有胆有识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跃然纸上。(责任编辑 吴思)

陈嘉庚先生两祭黄帝陵

● 苏 明

陈嘉庚先生(1874—1961)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7岁到南洋谋生,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实业家。陈先生又是著名的爱国侨领,曾为孙中山先生筹款资助辛亥革命。民国期间,他捐资助学,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等数十所院校。七七事变后,他在国外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主席,领导南洋800万华侨,以财力、人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毛泽东主席曾题词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先生曾两次到陕西谒祭黄帝陵。

1940年3月,陈嘉庚先生亲率南侨慰劳团回国,在访问当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之后,“为全面了解抗战救国情况,不顾当局一再阻挠,坚持要亲到延安慰劳考察。在赴延安途中谒祭黄帝陵。此次祭陵观感,被编入二战后新加坡出版的《南侨回忆录》一书。

据该书记述,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劳团部分团员到西安后,即往七贤庄访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到延安去。1940年5月30日晨,陈先生一行和护兵分乘三辆汽车,由西安出发,第二天早八时到中部县(即今黄陵县)。事先曾电告中部县县长预备祭陵物事,并雇照相馆摄影。届时县长已在城外山下等候。陈先生遥见“山坡上树木茂盛,异于其他诸山”。在县长陪同下,先登山到达黄帝陵,他见到陵冢“系土堆,略作圆形,面积不过二千方尺,高约二十尺”。“陵前建一亭约二丈方,高一丈余,标‘轩辕桥陵’,无石刻物等项”。那天县长组织学生百余人来陪同陈先生祭陵。陵前香案上排列果品等物,陈先生焚香行最敬礼,同时摄影留念。他应邀立亭阶上演说,大意谓:“南侨慰劳团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回国慰劳考察,鼓励抗战民气,要把获得的国内军民社会的好印象,带到海外去作为宣传材料,以便争取更多的金钱外汇支援祖国抗战。”随后陈先生一行登汉武帝求仙台观赏陵景。据县长介绍,陵区古柏树合计六万一千余株,枯则补栽。游毕下山至祠堂(即今轩辕庙)前停车。陈先生记述说:“该祠堂,即黄帝祠。”祠内

他们见到“有一树圆三十余尺,据云自古代迄今”;又一树旁立一碑写着“汉武挂甲树”,“传汉武帝征匈奴回,曾卸甲于该树”。嘉庚先生对黄帝陵之“风水”颇为赞赏,他写道:“由桥陵观之,岂三代以上黄帝时代,便有笃信风水者,不然如桥陵后方有高山起伏形势,其左右前后复有水流环抱,近代迷信风水者所言之吉地,诚无出其右也。”

陈嘉庚先生一行拜谒黄帝陵后,驱车登程,于当天傍晚抵达延安。在延安慰劳考察的七天期间,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及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陈先生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先生第二次拜谒黄帝陵是在他归国定居后的1955年8月,当时他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庄明理、张楚琨等同志陪同下,在赴延安途中再谒黄帝陵,见到由于年久失修,陵园荒废,庙宇残破,陈嘉庚先生认为他有责任向毛主席反映。同年10月9日,他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此次访问西北,于9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数坟冢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未派人看管。保护山林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竟任其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毛主席接信后即在原信上批示:“周总理: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1955年后,黄帝陵曾多次修葺,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建。80年代以来,每年前来瞻拜者数以万计,且与年俱增。经国家批准,大规模整修黄帝陵工程已于1992年4月4日奠基启动,同年8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1999年已完成第一期庙前区工程。其总体规划设计吸收了海内外专家的意见,将体现“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风格。建成有日,嘉庚先生泉下有知,亦当含笑欣慰。

霍光现象的警示

● 沈 潜

在西汉历史上，霍光其人占有极重要地位，东汉史学家班固为其立传，传后作了总结性评论：“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无术，谄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才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他也有评论：“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而光多置私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奢促之哉！”这两位史学大匠，先对其作充分的肯定，笔锋一转又对其多有责备，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立体感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

霍光的舅父卫青和哥哥霍去病，是汉武帝时征匈奴的名将。两人均拜大将军，卫青封长平烈侯，霍去病为冠军景桓侯。由于舅父和哥哥的余荫，霍光十余岁就在宫中侍从武帝，官拜奉车将军兼光禄大夫。霍光小心谨慎，出入宫闱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些许差错，深得武帝信赖。特别为史学家称道的是拥昭立宣二事。

拥昭之事

自“巫蛊事件”戾太子被谗诬冤死后，太子宝座一直真空。汉武帝的众多儿子，均怀覬觐之心，可不是缺德就是无才，都不中武帝心意，太子虚位，一直是武帝的心病。晚年，宠姬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个宁馨儿，取名弗陵，他形貌、性情酷似其父，所以深得武帝欢心。“上奇

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犹豫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将军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霍光传》）及武帝病危，“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事！’”可见武帝对霍光的信之笃，任之专。随后，诏立弗陵为太子，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武帝亲信上官桀、金日（mie）磾（di）三人同为托孤辅政大臣。不久，武帝病逝，太子即位，他就是汉昭帝，时年八岁。

上官桀是个面谀之徒，深得武帝宠信，眼见霍光大权在握，就千方百计结纳霍光，以便扩展自己势力，他为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长女为妻，结成儿女亲。后来霍女生下了一位千金，上官桀又通过汉昭帝姐姐鄂邑长公主，把年仅六岁的孙女纳入宫中，随后，立为皇后，她就是上官皇后。

上官桀为了酬谢鄂邑长公主的私恩，要求霍光为鄂邑长公主的姘夫求官，可是遭到霍光的拒绝，因此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都深恨霍光。

当时昭帝的长兄燕王刘旦，自认居长，欺昭帝年幼，谋袭帝位，就与上官桀、长公主结成联盟，这伙人屡屡唆使羽翼在昭帝前进谗，诬告霍光图谋不轨。其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当众切责诬陷者，同时面慰霍光，并下令：今后如敢有毁陷霍光的，以反坐论。

上述诸人又密谋以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乘便在宴席上袭杀霍光，进而黜废昭帝，拥刘旦为帝，可是谋事不谨，霍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那时的“四人帮”，刘旦、长公主自杀，上官桀父子腰斩。

渡过了这次政治危机，昭帝对霍光的信任有加，“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霍光传》）霍光为汉室立下了汗马功勋。

立宣之事

公元前74年，昭帝以22岁英年早逝，无嗣，帝位形成真空，议立新君，成了当务之急，群臣问策于霍光。由于霍光的特殊地位（他是皇后的外祖父），和他辅助昭帝的功业，他的一言重于九鼎。他通过上官皇后，遴选了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谁知刘贺不成器，在国丧期间胡作非为，掠夺民女，昼夜寻欢作乐。屡经臣下的劝说，刘贺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悔改之意。霍光问计于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上官后）更选贤而立之？……伊尹废太甲而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于是霍光把黜废刘贺的主张告示群臣，大家都惊愕万分，“……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皆叩头曰：‘万姓之民，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霍光传》）于是霍光启奏太后并得太后同意，废了在位27天的皇帝刘贺。

经过霍光搜求，终于物色到一位理想的新君，他就是蒙冤而死的戾太子的孙子刘询。他刚出生因祖父和父亲的株连，流落民间，有人怜悯他的无辜受罪，秘密收养。稍长，为他延师教读；及长，高材好学，彬彬有礼。霍光获悉后，启奏太后说曾皇孙“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霍光传》）立刻得到太后同意，迎回即位，他就是汉朝第七任皇帝汉宣帝。

汉宣帝登基后，霍光一如既往，精心匡扶。宣帝生长民间，深知民间疾苦，终其一生，能体恤百姓，信赏必罚，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功光祖宗，业垂后世，史称中兴之主。到此，霍光的功业如日中天，堪与伊尹、周公并俦！

公元前68年春，霍光病危，宣帝亲自慰问，失声痛哭。不久霍光病死，宣帝与太后亲自参加丧礼，为他举行国葬，谥为“宣成侯”，可谓备极哀荣，善始善终了。



霍光像

但是班固和司马光，为什么还对霍光作了严厉批评呢？

霍光的严重过失：

平心而论，霍光对汉室的忠诚可谓大节无亏，论其功过，也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人们总认为治国平天下是小事，修身齐家是大事，大醇小疵可也。其实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糊涂观念。霍光在生活细节上存在致命的弱点，为其家族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所谓“多置私党”，由于辅主有功，获得昭帝的信任，霍光把儿子霍禹安插在朝廷重要机枢里，三个女婿也委重任，还把霍去病两个孙子拜官封侯，甚至兄弟的女婿、外甥，同族的子弟，远亲近邻，呼朋引类，萝丝瓜蔓都得了官，占据朝廷的半壁江山。

所谓“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霍光不但以自己为核心，广置私党，而且纵容妻子霍显，耍权术、搞阴谋。

霍显原是前妻的陪嫁侍女，妻死扶正，生男育女，深得霍光宠爱。她不但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且在耍玩权术上，也出手不凡。她为了幼女霍成君的显贵，调唆霍光把她纳入宫中，

立为皇后。其实宣帝流落民间时已娶许氏女为妻,并生下儿子刘奭,登位后,理所当然许氏成了皇后,许皇后娴静俭朴,帝后恩爱异常。霍成君进宫后,霍显竟丧心病狂地买通许皇后身边的女医,乘许皇后分娩时下毒,女医胆怯不敢,霍显竟口出狂言说:“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在她的淫威利诱下,女医进药毒杀了许皇后,为霍成君扶正,扫清障碍。

许皇后产后暴卒,朝野群情哗然,一致要求严究女医责任。女医下狱后,霍显害怕东窗事发,只得向霍光吐露真情。霍光悉原委后,惊恐万分,想举报自首又缺少勇气,终于敌不过霍显的缠扰,示意承审官员不要对女医严究,掩掩遮遮不了了之。

霍成君册立皇后后,一反许皇后俭朴作风,奢侈绝伦,骄纵放肆,不可一世。

公元前67年,汉宣帝立嫡子刘奭为太子,立嫡是封建王朝天经地义的事,这却使霍显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地说:“这个民间出生的野孩子怎么有资格做太子?假使以后皇后生子,摆在什么位子上?”故伎重演,调唆霍皇后对其下毒,幸亏太子保姆有食必先尝例规,霍显母女阴谋未能得逞。

霍显为了摆阔气抖威风,擅自变改了霍光生前自己设计的坟墓规格,违制起了三道阙门,修筑了甬道,并把一批官奴婢妾幽闭其中,为其守墓,其气势规格可与皇陵媲美。这不能不引起人家非议。霍显又为自己大兴土木,营造第宅,极奢侈之能事,单是她的辇车就非同一般,用熟牛皮包裹车轮,中间实以棉絮,车内外饰以精美的锦绣,外壳饰以黄金,出引时命令侍女挽着五彩丝绦,悠哉游哉,四处游玩,宛若天仙。她的子侄也学她样,大造园林第宅、极尽犬马声色之娱。

霍显在私生活上也颇遭非议。霍光死后,难耐孤单的寡居生活,与霍光生前男宠冯子都狼狈成奸。说起冯子都,此人颇有来历。辛延年所作《羽林郎》一诗开头四句:“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倚仗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所讥讽的就是这位仁兄。他原是霍光的变童,以男色事人,后来又成了霍显的面首。升了家奴总管,其

声光之显赫,百官均仰其鼻息,俗语说宰相家奴七品官,如果用这话来形容冯子都,未免太蔑视他了。单举以下一事,足可豹窥一斑了。

有次冯子都带领一批家奴出门,路上碰到了御史大夫魏相的家奴,为了争道双方互不相让,这可触怒了他,下令众家奴大打出手,把魏家奴打得落荒而逃,霍家奴犹不够解恨,竟率众打上门去。吓得魏相亲自出面,低声下气向霍家奴叩头谢罪,方才悻悻离去。以御史大夫之尊,尚且吞声忍气自认倒霉,更何况平民百姓呢!

霍光死后,儿子霍禹袭替霍光全部权力,霍氏故旧原官不动。这些人因失去了霍光的管束,更加肆无忌惮,因此引起霍光生前众多政敌的不满,在宣帝面前诉说霍氏的种种劣行,宣帝遂渐有所悟察,此所谓“蓄愤于上,积怨于下”,因此宣帝采取了一些措施,剥夺了霍氏家族的某些特权。一叶落而天下秋,霍显、霍禹及子婿等惶惶不可终日,密谋暗室,定下釜底抽薪之计:以为宣帝外祖母祝寿为名,设宴诱杀大臣,废黜宣帝,拥戴霍禹为帝。可是有人告密,阴谋败露,霍去病的两个孙子自杀,霍禹腰斩,霍显及诸昆弟婿弃市,举凡与霍氏有牵连的数千家,来个瓜蔓抄,斩尽杀绝。霍去病、霍光的煌煌功业,转眼灰飞烟灭。

像霍氏这样恃功而骄,恃宠而狂,滥用权力而招致身败名裂的,古今中外不可胜数,这种现象无以名之,姑妄名之曰“霍光现象”。

生活上的穷奢极欲,总得以权以财为前提。财从何来?曰:“贪”。倒霉的还不是老百姓?唐名臣魏征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懂得为国恤民的道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蒋介石政权,就不懂得这一点,抗日胜利后,放纵百官,穷奢极欲。竭泽而渔,敲骨吸髓,干尽了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蠢事,被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赶上了小岛。这何尝不是“霍光现象”的放大呢!

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的制度下,多读点历史,吸取教训,加强自我约束,可能不无小补。班固对霍光“不学无术”的讥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责任编辑 吴 思)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追寻父亲的清白

反“五风”亲历记

农村合作医疗的创始人

“运动”中的人世情

霍光现象的警示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I1-2581/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